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和世界风云人物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质

两位历史伟人的会见 毛泽东与斯大林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一些公共场合总是挂了五个人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革命导师。

但在我的印象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都离我们太远了，而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导师。

同是革命导师，却又是两个个性十分鲜明的具体的人。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有他们的脾气和禀性。

他们在一起，也会有友谊和矛盾。

这两个人长期的交往中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有意思的故事？留下了多少耐人寻味的情节。

自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足以令后人惊叹。

他们在会面之前，就神交已久，
他们的交往本身就很有传奇色彩

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些情况。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未成年，有不少情况还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

那个时候，毛泽东也还没有在党内建立绝对的权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不能作到一呼百应。

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还相当高，中国人对他还有一定的迷信，他的话，他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印象应该说是有一种敬畏的。他毕竟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虽然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那么公正。

然而，对斯大林的一些意见，毛泽东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对中国革命有利的，他就听，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他根本不予理睬。

这就是毛泽东。

斯大林则是通过王明等人知道一些毛泽东的情况的。王明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这也必然影响到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在王明的眼里，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农民。

农民是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

山沟里能有马克思主义吗？

然而，从山沟走出来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一步一步成功的。

斯大林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斯大林不能不研究毛泽东。他时常站在地球仪前，看着中国，仿佛是在注视着毛泽东。他曾经和他的高级幕僚多次说过：“毛泽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

要说毛泽东与斯大林建立直接关系，应该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派来的军事情报组说起。

据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师哲回忆，这个情报组设在枣园。这个组有一个大功率的电台。不要小看这个电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要从这里发出，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也要从这里收转。

他们到底有多少电报来往，我们无从统计，据当事人回忆，有几封重要的电报是从这里收发的。

1942年夏天，斯大林来电报，要中共设法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苏联方面可提供这一两个师的先进武器。

——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希特勒发动所谓“夏季攻势”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想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

这个要求对中国的党和军队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毛泽东的回电把理由讲得十分充分。他指出，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要我们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去那里接受武器是不可能想象的。有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我们又没有空军，不等我们的部队到达，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有研究者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道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也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道一开始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笔者无意介入这样的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正确的。

过一些日子，斯大林又来了一封电报，称：是不是可以派出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边界小批量的接受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

到了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在长城一线摆若干部队，这样也可牵制日军力量，增加他的后顾之忧。

这次毛泽东经过权衡，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调至长城一线……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苏联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建国，一条是打内战。

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就在日本人准备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有了这个条约，事情就好办了。他作出了一手打一手谈的架式，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要他到重庆谈判。

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如果不来谈，那么正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如果来谈，他们也可以利用时间，作好准备。

正当这时，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内容很明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对这个电报毛泽东很是气愤，据当时在场的人讲，毛泽东把电报甩在了桌子上。

中共中央自然会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斯大林的。

不久斯大林就来了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更加有意思，电报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经

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你到重庆去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如果说前一封电报过于武断的话，这一封电报还多少有点讲道理的意思。

毛泽东经过左右权衡，决定飞往重庆。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

1948年底，毛泽东曾经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并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有何反映，我们没有见到有关材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这些，人们自然会提到关于斯大林的一些传说，曾经有人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让我们不要过长江，而是建立一个“南北朝”，划江而治。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说法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而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想象出来的。他们是提出过这么一个方案，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说法安在了斯大林头上。

师哲曾经说过，不要说斯大林，就是我们中国人能搞清楚“南北朝”是怎么回事的人能有多少？所以，说这是斯大林的错误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追溯中苏关系，特别是解放前的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往事。

因为米高扬是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此以前，还没有这么高身份的苏联人访问过中国的解放区。

关于米高扬访华的问题，已有不少著述，这里不想多说，但这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交往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要说几句。

米高扬是斯大林派来的。

当他穿着黑色的皮大衣，戴着俄式帽子出现在西柏坡的黄土地上时候，人们不免用一种新奇目光注视着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也用一种新奇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人和事。

他的这次来访和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作过决定，让毛泽东去苏联一趟，一方面向斯大林说明中国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也休养休养。

毛泽东也作了去苏联的准备。

但后来，毛泽东还是没有去苏联。这其中有好多种原因——中国革命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应该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大长，也怕影响毛泽东的健康。

由于毛泽东没有去成苏联，斯大林便派了米高扬来中国。据米高扬讲，

这次派他来中国，就是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回去以后他再作决定。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和米高扬谈了整整三天。

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首先是革命的形势，说中国的革命进程要比预料的要快些。估计过了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的军队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出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米高扬对毛泽东的讲话听得很认真。

毛泽东的讲话也很有感染力，使听他讲话的人都很兴奋。

针对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口号有疑义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份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去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有力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要在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到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们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毛泽东不光讲了中国的情况，也讲了他和他的同志们思考了许久的一些问题。

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他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毛泽东说，政权的性质，我们思考了很久，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毛泽东还谈到它的组成、他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么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样一个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吗？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改善和克服的。总之，将来的政府组成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政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二.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紧接而来的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毛泽东很明确，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有正确的政策。特别迫切的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安排生产建设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要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

毛泽东告诉米高扬，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工人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除了共青团外，还没有别的组织形式，恐怕还得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的组织形式。

米高扬说，你们搞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不是会分散青年的力量？是不是会引起矛盾？是否只要一个青年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观点，说，中国有两亿多青年，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都圈起来？就是都圈起来了，怎么做工作？

米高扬赶忙摸摸自己的耳朵，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我不发表意见。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队问题。他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我军不只俘虏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是不少的。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的战争就是靠缴获的武器来进行的。

他们还谈到军队目前的任务，谈到起义部队的改编改造，谈到部队将来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在和米高扬谈到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等问题时，非常生动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到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嘛？

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无意的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朋友们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吗？

毛泽东强调说，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抓一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是很开诚布公的，他谈了中国解放后会遇到的困难；谈到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谈到了美军并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谈到了中国的华侨问题；也谈到了城市就业和农村土改问题；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谈中国的民族问题，谈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等等等等。

在和米高扬的交谈中，毛泽东时而风趣，时而严肃，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米高扬回国后，向斯大林作了认真的汇报，这为后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作了一定准备。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一次会谈
充分展示了这两个人不同性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

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毛泽东站在车窗口，向外望去，思绪万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海南等岛屿还没有解放，他有多少工作要做？他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当然，他考虑最多的还是他的此次苏联之行？

虽说和斯大林有过不少的电报交往，但毕竟没有见过一面，斯大林会有什么样的表示？他们在一起能谈得来吗？

终日的劳累，使得他在一个叫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散步时，忽然头晕，有些站立不稳，出了一头的冷汗。医生说是有感冒，这和他的过度劳累肯定有关系。

对这次访苏，毛泽东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

他研究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材料，也读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籍……

不久前，刘少奇到苏联访问后，向他作了十分详细的汇报，他本人也曾接待过苏联的代表团，同苏联人的交谈中，他也了解了不少的情况……

刘少奇访苏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他传来的信息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并不像有些传说中所讲的那么不容易接近，他很多的时候还是笑容可掬的。对中国同志的态度也是谦虚的。

当刘少奇说到请斯大林作指示的时候，斯大林笑着说，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同志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了！

斯大林还就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妨碍过你们？

当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妨碍的时候，他又说：“不，是妨碍过的，我们对中国的许多情况不了解，有时好心也做了错事。”

他还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明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

刘少奇还向毛泽东讲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看法是很有建设性的。

毛泽东的确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

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大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是由中

国方面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当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您好！您很年轻，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十分高兴！”

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赞赏，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伟大，真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这次会谈，师哲有一段详细的回忆，他说：

毛泽东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法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将是你们国家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定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作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当然也埋下了中苏关系的一些不合谐的种子。

这期间，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有一天他对来看他的柯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十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待，就急忙派员来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苏联。

于是，周恩来率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赶到了莫斯科。中苏双方的会谈又正式开始了。

对外公布的情况自然是外交辞令，说这次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利益一致云云。但据我们日后得到的材料看，这次会谈既有很大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分歧。当时参加这次会谈的一些人，事后作过如下的记述：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定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

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 51：49 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方面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进出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的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持的方针、政策，同时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让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比俄罗斯族表现的还要强烈。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 3 月 27 日中苏两国签定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 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

当时谈判的情况大致如此。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

苏联方面有关人士的回忆 和赫鲁晓夫的有意歪曲。

关于毛泽东这次访苏，苏联的《真理报》1988 年发表了费德林的文章——《夜间会谈》。他的记述也很有特点。但有些东西也不一定特别准确，我们不妨也摘录他一段文字，看他是怎样描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他的描述中的偏颇之处，读者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晤和会谈，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

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矿泉水、几瓶格鲁吉亚葡萄酒。不上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在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来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饮得不多，大多数人不过是在假装喝。好像都只不过是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传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中倒出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右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就是这样商定的。关于条文的内容，两国代表团进行过具体会谈。苏联代表团由米高扬率领，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大家知道，条约是1950年2月14日由苏中两国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的。

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不久前莫斯科电视节目中放映的影片《冒险》中有一处很荒唐。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2月15日我们报纸刊登的图片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并排站着的。在拍照前几分钟，他们愉快地交谈，庆贺顺利签订条约，我曾为他们当翻译。

影片的解说员对这个镜头武断地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态和姿态本身说明：这里已经表明不满意，因为中国领袖是两手空空回国的。他没有能够从莫斯科得到核武器。

应当说，这纯粹是影片作者的异想天开。毛泽东在同斯大林会谈时并未提出核武器问题。这一点是在更晚的时候，不是1950年，而是1958年才提到的。

条约是两大国领袖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顶峰。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受到苏联和中国兴高采烈地欢迎。东西方最遥远的地方也作出巨大反响。

签订条约只是在我们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敌对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凶恶的勾结。当然，这种反应是预见到的。因此，它并不那么突然。相反，这是形势的自然发展。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过去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他们多次冲锋，但是，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这个警句，我听起来很费解。于是，我请求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他

拿起纸和笔，飞快地用他那很有特色的豪放笔锋写了八个大字。

所有这些字，分开看，每个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请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并对整句话里使用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释。

“您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突然我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像触了电一样……对这个人的缺乏自制能力，我从饱经世故人的叙述中早有所闻。

“是这么回事”，我用悔过似的声调说，“我在理解上有困难……”

“您的困难是不是拖得太久了？”他说，仿佛是在进行预审。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里有一个中国字……”我再次进行尝试。

“您是不是想使我们陷入中国字的迷魂阵？”他还是不肯罢休。

“实际上问题仅仅在一个中国字上，”我赶紧说，“但它的意思直译……”

“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他吩咐说。

我这样做了。斯大林（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文字能手）沉思起来。沉默了一会后，他问道：

“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如何？”他语气稍有缓和地问我。

“我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毛泽东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说道，连头也没回。但贝利亚的头却似乎单单转向我，他戴着夹鼻眼镜，有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我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给予解释。他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宋代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毛泽东接着说，“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因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后，小声说道：“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我感到断头台的铡刀从我的头上挪开了。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搞秘密活动的幽灵之一似乎无影无踪了。本来斯大林就觉得他周围有许多幽灵。他一直感到到处都是变节者、间谍、人民的敌人。黎明前我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查一查中国成语详解词典，再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岳飞的格言。

一般来说，斯大林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心平气和，沉着冷静，注意听客人讲话。他从没有心不在焉，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谈话的内容上。他很注意表达的准确性、遣词造句、翻译时的用词。他十分讲究思想的表述、叙述方式和语言上的细微差别。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外部表现。斯大林巧妙地戴着假面具，在面具后面隐藏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一部分笔记里，我没有涉及斯大林应负责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但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拥有某种近乎催眠术的、威严和阴险的威力。他的整个相貌和举止谈吐的风度好像在向周围的人说明，权力应当是神秘的，因为权力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捉摸不透的性质。由此

而来，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有一种莫名其妙和秘密的性质，笼罩着很强烈的神秘色彩。我谈的是个人感受，也许并不总是客观的。

据我的感觉，谈话地点本身很像夜间恶魔势力逞威的场所。斯大林在这个房间里一出现，周围的所有人便似乎停止了呼吸，个个呆若木鸡，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同他一起到来的是一种危险感，一种可怕的气氛。

我又想起一件事，是当时曾任《真理报》总编辑的一位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告诉我的。

“深夜我坐下来校阅下一期报纸的大样，”他回忆说。“突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放下报纸大样，拿起听筒，漫不经心地答话。”

“我是斯大林，”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是哪位斯大林？”我冒出一句。

“就是那个斯大林……”我听到回答，意识到情况是多么荒唐，试图进行辩解……瞧，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神经性抽搐，一生未愈。

当斯大林不在房间里的时候，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有时便自然地交谈起来，这些人被授予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和不可思议的权利。我公正地和无成见地注视着这些高级花名册中的人物，从近处和远处仔细地观察过这些人。这种观察不止一年时间。总之，这些人在我眼里是人的矛盾的和不合逻辑的行为的典型。他们在讲话时往往拿着讲稿，宣读别人写的东西，而且还有点困难，常常不理睬任何语法规则和标点符号，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几乎什么书也没读过。没有读过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有时是根据一些流言蜚语和淫秽传闻来评论作家的。对于外国的作者没有丝毫了解。然而，无知并不能原谅他们对某种东西的不理解。局限性使他们本能地蔑视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把它当作敌人。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时，上级任命的几个杰出人物常常表现出去人的无知，翻译出来简直使人感到害臊。他们似乎不知道，读书和读回忆录会使人得到多么大的好处。

这就使人产生一个问题：斯大林了解这种情况吗？他了解自己的亲信吗？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在他风华正茂时期。但是，他还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和指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要否认许多人都信任他是不真实的。信任他，是因为人们还不了解真实的斯大林，然而，现在，当许多情况已经清楚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他们人数不多）还继续生活在幻想之中。难道这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权力（不论是大权或者小权）如何落在了道德上无权享有这种权力的人手中？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品质被提拔上来的？谁把他们提拔上来的？为什么？当然，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十分了解。从以往年代的情况来看，就更加清楚了。紧紧围绕在领袖周围的那些人对他不会有什么威胁。这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差。

有一次，像通常一样，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举行会见，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小声地问我，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回答说，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这不礼貌。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我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他的话在我内心产生了某种迷信般的恐怖。这种突然的问话把我吓

了一跳，我把脸转向他，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的凶恶目光。

“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早就发现，他有点怀疑我，不大相信我。“请原谅，毛泽东坚持不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礼貌……”

“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略带狡黠地问我，然后微微一笑，开始向客人解释，他为什么把几种酒掺起来。

“您知道，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一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酒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对葡萄酒较为陌生的毛泽东问道。

中国只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才开始生产葡萄酒，并且是在山东半岛的青岛市，这里过去是德国的殖民地，是德国人开始这样做的。

“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沉思地说。

……于是我又一次特别深刻地感到，翻译对某些大官来说只是一种没有思维的机器。

我现在讲一段我亲自参加过的事。1950年2月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时，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决定让中国友人更进一步地熟悉一下首都的精神生活。认为应当从观看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傲——舞剧《红罂粟》开始。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这个芭蕾舞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的。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了演出。

由于某种原因（我想这也不奇怪），毛泽东没有能到大剧院来，尽管大家都希望他能来。

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中国同志坐在贵宾席上，对演出表现了很大兴趣并不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

“请问，这个怪物是干什么的？”陈伯达突然问我。他所问的剧中的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解释，但是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的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教授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提出想离开大剧院。

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

外交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菜。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场面。富丽堂皇的家具——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东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个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伪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舞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我不想估量这类事件会给我们同外国的精神关系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但我坚信，我们应该把文化和精神领域里的合作问题置于首位，而不是最后一位。因为人、人民之间的关系、精神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接近、理解和合作，实际上正是从文化开始的，只有在这之后，贸易、经济及其他关系才能够得以发展。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每一次会晤都要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谈内容全部由主人来定，但主人却从不事先透露题目。

在交谈过程中，曾经讨论过语言和思维的纲要。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陈述自己的意见。其中心思想是：语言作为有意识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

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也阐述了这样一种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在这且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说，“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

当我走近他时，他像往常一样，看也不看我，说道：

“把这道菜拿去！这是难得的菜。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常言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当然，我对这番盛情表示了感谢，但心里总感到有些担忧。不能不叫人警觉的是：女服务员上菜时，同主人耳语了一阵，然后，她没有把菜放在餐桌上，而是放在斯大林旁边。“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个菜吗？”没过一会儿他就问我。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刚才耽搁了一会儿……”我顺口说道，“味道好极了……”

“那您干嘛不说？”他鼓励我继续说下去。这个菜非常可口。火鸡肝加上辣椒和盐，地道的高加索风味。一切顺利。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件事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政府打来紧急电话，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在此期间就下榻在这里。一个军衔很高的特别警卫队的军官见了我，他神色不安地说道：“毛泽东的私人中国厨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说我们运来的鱼不新鲜，他拒绝接受。”

“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鱼？”我问这位上校。

“就是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那种鲤鱼。”

我只好去找中国厨师，弄清他的理由。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活鱼。”厨师连珠炮似地讲着地道的北京方言。

“您说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上校松了一口气，“那么，我们现在就去逮一条活鱼来……”他说。

光阴荏苒。1949年12月过去了，1950年1月过去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的日子——2月的一天即将来临。

“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毛泽东在一次会晤时请求说。

“当然，”主人说。“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像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主人的首肯，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斯大林就是这样打破了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2月14日，中国东道主和客人按指定时间聚集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虽然这里应当笼罩一种隆重气氛，可是许多人的脸上表现出忧虑，甚至是不安的表情：斯大林是否能践约出席呢？不少预言家夸夸其谈他说情况不妙，他们都显得颇为自信。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充满乐观情绪。事先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根据是会场外的议论。大家都焦急地望着门口。

一位身穿便服的主管同志向我走来，并且用一种秘密的声调悄悄地说：

“您应当在前厅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请问，难道这是我的特权吗？像平时一样，您做这件事不是更好吗？”我对这位我已经非常熟悉的上校说。

“关于特权的事，我们最好暂且别议论它，让我们改日再谈，现在，我们是把您看作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不明白吗？！”我的交谈者以命令的口吻说。

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前厅，指出我应当站的地方，并说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周围没有人。只有存衣处的服务员在衣架前坚守他的工作岗位。

很快大门开了，斯大林像镜框里的全身照片一样出现在门口。他很快地扫了前厅一眼，发现我在场之后，就不慌不忙地冲着我走来，就像走向一个熟悉的标志。

快走到存衣处时，他开始解扣子脱大衣，存衣处殷勤的服务员像上了弹簧一样急忙向他走去并且奴颜婢膝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帮您……”

斯大林看了看他，客气地向他问好并带点讽刺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他一边说着，向我这边投来友好的目光。

脱下大衣后，他向衣架走去，把大衣挂在那里，把自己的帽子放在架子上，对着镜子照了照，理了理头发。

我领着斯大林进入宴会厅，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这简直是狂欢的景象，不管是忧郁的悲观者，还是小心翼翼的乐观者，都显得欢天喜地。

有一瞬间，斯大林停了下来，环视了聚在那里的人们。他让我领他向站在“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走去。他们彼此问候，相互握手寒暄，询问了健康和工作情况。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同志开始陆续向斯大林走来，表示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人们高声祝酒。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词。所有发表祝词的人，而且不仅是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位并排站在一起的人物，这两位人物有时交谈几句，议论着各种问题，主要是斯大林发表议论。

最后，看来斯大林对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已极的听众感到厌倦了，好像是在用目光发出呼吁：是否到了停下来的时候了。但是，这是徒劳的。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主要的事情：斯大林发表讲话。斯大林触摸了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请注意，我要讲话。

他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举杯祝贺。

大家都友好地一饮而尽。重新又爆发出掌声，情绪激昂的欢呼声，出现一片狂欢的景象。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对这些矛盾，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更不必要求全责备。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这些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鲁晓夫如是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不打下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

“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

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于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

《中苏和平互助友好条约》 的签订斯大林破例出席 毛泽东主持的招待会。

尽管人们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毛泽东的这次访苏还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作出评价。

《中苏和平互助友好同盟条约》在毛泽东斯大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要签约了。

仪式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旁的一间会议室举行。

中方参加签字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等；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可、罗申等。

代表双方签字的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胜利”，要是依了斯大林，一定要他和毛泽东签字的，但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签。

在这个仪式上，毛泽东和斯大林是站在后头的，斯大林没有毛泽东的个子高，为了在照片上不显得他比毛泽东矮，他在照相时总要往前移一下，这样出现在照片上的他就和毛泽东一样高了。

这就是斯大林，他就是有些这方面的小的动作。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也不会计较这种事情的。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签字仪式结束了。

紧接下来就是斯大林为庆贺条约的正式签定而举行的宴会。

斯大林举起酒杯和毛泽东互致祝贺。大家热烈鼓掌，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掀开新的一面而欢欣鼓舞。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举行一个答谢宴会，希望你能够出席我们的宴会。”

苏联当时有个规矩，就是斯大林不能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也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的。

斯大林看着盛情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次，我们的政治局研究了你们的邀请，决定破例接受。也就是允许我出席你们的宴会。”

毛泽东当然很高兴，他说：“如果你的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退席。”

斯大林说：“哪能呢，既然去了就要坚持到底。”

当晚9时，中国党和政府的答谢宴会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

前文中，费德林对这次宴会有过回忆，下面是我们的一些与会者的记述，这与费德林的回忆有很多不同。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站在大门口迎接客人。这也是空前的。

斯大林是个很守时间的人，9时刚过，他的车子就出现在旅社的门口。他的后面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那时斯大林的行动十分的秘密，除了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外，别人都不知道斯大林要来这里，所以他的出现，使这里的气氛为之一振。

毛泽东和斯大林并肩进入了宴会厅。掌声和欢呼声连成一片。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

中国方面由周恩来致祝酒辞，他不要稿子，讲得洋洋洒洒，颇具魅力。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

周恩来说，我们将永远记住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我们将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周恩来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斯大林的讲话。他已经不过多地在这种场合讲话了，所以一旦开口，人们就很注意。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也不慷慨激昂，但还是引人注目。

他说：今天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不忘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团结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大使没有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这个大家庭，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正因为斯大林的讲话与众不同，所以在他讲话时，场上的气氛是很安静的。

毛泽东很是注意宴会的气氛，他不失时机地举起酒杯，祝斯大林健康长寿。

斯大林也祝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中苏友好。

这个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

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一场战争又展现了两个
历史人物的不同个性。

毛泽东访苏以后，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中苏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

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保持了良好的同志关系，他们经常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各自国内的重大事情也相互通报。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档案和一些资料里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只要看看那时的报刊杂志，就会对他们的这种关系深信不移。难怪当时有的西方报刊说：中国和苏联正在度蜜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好像是平静了那么一阵子。

老百姓想平静，有人不想让你平静。

1950年6月，一伙战争贩子点燃了朝鲜战争的战火。

战火很快燃到了中国的大门口，逼得中国不得不作出反应。

情况十分紧急！

据《军事史林》杂志披露，在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致电斯大林：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作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先调在东北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方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几乎是在给斯大林发电报的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有关抗美援朝问题。

没有等到斯大林答复，毛泽东就派出了周恩来等人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商谈有关抗美援朝的问题。

当时斯大林不在莫斯科，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他是十分关注的。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去拜会了斯大林。

周恩来说明了中国方面的考虑：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现在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急需解决，如果再卷入战争，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斯大林听了以后，比较肯定地说：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主动撤退。

斯大林也很清楚，如果美国人占领了整个朝鲜，中国和苏联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特别是中国的东北，随时都可能受到美国人的骚扰……

斯大林还说，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还不

如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员撤到苏联境内。……总之我们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

斯大林要把这个想法马上告诉金日成，一点也不要拖延时间。

当时正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认为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是留在那里打游击。

斯大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游击队存在不下去。他又提出了有关抗美援朝的想法。因为苏联已经声明在朝鲜没有军队，现在出兵有困难，等于和美国人直接交战了。因此他提出，苏联提供一部分武器，必要时出动一部分空军作掩护……

他们谈得很有成果。就在这次会谈的当天，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发自北京的电报。

毛泽东告诉他，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经过和斯大林协商，抗美援朝就这样决定了。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变卦了——他通知中国方面，苏联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还不能出动。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猜测。

据有的专家分析，斯大林可能是出于如下的考虑：首先是中国和朝鲜能不能打得过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担心苏联直接和美国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有人说这是斯大林的老年多疑多变。

……

斯大林是犹豫的，也是多变的。这种例子在他的晚年是常见的。至于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人们是不得而知了，反正他是作出了这样的表示。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这等于是彻底把中国推上了第一线。

就在这时，金日成致电毛泽东，请求他尽快出兵。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在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之后，毅然决定，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要出兵。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周恩来马上约见斯大林。

斯大林左右为难，如果不答应派出空军出战，等于自己食言，如派空军出战，则完全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他以种种理由推迟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有周恩来的办法，他干脆用电报的形式通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中国一定出兵朝鲜！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当斯大林再约见周恩来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决定也只能是点头称是了。

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苏联还是动用了相当的物力和财力，支援了这场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接连打了三个战役，把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退到三十七度线以南。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位大使认为应该一鼓作气，一直打到海边去，他说彭德怀不会指挥作战。

彭德怀却和他的看法完全相反，彭德怀认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目前远不是速战速决的时候。

这位大使不仅当面指责，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讲了彭德怀的不少坏话。彭德怀知道后，也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阐明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接到电报以后，就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

很快，斯大林来了电报，他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支持，而那位大使的意见是不对的，应该批评。

不久这位大使就被调走了。

……

最后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结束，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在了谈判桌上。这一事实教育了很多的人，也使世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

后来，斯大林在金日成和高岗的面前，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加赞赏。他说，你们能打败美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

通过这场战争，斯大林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不能不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农民的儿子。

在高岗问题上，斯大林给了 毛泽东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曾经亲手交给过师哲一份不算很厚的材料，对他说：“这是给毛泽东同志的，看看吧，这些东西说不定会有用处的。”

这份材料没有加密封，又是俄文的，师哲就先拿来看，谁知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他一边翻译，心里一边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这是一份当时的苏联驻东北铁路系统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内有两派，一个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另一派是所谓的亲苏派。

师哲知道，党内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但绝非什么亲苏派，亲美派。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信口开河，便是别有用心。

他不能不联想到高岗访苏回来后，向不少人说过，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喜欢周恩来。言外之意，他高岗是斯大林最欣赏的人物。

翻译好这个文件，师哲赶快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这是什么？

“这是斯大林送给你的。里边说了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对苏联不满的话。不知道是谁给他们提供的情况？”

毛泽东拿过去认真看了看，说：“先不要理他，等一段，看一看再说吧。”

毛泽东确实看了一段。

后来高岗在接待其他苏联外宾时，抬高自己，个人主义也更加膨胀。及至后来他和饶漱石勾结，进行非组织活动，要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他自己来作政务院的总理……

这时候，毛泽东想起了斯大林给他的那封信，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这时是一定会感到斯大林的信任的。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对这两个分裂党的人物给予了应有的处分。

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党内的这场斗争，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呢？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派周恩来 去苏联参加了葬礼，这件事对他的 震动也是相当大的。

1953年的初春，斯大林突然发病了。

实在是突然！前一天的晚上，斯大林还兴致勃勃地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他还把这些人送到了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高，一点身体不适的迹象都没有。

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才接到电话，说是斯大林出了点事。

其实，何止是出了点事！斯大林于昨天晚上得了严重的中风。

这一年，斯大林 74 岁。

斯大林生病的消息是保密的。但这密又能保多久？

不得已，苏共中央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不幸的。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也很着急。他很快召集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研究有关对策，并给斯大林发去了慰问电……

人们希望斯大林能够好起来，斯大林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好起来，但命运不断地和人们的愿望作对。斯大林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是很痛苦的——他不能说话，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3月5日晚，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脸色青紫，呼吸急促。他仿佛有什么话要对他身边的人说。他伸出左手，比划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告：

1953年3月5日晚9时1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逝世。

听到这消息以后，毛泽东许久没有说话。

他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当时正在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只是感觉到主席的情绪有些反常，没有平时的谈吐，也没有了平时的兴致。他们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直到毛泽东指着报纸告诉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

“是斯大林逝世了。”

就像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共中央当天就发来电报一样，也在当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唁电。

毛泽东的手笔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的文字是很有自己特点的，其情也

切切，意也切切。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仅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地关怀指导和支

持是完全分不开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同一天，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致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还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于3月9日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为题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东方人观念，不计较斯大林曾经有过的失误，说他“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不仅仅是悼念这位举世公认的伟人，他考虑的似乎更多……
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怎么办？

**对斯大林的态度问题果然
成了一件全世界瞩目的问题。
毛泽东坚持要对他三七开。**

斯大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去世后不久，一向对他十分尊重的赫鲁晓夫会作一个否定他的“秘密报告”。

他更不会想到，苏联大地上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平反运动。

究竟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一代历史学家的任务，不用我们说东道西。但这个报告给世界带来的震动，是人所共见的。

有人为这个报告拍手叫好，说：“苏联终于解冻了！”

也有人大声疾呼：“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开始，这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

事情往往是矫枉过正的。

既然要批评斯大林，就会有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就要全盘否定这个人物，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不注意把握尺度，反而推波助澜，这不能不叫人想到他们是否别有用心。

当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震惊。这在他的经历中也是不多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个夜晚他没有睡好，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好。

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一直亮到了东方发白。

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一点道理吗？

非也！

赫鲁晓夫也有一定的道理，要不怎么能在苏联的中央全会通过他的报告呢？而且还有那么多人鼓掌？

对斯大林，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有时也觉得斯大林有不少错误，也应该批评。哪有没有错误的人？

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毛泽东再也坐不住了。

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这不只是苏联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

这否定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很可能是否定的整个社会主义！

还有，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也不和兄弟的党和国家通一通气，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让步的毛泽东也不会等闲视之，他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中国人民熟悉的米高扬来了。中国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他就来过。

毛泽东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这不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自然会使得赫鲁晓夫不高兴，以致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毛泽东不光给苏联人讲也给中国人讲。在他的那个很有名气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他的说法更加明确，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思考——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关于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等等。他甚至可能还会想到，如果我毛泽东百年之后，会不会有人也像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我呢？

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多次提醒人们：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要警惕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

……

不仅仅是性格的冲突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如果是 20 多年以前我写下这样一个题目，人们会不可理解——一个是共产主义的旗手，一个是修正主义的头子，他们怎么能扯在一起？

是的。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说来一点都不陌生。

有那么一阵子，他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和杂志上。那时候，他代表老大哥，苏联和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

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反面人物了。

他给大多数中国人印象是个坏人——他的名字和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连在一起的。再加上他有一个光光的脑袋，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赫秃子”。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更使他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可磨灭。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红卫兵把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印象也慢慢淡化了，历史老人也把许多的真相告诉了人们，赫鲁晓夫毕竟是赫鲁晓夫，毕竟是一个大国的一任领导人。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他们都已经作了古。我们今天再来写他们似乎可以更接近真实，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各自有着不同的个性，两种不同的个性注定了他们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他们的冲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个性，还有许多个性以外的东西左右着他们……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莫斯科。那个时候赫鲁晓夫
是不怎么讲话的，后来，
他作为苏联政府的代表团团长来华
访问，才和毛泽东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赫鲁晓夫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对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人都知道 1893 年的 12 月 26 日，在湖南的韶山，降生了一位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后来成为中国的领袖的毛泽东。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一岁，出生在 1894 年。

他的出身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赫鲁晓夫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信仰共产主义比毛泽东要早，1918 年，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此人很有点工农干部的味道，说话有些粗鲁，办事也不是左思右想，说干就干。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做出一些有失身份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工农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

按照“台阶论”的说法，他倒是一级一级干上来的，不是坐火箭上来的。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也引以为自豪，经常和别人说，我当州委书记时如何如何。

在斯大林时期，他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他对斯大林的吹捧也是事实，我们当年在批判他时的那些话虽有过头，但大至还是那么回事。

斯大林的去世，给他提供了一个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机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不到十天，他就被赫鲁晓夫取而代之。这其中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赫鲁晓夫还是有些手腕的。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后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这当然是后话。

赫鲁晓夫是1954年9月29日到北京的，他这次访华，主要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还有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会谈。

我们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就不能不涉及这次会谈，这是他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事情。

从当年的报刊杂志上，我们看到了这次会谈的成果：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

b. 《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c. 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

d. 关于“将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这四个公司分别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的价值，将由中方向苏方用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内偿还。

e. 签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f. 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g. 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h. 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

i. 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

应该说，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访华，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的。

在中苏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直接对话，据有些当事人的回忆，他们的对话也颇有意思。

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对我们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地。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却实在活动着。”

毛泽东说：“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一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以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减去了一半的力量。总之，形势是好了，

对我们是有利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有二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从此战争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

他们的看法自然有些差异。

……

赫鲁晓夫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点艺术性，他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双方的专家天天都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

说到此处，毛泽东又停顿了一下，说：“我们对太阳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这太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他一时没有反映过来。当翻译把这话全部翻译出来后，他呆了好一会儿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

看看毛泽东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又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毛泽东同志，你不知道哇，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不说话，中国方面其他人也不说话。

赫鲁晓夫又说：“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电全部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但你们如果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听说，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人口，如果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很难应付的了。然而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应该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决，那日子是过不好的，甚至是过不下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

听毛泽东这样说，赫鲁晓夫很高兴，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举得很高很高，说：“好！好！”

毛泽东很坦率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第一次到中国来，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特别是到我们的南方，那里是另一种情景。”

赫鲁晓夫更加高兴了，他说：你们这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哪里都想去，但这次只能到沿海的南方北方走走。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拿起了一块腊肉，正往口里填，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到哪里都可以，就像在你自己的家里一样。我这个人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活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也不给作什么特殊安排，随你的便。”

赫鲁晓夫胃口大开，不少腊肉和火腿进了他的肚子。

赫鲁晓夫这次来华，先在北京的街头看了古城的风采，又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江边漫步；然后他又在杭州西湖品尝了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到广州吃了中国的另一菜系的粤菜。

途经长江时，他也领略了中国第一条大江“江涛拍岸”的情景；到旅顺时也看到了与黑海不同的中国内海。

这是中苏关系最高潮的日子。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面前树立赫鲁晓夫的威信。

毛泽东第二次踏上苏联的土地。

上一次他来这里，是来见斯大林，这一次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已经易人，他就是毛泽东并不陌生的赫鲁晓夫。

这次访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加苏联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世界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是有不少想法的，但他不肯外露，在飞机上，他还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开玩笑。

他说：“你是哲学家，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是老朋友，主席给我出题目考试，我争取及格。”

毛泽东笑笑说：“我们刚才在机场，现在在天上，再过一会儿我们要落到地上，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呢？”

尤金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么一个题目，他眨眨眼，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他，好像在说你想想看。

尤金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这位苏联哲学家被他考住了。

他说：“我来回答，请你这哲学家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上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落到地上就是否定之否定……”

“太妙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讲哲学！”

尤金不知道，毛泽东早就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和书本上走出来，要让广大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要打破哲学的神秘。

……

当毛泽东坐的专机在莫斯科降落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机场等候了。毛泽东在机舱门口出现时，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睛。他看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朝他招手。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毛泽东对这一套欢迎的方式很不“感冒”，上一次他访问苏联时，就曾经对斯大林搞的那一套欢迎仪式表示了很不赞同的态度。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的宴会，从晚上 8 点开始，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 1 点多才散。回到驻地，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为什么要搞这么长？吃也没什么好吃的，看也没什么好看的，鼓了一晚上掌，手都鼓痛了。我们回去不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

汪东兴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唉，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每人一份，都要服务员送到每位面前，他们的服务员真不少，太辛苦了。”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完成那一套在他看来是繁琐的仪式，然后上了汽车。

赫鲁晓夫和他同坐一辆车。在车上，毛泽东又和赫鲁晓夫说起仪式的事情来。

“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是和你们打过招呼吗，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不要来这么多的人接，你们怎么还是搞得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有他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应该的必须的，是不应该也不能简化的。

他说：“我们是收到过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认真地讨论过，我们的同志都认为不应该那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同志来了，我们是不能简化的。”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得体，而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

毛泽东的这次来苏联，赫鲁晓夫还是比较热情的，毛泽东也对他比较热情，但在一些问题上，是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的，有些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毛泽东在苏联发表一些精彩的言论，有的言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既讲了赫鲁晓夫不少好话，也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

毛泽东说他的好话是真诚的，批评他也是真诚的。

到莫斯科之后，毛泽东在和兄弟党的领导人接触时，曾多次作他们的工作，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无论是在国人面前还是在“洋人”面前，毛泽东讲起话来总是那么风趣，那么有味道。

他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

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他随时可以召集会议。”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扫了扫众人，他喝了一口茶，说：“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那一个为首？按照字母？”他看了一眼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说“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

胡志明正在朝毛泽东点头，意思是说，我当头，绝对不可能。

“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此后毛泽东就大讲苏联的好话，说苏联有如何丰富的经验，如何强大的实力，……

即使毛泽东这么说，还是有些党的代表在摇头。

毛泽东又说：“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

说到这里，他似乎觉得有点绝对，又补充一句，说：“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

不要小看毛泽东这几句话，这为后来他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毛泽东又说：“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

坐在一边的赫鲁晓夫大自然很得意。他侧过身子听毛泽东继续往下讲。

毛泽东似乎很会把握人们的心理，说了一通苏联的好话。“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

赫鲁晓夫倒是还有几分清醒，说：“大家共同努力，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还在将他的军，说：“大家共同努力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

毛泽东在这里引用的“免于恐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的国家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毛泽东引用罗斯福的话，还是说要“免于恐怖”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要有威慑力。他说：“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心里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变，还会进步。”

……

有人说，毛泽东的此次苏联之行，不仅说了不少赫鲁晓夫的好话，而且讲了赫鲁晓夫应该注意的事情。这话自然有些道理。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为这次会议的宣言作了不少的工作。

11月14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讲话，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

“将来我们见到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概还觉得想象力不够丰富，又把列宁也抬了出来。他说：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的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

毛泽东的这次苏联之行，还发表了一个著名论断，叫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当时世界出现了几个重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等西方大国不得不另眼相看。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敢贸然出兵干涉。

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号称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及其盟军打得坐在了谈判桌上，而且是在三八线的板门店。

越南战争，法国也被迫停火，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作被胡志明同志打得呜呼哀哉。

还有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而美国连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

……

那时候，社会主义的确是欣欣向荣，世界形势的确是东风压倒西风。

但是社会主义阵营里出现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南斯拉夫等国家对苏联的指挥很不买帐，有几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很有意见。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对苏联也是很有意见的，但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做别人的工作。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素质。

他那时的确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啊！

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又一次讲到了团结问题。

他这次从更高的角度谈这个事情。

他很是诚恳地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们对同志不

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经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团结问题的辩证法之后，也讲了一些苏联党内的问题。

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是有不少局限性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其他人的努力，这次会议是很难开成功的。

正当中国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 大跃进的时候，赫鲁晓夫 突然来到了北京……

如果说毛泽东到苏联还作了不少的工作，树立苏联的威信，树立赫鲁晓夫的威信，那么，赫鲁晓夫来华则完全相反，他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涉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主权问题。

赫鲁晓夫这次来京，是事先有过信号的。

传递信号的人还是苏联大使尤金。

1957年以来，他先后几次向中国有关方面的领导谈到了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的意见。

在一次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了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你们是什么意思？”

尤金还解释，毛泽东更加不高兴，说：“我不要听到这个事情。”

毛泽东还说：“这个问题，要赫鲁晓夫来谈。”

于是，在北京酷热的7月，赫鲁晓夫要来北京。

中国方面同意他来。

那天是1958年的7月31日，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一架“图—104”式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

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机场的候机室已经等候了很久。

他们对这位苏联来客是不能怠慢的。

当飞机的引擎停止转动的时候，赫鲁晓夫出现在机舱门口。

虽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出现在这里，但没有外交方面的最高礼遇，没有鲜红的地毯，也没欢迎的人群。

赫鲁晓夫自然有一点感觉。

但他还是挥起了手，向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

毛泽东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当然还有一点西方礼节，就是拥抱。

在机场，他们自然好会说很多的话。

在场的中国同志记得，他们谈到了中国的大跃进。

勿庸讳言，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此时都还在发热的过程中，

认为中国的形势很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怕粮食太多了没法处理。”

赫鲁晓夫脸上出现了一种复杂表情，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好办，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给我们，我们有办法。”

对中国的大跃进他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并且多次向中国方面表示过。

也许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中国领导人冷静一些。

那时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发热，泼一两盆冷水是不起用的。

经过一阵必要的寒暄之后，他们坐车直奔了中国的核心——中南海。

说来也很有趣，到了北京以后，没有进宾馆，就直奔中南海举行会谈，这在外交事务中也是不常见的。

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谈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述。几十年以后，他对这次会谈的内容记忆犹新。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考虑，但说不清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尤金没讲清楚。”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人的意思。然后说明自己的想法。大意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降落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舰队现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云云。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十几分钟，加上我的翻译，就讲了有半个钟点。毛泽东神色肃穆地静听。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听得仔细，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作了个果断而简洁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作笑脸，有些不自然，“尤金告诉了我，您很火。尤金没有讲清楚，我们只是有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说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共同嘛，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问题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尽快能建起来。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我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主席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

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

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中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是动人了！”

赫鲁晓夫耸耸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了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了两只胖而小的手，带着鼻音嘟哝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的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赫鲁晓夫一句。去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谈。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了眉头，提高一些音调：“我们只不过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说着，赫鲁晓夫愤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毛泽东去年对哥穆尔卡说过：“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到十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作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挥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在互相合作的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懑，他在不高兴和愤怒时，眼睛便眯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了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涉及主权的大事是不行的！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足够坚强，他突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经过激烈的争论，结果赫鲁晓夫表示：“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

“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帮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在新疆成立联合股分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 and 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二十五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

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这次会谈是一下飞机就开始的，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毕生都格外珍重。

有了李越然的这段回忆，我们对赫鲁晓夫这次来华便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就有不同的结论，做为当事人之一的赫鲁晓夫自己对他这次来华也有一段描述，我们不妨也抄录下来，相信读者会从中品出一些味道来的。

值得提醒读者请君的是，这一件事情他们的说法是何等的相似。

赫鲁晓夫回忆说：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水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泽东到我们这里作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还是最好到他那儿去谈。这次最好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有多大。”

这是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那是在1959年。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他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迪拉沃夫斯托克活动。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上上呆了很多年，我们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读了他的这一段回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说法和李越然的说法是何等的相似。如果不是他们在写作时相互借鉴的话，就是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太深刻了，否则，怎么能连说话的文字都一样？

但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这一场争论，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他们的记忆

就不同了。李越然的回忆中说是第二次赫鲁晓夫访华即在 1958 年，而赫鲁晓夫却说是在 1959 年那一次，谁对谁错，只能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冲突愈演愈烈，这种冲突导致了
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全面恶化。**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透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关系，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则早就是有些眉目的。

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后来集中反映在对待斯大林等问题上，依笔者的看法，这里面还是既有他们性格上的因素，也有非性格的因素。

分歧并不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是很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分歧集中起来，这样读者就会更加一目了然。

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赫鲁晓夫却认为在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根本就谈不来，毛泽东也就不想再谈这个问题，就叫邓小平去和他们谈。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这是十足的赫鲁晓夫性格。

“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就是爱唱个反调。

赫鲁晓夫说：“我们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攻击，我们都要立即还击。”

毛泽东又不高兴了，他说：“这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了没有。”

.....

在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观点，他们也是有着很大的分歧。赫鲁晓夫认为现代战争可以毁灭人类，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说：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打起来死的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更使赫鲁晓夫不能同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是他们的分歧乃至争论的主要问题。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一切反常活动，早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他作了那个所谓“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更加认清赫鲁晓夫这个人。

据有关人士讲，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很久很久没有入睡，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一连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

这个报告使毛泽东震惊了。

这个报告使毛泽东清醒了。

这个报告使毛泽东进一步看清了赫鲁晓夫这个人。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就明确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毛泽东所说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

人们还记得，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领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赫鲁晓夫。

人们也知道，称颂斯大林为“人民的慈父”，并且称斯大林为自己“生身的父亲”的也不是别人，也是赫鲁晓夫。

人们不会忘记，他曾经在数以万计人参加的场所，吹捧斯大林，他说：“是您，斯大林同志，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前挺进。我们向您保证：更紧密地把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

而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他后来的言论中，他又把斯大林称为“迫害狂”、“虐待狂”、杀害革命同志的“暴君”、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

从人格上讲，赫鲁晓夫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人民熟悉的那位留了小胡子的米高扬来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对斯大林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

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他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不久，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苏联出现的问题，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十分中肯的批评。

1956年4月2日凌晨，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初稿上改完了最后一个字，抬腕看看手表，时针已经指着4点了。

本来可以上床睡觉了，他又坐起来，提笔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少奇、小平同志：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请看过清样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于5日由毛泽东亲自定稿——这足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

在档案馆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修改的这份原稿，那上面真可谓密密麻

麻。毛泽东苍劲有力的笔迹，是大段大段的出现的。

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西方的报刊大肆宣传，说中苏之间的论战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

此后，无论是毛泽东去莫斯科，还是赫鲁晓夫来北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和毛泽东讲了不少斯大林的问题。

毛泽东对他的这些说法很不以为然，很认真地对他说，世界上没有，斯大林也一样，你们看看吧，任何人都有两点，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按你们这种办法，任何人都可以否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

赫鲁晓夫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斯大林是怎么一个人，你们不如我们清楚，他又讲了斯大林的一大堆坏话。

他越说越多，毛泽东不得不连连摆手。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再说了，不讲二八开了，三七开吧。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有世界影响，为世人所注目，不能全盘否定。你全盘否定，不符合实际，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你在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怎么传到美国、英国、法国去了？”

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没有回答，他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秘密报告为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提供了炮弹。

赫鲁晓夫却说：“毛泽东同志这不要紧，我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说那是他们造谣，我根本就没有作过那么一个报告。”

毛泽东觉得这太可笑了，这怎么可以呢？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采取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呢？他很有几分严肃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的秘密报告，我的手里也有一份，怎么能不承认？你这是给人家提供炮弹！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

当然，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讲过一点赫鲁晓夫的好话，这些好话，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比如毛泽东说过，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他敢去碰斯大林。

毛泽东还说过，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头，可是揭了盖子，搬开了压在人们头上的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

有了这样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调和吗？他们还能是同志加兄弟吗？

随着赫鲁晓夫的羽翼丰满，他对诗
中国和毛泽东的在度越来越恶劣，
毛泽东针锋相对。赫鲁晓夫下台后，

**毛泽东还不忘提醒全党，
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

人们都说 1958 年是中国和苏联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1958 年以前，赫鲁晓夫自己也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58 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出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

这又要涉及到赫鲁晓夫的第二次访华。

那个金色的秋天里，中国的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赫鲁晓夫要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是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参加了和美国首脑的戴维营会谈。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对他的谈话很不以为然，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华期间，口气已经不一样了，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首先提出的是放了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

这两名美国人，是当时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时抓获的。

这叫人想到赫鲁晓夫是否和美国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来为美国人说情的。

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一点都不含糊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

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堵在了门外。

赫鲁晓夫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

参加会谈的周恩来、陈毅、林彪等人都先后发了言。也都和赫鲁晓夫吵了架。

——这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的确是在吵架。

当时作为翻译的李越然在场，他对那时的情景有根深刻的记忆：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 1957 年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他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兄弟国家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帐。

我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悄悄报告说：“主席，当时他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吗？”

“可以。”毛泽东点点头。

我站起来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的翻译就是我。”我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及每人讲话的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又转了，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吾吾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了，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无礼貌……”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的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像这样的会谈实在是少见。

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决定撤走所有的苏联专家，撕毁了所有的合同……

紧接着就是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

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一封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不能不激怒中国共产党人。

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26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又和赫鲁晓夫作了许多次的交锋。

——对待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赫鲁晓夫说：“这个党很不像话，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还反过来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邓小平说：“你们不是说援助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吗？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

——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又在指责中国，说：“你们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

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可以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到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作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

此后毛泽东又派邓小平去过一次苏联，邓小平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方针和路线，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说，小平这个人，很硬，不向苏联人屈服。

中国靠自己的努力，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西部上空出现蘑菇云的时候，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交出了一份“辞职申请书”——有说这份申请书是被迫写出的；也有人说正是出于赫鲁晓夫的手笔。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终于下台了。

他的下台，并不等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事情有了终结，毛泽东对他还是念念不忘的。

毛泽东一直担心百年之后会不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所以他多次提醒全党，一定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

从他老人家的本意讲，这种说法可能没有错，但在现实中，他的那套反修防修的理论却和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致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乱。

中美关系的奠基人 毛泽东与尼克松、基辛格

本应是结尾的开头

1976年元旦。

北京街头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夜晚，两辆黑色的红旗轿车驶进了中南海的新华门。

细心的北京人都知道，不是什么车子都可以走新华门的。

——除了国宾的车队，是不得出入这个庄严的“门”的。

车子上坐着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一男一女，用他们那美国人的眼神，打量着车窗外的一切。他们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

说来也有趣，这是两位总统的骨血——朱莉·尼克松是尼克松的女儿；戴维·艾森豪威尔是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受到如此的礼遇——毛泽东要在他的寓所会见他们。

他们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

朱莉·尼克松把老尼克松亲笔签署的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说：“这是我父亲带给您的。”

毛泽东接过信，并用英语读出了信上的日期。抬起头问：“总统先生的腿好了吗？”

“最近好多了。主要是静脉炎在作怪。”

“请转告总统先生，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要爬长城呢！”

尼克松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去了一趟世界公认为“奇观”、“奇迹”的万里长城。但他只爬了一小段，说是下次来北京时再爬。这一举动，当时被人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美国这一任总统还不准备把中美关系推向顶峰。

戴维提醒毛泽东：“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没想到毛泽东却不高兴地说：“我愿意称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

毛泽东对美国那一套政治制度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水门事件”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在反对党的竞选总部安了个窃听装置吗！不就是那么两卷录音带吗！西方的政治虚伪得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使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

戴维告诉毛泽东：“在美国，反对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提出要审判他。”

毛泽东说：“我可以马上邀请他来访问中国。”

朱莉·尼克松原先以为毛泽东会对她和她的丈夫说教，没想到毛泽东会有这般的人情味。因而他们会见的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

朱莉·尼克松说：“你的一首诗发表，好多人都在读。”

这是指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本人同意在1976年的元旦发表。据说病重的周恩来也在听这两首诗。

朱莉·尼克松不可能了解，中国人那些年正是靠着读毛泽东的指示，读两报一刊的社论来揣摩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的。

毛泽东却很平淡地说：“那不算什么，那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写的。”

朱莉·尼克松又把一枚很小却也很精制的毛泽东像章给他看，并且告诉

他，这是中国驻美国的联络处主任黄镇的夫人朱霖送的。

毛泽东把这枚像章握在手上，显得很高兴。并没有对此表示不满。

当戴维说到：“您的书在世界上印行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时，毛泽东的脸上笑容消失了：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尼克松和这两个美国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的思维异常敏捷：“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很少的一些地方。”

他们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和他们谈到了青年一代。他说，这些青年人应该受到各种风浪的锻炼。

毛泽东谈到了他的斗争哲学：

“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

——用他在别的场合说过的话是：斗争是绝对的。

——用他几个月之后的讲法是：十亿人口不斗行吗！

此刻，他问这两位年轻的美国人：“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两位美国人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很可能要斗二三十年。”

在座的中国官员几次提醒会见的时间，毛泽东却说，再谈一会儿。

不是他对这两个年轻的美国人有多少话要说。他考虑的似乎还是他们的长辈——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快要告辞时，他说：“告诉你的父亲，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我会等着他的。”

“我这个人喜欢右派。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父亲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

美国的年轻人不可思议，这位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居然喜欢右派，这又该怎么解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朱莉和戴维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站了起来。——虽然是在女护士的搀扶下站起来的。

“10年后再来吧，中国会有很大变化的。”他说着，朝他们招手。

非同一般的前奏

——四个老师研究国际形势

作为四大古典名著的《三国演义》一书的开头，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纵观历史，世界的格局亦然。

对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中国新一代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或不完全清楚中国和美国曾有过那么敌对的阶段。他们是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长大的。而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爷爷辈，对美帝国主义是恨之入骨的。

当年，美国人是怎样伤了中国人的感情，现代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他们要靠书本、靠历史来知道来了解了。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敌对应当从哪一天说起，恐怕历史学家也难说清楚。

但大多数的中国人人都知道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知道美国人派兵舰进入台湾海峡；知道美国人带头侵略朝鲜和越南；知道美国人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知道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封锁……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的街头随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标语。

究竟从哪一天开始，毛泽东考虑到要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笔者曾经访问过好几个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及至知情外交决策的人物，他们也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

1969 年 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会议可谓开得轰轰烈烈。林彪在这次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正红得发紫。

人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这次会后，毛泽东交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两项很特殊的任务：

在北京的国家工厂蹲点。共同研究国际形势。

第一项任务，当时还好理解。了解基层的情况嘛，任何时候都必要。况且这四位老师又都是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自 1967 年 2 月抗争以后，他们就都“靠边站”了。他们更需要了解工厂的情况。

对第二项任务，人们就不可理解了，不用说别人，四位老师也不解其意。——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审定，又经中共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上面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十分明确，还要研究什么？

因此，在周恩来召集的会上，他们自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回答很有趣：“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周恩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严肃。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了。凡是很正式场合，周恩来是很少有戏言的。

他看着熟悉的四位老师，又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还没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

周恩来谈话很是诚恳。他喝了口茶水，接着说：“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他强调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又怕这几位很认真的老同志太用心劳神了。又赶快补充一句：“你们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

这是主席的意思，又是总理亲自布置的。四位老师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份量。他们很快开了一次会，并且由陈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陈毅没想到会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恩来的眉毛一耸，说：“老总哎，你为什么带秘书呢？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周总理在他的原副总理面前很有权威。

陈毅很快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老同志在一起说话谈问题，难免走火放炮。一旦传出去，又不知道是什么“逆流”、“黑风”呢！

陈毅说：“总理哎，我接受批评，感谢提醒，坚决照办。”

他想了想，又接着说：“我们都一把年岁喽，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派个帮手吧！”

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熊向晖可以协助你们。他的英文好，还可以看英文材料。”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然而，毛泽东是怎么给周恩来交代的，我们没有看到材料，也没有能够采访到当事人，所以也就无法告诉读者了。

此后，四位老师在中南海的武成殿多次开会，议论天下大事。并于当年7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第二部分是对反华大战的看法，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小。第三部分是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这期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引起这四位老师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过程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还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云云。

同年的9月，到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传话，在归国途中想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晤。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于9月11日上午周恩来会见了柯西金。并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

四位老师研究了这些情况之后，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送周恩来总理。

就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他对几位老战友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陈毅元帅不愧是外交部长，他侃侃而谈，讲了三点在当时看来很不合常规的想法：

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

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

由于这些想法“不合常规”，陈老总还决定，不形成文字，只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陈毅很快向周恩来谈了如上的意见。

如果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有前奏的话，这无疑是中国方面的前奏曲。

更不合常规的尼克松

陈毅元帅生前曾经说过，我给周总理建议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作“不合常规”。谁知道尼克松比我更不合常规。

是的，尼克松先生想问题、作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是很不合常规的。

——任用基辛格作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在美国就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基辛格曾经作过大财阀洛克菲勒的“高参”，这是美国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位出身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对洛克菲勒是推崇的。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家族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是基辛格认为这位纳尔逊·洛克菲勒具有美国总统应具备的素质。他如能出任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带来重大变化，也会使世界发生变化。

因而，在洛克菲勒参加竞选的时候，基辛格可谓不辞劳苦地为其奔走。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大加攻击。据说，有记者问到基辛格对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看法时，基辛格只用了四个字来回答：

“荒谬可笑！”

记者紧追不舍，再次问道：“如果尼克松当选了美国总统，你怎么看？”

“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如果基辛格的话不是戏言，那么，美国国民的选举结果一定是使基辛格目瞪口呆了。——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就以 277 票对 692 票败下阵来。

此时，基辛格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他有一阵子不看电视了，因为电视屏幕上总是出现尼克松的指手划脚的样子。他讨厌。

他讨厌尼克松，并不等于尼克松也讨厌他。世界就是这般荒谬。

还没有认识基辛格之前，尼克松就读过了他的几本著作，并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此人有些见解是十分新鲜并有启发的。他当选美国总统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启用此人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此举使美国人吃了一惊，也使基辛格吃了一惊。

没有惊人之举能当美国总统吗！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基辛格正在纽约同洛克菲勒共进午餐。悦耳的电话铃声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信息。

电话的另一头自称叫作德怀特·查平，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的助手。他说尼克松先生想约请你下星期一上午到他的竞选总部皮埃尔饭店会面。

说实在的，基辛格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皮埃尔饭店的。会见的详细情景，他们二人都有不同的描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尼克松决定启用这

个曾经反对过他的博士。

又过了些天，尼克松正式邀请他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沉吟了一下，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这倒不是基辛格博士故作矜持状。他感到有些突然。

基辛格不能不征求洛克菲勒的意见。谁知这位政治家表现的非常有风度，他对基辛格说：“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都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这样，基辛格给尼克松打电话，明确表示他接受邀请。

尼克松的不合常规，绝不仅仅表现在任用基辛格这样的问题上。中美关系发展变化中，他更是如此。

他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在公开的场合攻击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宣誓就职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你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

尼克松回答说：共产党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断地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改变。

就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由50万人增至了54.3万人，接近约翰逊政府规定的最高限度。并且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

……

然而，就在半年之后，他出访菲律宾、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时，语调却作了很大的改变。

他在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时候，很是直率地对这位总统说：“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把我的信息传递给中国。”

他还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在拉合尔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谈的时候，又说：“尽管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

他说：“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当叶海亚·汗谈到中美关系积怨甚深这个问题时，尼克松干脆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

他的这些说法当时是绝密的。如果当时把这些想法公开的话，美国人不知会怎样看这个刚刚当选不久的总统。

万事开头难，尼克松
不得不找“第三者”

对新任美国总统的这些“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一

些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很关注的。他们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一些反应。这些反应是很有分寸，很艺术的。以至于后来成了人们研究外交事务而必不可少的事例。

1969年12月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一个很特殊的邀请——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作客。

这是破天荒的事情。

过去，举行中美华沙会谈，既不在美国大使馆，也不在中国大使馆。而是在所谓的中立区。

接到邀请的时候，斯托塞尔笑了。

不久前，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大使碰到了中国使馆官员。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且对他们说：“我最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总统，他说，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

中国使馆官员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没有作出答复。现在，这应该算是正规的答复了。

斯托塞尔以为中美之间的接触是秘密的，说他将高兴地和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却答复他：

请走正门。

于是，斯托塞尔大使驱车堂尔皇之地进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天以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也应邀去了美国使馆。

这两次互访的意义，远远不在于商定了在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谈判第135次会谈。这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西方的传播媒介马上予以报道，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的一步。

1970年1月20日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交换了很有意义的意见：

斯托塞尔用沉稳的语调说出了显然不是他本人的意见：

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雷阳点头。也说了一段代表中国政府的意见：

中国方面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自此，中美关系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进展……

正像毛泽东后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时说到的一样，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亦然。正当中美关系向缓和方面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南邻——柬埔寨在美国的直接插手下，发生了右派政变。这不能不影响到中美关系。

中国人向来不买“世界警察”的帐，更何况，美国这次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当“警察”了，而是赤膊上阵，干涉别人的内政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商定的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137次会谈是不可能举行了。这一点，中美双方的决策人物都已经预料到了。尼克松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听着林彪宣读他的“5.20声明”。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

国侵略柬埔寨的示威运动席卷全球。……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传到了大洋的彼岸。

尼克松在白宫的办公室简直是暴跳如雷。他觉得中国人太狂妄了。他抓起电话，给有关的人员打电话：

“把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全部舰只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泽东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什么人……”

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却和他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位博士认真分析了毛泽东的声明，认为是一篇非常空洞的文章，既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又没有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表态。

他甚至还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利用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进行大事宣传，是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当基辛格在总统的椭圆形的办公室里把他的这些想法明明白白地和尼克松交换意见之后，尼克松的脸色好看了许多，呼吸也似乎均匀起来了。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声明也确是费了些心思的。他指示让外交部的大才子乔冠华起草，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由他亲自改定的。

中美关系经过此微曲折之后，又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推进了。

尼克松向美国的《时代》周刊记者发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谈话。这个谈话的重要议题是刚刚结束的约旦危机。但他认真地谈到了中国问题，谈到了他的态度。

“……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要知道，这份1923年创刊的《时代》(Time)在全世界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几乎每个国家的首都都有它的特派记者。尼克松的这段话一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注意。

两天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极其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花的海洋里，旗的海洋中，人们注意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在第二天出版的北京的各大报上，都用了较大的版面刊登了一张毛泽东和这个美国人说话的照片。

这个美国人就是埃德加·斯诺。

据当时负责新闻摄影的人讲，这张照片的刊发，完全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还指示要做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

在众多的照片中，周恩来为什么选中这一张在显要的位置发表？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很清楚。还有人猜测，这位斯诺先生是不是美国共产党人？

今天，我们再看这张历史照片，会觉得周恩来总理的用心是多么的明显，但在当时，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没

能理解这张照片的意义。

事后，他和尼克松都对这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遗憾不已。

说到中美关系的进展，就不能不继续提到两位历史人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970年10月下旬，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到美国的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里面既有叶海亚·汗，也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尼克松得知叶海亚·汗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他：美国希望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间人，希望你作出努力。

叶海亚·汗深知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他对尼克松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朋友，帮忙当然是要尽力的。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

叶海亚·汗答应，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定把尼克松的信息带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紧接着，尼克松又在欢宴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使用了一个美国政府要员很久不用的一個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站在讲台桌前，摆平了已经准备好的稿纸，说：“……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上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齐奥塞斯库点头称是。

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注意。他打电话给基辛格，希望他能对此作出解释。

基辛格的回答也很艺术，他反问这位大使：“你们称中国是什么？不也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多勃雷宁也只好作罢。

11月，叶海亚·汗总统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尼克松的信息传到了中国的最高层。不久，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也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叶海亚·汗是个办事认真、精细的总统，他安排了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来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

基辛格办公室12月9日的日历刚刚翻过，希拉里走进来。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接过信封，看看希拉里。希拉里的眼睛里流露着神秘的目光。

他把信封打开，抽出了一封很是奇妙的信，这信既无一般行文的抬头，又没有结尾的签名，密密麻麻的方块字。

希拉里伸出手，意思是说：“请把信给我吧！”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又回到了希拉里手里，他说：“我没有把这封信留在你手里的权利。只能由我念，你来记。”

基辛格已经明白了，便拿起了纸和笔。

希拉里念得很缓慢，基辛格记得很仔细。

笔者没有看到这份很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但从有关方面的书籍中，我们

看到了如下的描述：

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很快把消息报告了尼克松。

尼克松和他商议了有关复信的事宜。他们认定：复信用打印稿、复印纸，上端没有什么开头，下面没有签名。

他们的信向中国方面表达了这样的信息：

美国准备和中国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用在70年代，显得很有点滑稽。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发展的。

毛泽东的重要信号 ——和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约见斯诺，大概是许多天以前就定下了的。斯诺10月1日在天安门上见到毛泽东时，他们虽然没有约定哪一天见面，但他们彼此都觉得应该谈一谈。

毛泽东领导着有七亿人口的中国，要处理的事情很多，直到两个多月后，他们才能坐下来详细地谈一谈了。

汽车把斯诺送到了中南海西岸一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走进了既是毛泽东的卧室，又是书房的地方。

毛泽东站起来迎接他。

“我们是老朋友了！”

毛泽东用这样的话开头。使斯诺又看到30多年前他的神态。

开宗明义，毛泽东告诉他，这次谈话不供发表，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

斯诺应该问这一句的。因为他过去同毛泽东接触，有些东西也是不供发表的。

他们说起话来很随意，可谓海阔天空，说到哪儿算哪儿。

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说到斯诺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加发挥。他先是说，人都要有点个人崇拜，没人崇拜你斯诺，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写的书没人看，你就高兴啦？后来，他又说，崇拜的过份了，讨嫌！比如“四个伟大”，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说到中国农村的妇女不愿意节育，想要男孩子。说美国的教育水平比中国高。

很快，他就把尼克松“提”了出来。毛泽东似乎是很随意他说：“我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

看着斯诺费解的样子，他又说：“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

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请翻译把话翻完，又说了几句：“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

他非常清醒地对斯诺说：“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美国也不利。”

毛泽东把非常秘密的中美关系问题几乎是不保留地告诉了斯诺——

“他（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罗斯福不仅读了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且亲耳倾听了斯诺有关中国情况的叙述。这不能不对罗斯福总统产生影响。

有文字记载的是，罗斯福总统和斯诺深谈过三次。而且罗斯福答应斯诺的请求之后，几乎全部变成了事实。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当然有这样一层意思：希望斯诺能够把他的一些话带给美国总统。

然而，尼克松不是罗斯福。

斯诺和尼克松的关系是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描绘的。如果简单地说，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发表出来，是在1971年4月30日。在此之前，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斯诺用《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他和毛泽东的谈话，把毛泽东的原话大部分都引用了。这不能不在世界上引起反响。

西方世界的震动比第三世界要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大国的报刊都用显著的位置和篇幅报道了“毛泽东的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肯定认真读了斯诺的文章。也许从这一时刻起，他们才想到斯诺这个人物。

就在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的时候，斯诺在病床上收到了寄自“THE WHITE HOUSE”（白宫）的来信。

拆开信封，斯诺就看到了尼克松的签名。

信中对斯诺的病情表示了关切。并且告诉斯诺，不久的将来他将访问红色中国。他希望斯诺能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先期到中国去。云云。

斯诺对这封信的态度只是轻蔑的一笑。对美国总统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能接受。你尼克松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物看，而是想利用我一下，我决不干！

他没有理睬这封白宫来信。

斯诺是想到中国的。他已经同《生活》周刊签定了

合同。他希望独自采访中南海内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

然而，病魔没有容许他这样做。

这些都是后话。

小球·大球

中国的乒乓球曾经称雄世界。

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嘛，有人问，“中国的乒乓球谁打得最好？”

“庄则栋！”

“徐寅生！”

……

问话者直摇头。最后，他告诉大家，中国的乒乓球打得最好的是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

此为戏言。但细想又是那么回事，世界上不是也有一种说法么：

小球带动了大球！

别小看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的乒乓球，有时候它的作用是要使大球也颤动的。

事情是从中国乒乓球队去不去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的。

那是在1971年的春天。这是个“左”的出奇的春天，也是“政治”得出奇的春天。人们说一句话，办一件事，都要考虑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国际上的事还是国内的事。

关于去不去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争论，不仅是在中国乒乓球队内，就是在体委，在外交部，多数同志都认为不去是对的。直至毛泽东作出了派队参赛的决定之后，让乒乓球队讨论，还有不少人一时转不过弯来。

是周恩来总理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陈述了这次参赛问题争论的起因，也讲因为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派队去参加比赛，提议驱逐他们的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毛泽东亲笔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上的措辞有很多那个年代的痕迹，但历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中国乒乓球队如期到了日本。他们在比赛场上的拼搏我们就不再赘述。只是有一点，这里的气氛远比在国内想象得要好。

3月30日，美国的乒乓球队明确表示，希望访问中国。

3月31日，美国队首席代表和记者六次同我接触，表示友好，并希望和我们相互来往。

……

这些信息很快反馈到了中国外交部。

这又是一个逼着人们表态的事情。

当时，两种意见都很明确。一种认为，遵照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精神，应该考虑让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来，或者是让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来，而不是这支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乒乓球队。

另一种意见截然相反，认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两国民间的交往，抓住这个机会，可以使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向前推进一步的。

争论中，前一种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于是，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中心意思很明确：

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时机尚不成熟。相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国家体委打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已经送上去了。周恩来也作了“拟同意”的批示。但总理在报告的旁边写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先是圈阅同意了这份报告，几小时后又有新的考虑，改变为邀请其访华。

4月7日，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明天，各国的乒乓健儿就要各奔东西了。比赛场上的友谊将被他们带走。

上午10时左右，中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国内重要电话：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及时报回。

尼日利亚队来华问题；同意邀请该队顺访我国，来华旅费我可负担。

同意厄瓜多尔队领队（南美乒协主席）和厄队一名男队员随哥伦比亚队顺访我国。

加拿大队领队的美籍女朋友，可同意她同加拿大队一起来华。

……

中国乒乓球队的领队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决策的，但并不知详情。

详情是——

4月7日的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中南海的时候，西花厅的电话铃声响了。

是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周恩来立即安排有关人员研究接待方案，并与名古屋取得联系。

他把黄华和章文晋叫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说：毛主席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美国队接待好，要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情来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待美国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周恩来还说：这次来访的乒乓球队有六个。对各个队的接待工作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但重点放在美国队。

在接待中，我们要主动热情。他们来，要和我们的运动员进行比赛，我们当然要把比赛组织好。同时要把他们的生活搞好。还要组织参观、游览，让他们好好看看中国。

周恩来说，他们记。这两位外交家深知这一事件的重要，他们生怕漏掉什么。

周恩来挥挥手，说：“你们二位，放下手头的工作，全面负起责来，接

待好这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黄华和章文晋也谈了一些情况。

最后周恩来说：美国的球队来了，我准备接见他们！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具体安排，毛泽东、周恩来都了如指掌。

4月8日，周恩来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明确告诉他们：“美国乒乓球队就要来北京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做出的决定。决定作出之后，主席还催了我两次。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4月10日周恩来的秘书电话打到了对外友协，传达总理指示：美国乒乓球队来了之后，晚上要陪餐。

4月11日，周恩来确定：乔冠华主持和英国队的比赛；吴德主持对哥伦比亚的比赛；郭沫若先后主持和加拿大队、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和美国队的比赛由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丁西林主持。

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和美国队比赛时，要预先通知，应该鼓掌还是要鼓掌。美国乒乓球队技术不高，我们的队员要教他们，对技术不高的要予以鼓励。和美国队比赛，不要光是我们赢。

4月12日，周总理又批阅了国家体委关于接待六国乒乓球队的报告。他批道：“特急，送曹诚、吴晓达同志阅办，并送黄华、章文晋同志阅。”他还批了一句：“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

4月14日下午2：30分，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向所有来访的乒乓球运动员致辞以后，特意走到美国队坐的地方。他面带笑容地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的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

美国的领队斯廷霍文说：“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作了一个很坚决的手势，说：“可以去！”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一个披着长头发的美国青年站了起来，他用中国人很看不惯的眼神看看周恩来，提了一个问题：

“总理能谈谈你对美国青年中嬉皮士的看法。”

这是一个与乒乓球比赛毫不相干的问题。不少人对科恩投来责备的目光。

周恩来倒是友好地笑笑说：“看来你也是个嬉皮士啰？”

科恩提这个问题，自有他的道理”。他的这身打扮，他的谈吐，不要说在东方国家，就是在号称“自由世界”的美国，责难者也不在少数。他要听听红色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物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本来，他得知周恩来总理要见他们的时候，他就想提出这个问题。领队知道后，劝说他不要乱来。他也点头答应了。

但看到周恩来后，还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要不，他就不是美国人了！

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守纪律，中国人的领队说，不要提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不提；美国的领队说了，队员可以不听你的。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

周恩来也没料到美国的队员会提这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他毕竟是大外交家，他用十分儒雅的口吻对科恩说：

“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后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允许的。”

周恩来看看在场的年轻人，又说：“应当允许青年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是理解青年人的想法的。”

这是怎样一位通情达理的政府总理呀！

周恩来对科恩说：“比如说长发吧，我也曾见过留长发的日本青年。不过，他们和你大概不属于同一类型。”

科恩并没有因为周恩来这样回答他的问题而满意，他又说：“我认为，嬉皮是一种新思想方式，只有少数人熟悉他，了解他。”

周恩来并不想和他争论这种问题。而是说：“人类一定会找到普遍真理，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我同意青年应该尝试各种各样不同方法，以求得真理。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经常设法找到和人类大多数的一些共同点，使大多数人获得进步和幸福。同样，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当科恩听懂了他的这段话之后，周恩来又说：“这是我的建议而已。”

……

周恩来论嬉皮士的几句话，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这几句话本身。甚至还赢得了科恩的母亲从大洋彼岸送来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听懂了周恩来的话外音。

当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白宫之后，尼克松、基辛格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

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决定对华政策作出如下改变：

一、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二、将放宽美元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三、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但前往或来自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中国拥有或租用的运输工具除外。

四、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送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以前往中国的港口。

五、将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这五个步骤等于宣布了美国对华贸易禁令的终止。

两天之后，尼克松又借会见美国报业主编协会的成员之机发出两个信息：

“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是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自此，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迈进了一大步。有人把乒乓外交比喻为一场乒乓球赛，这头的总领队是毛泽东、周恩来；那一头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谁知毛泽东怎样决定呢？

面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击来的一球，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反应十分迅速。

1971年4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对美国报界发表改善中美关系的谈话的一个星期之内，他收到来自北京的信息——

照例是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把口信送到白宫的。

希拉里说，他的总统（叶海亚·汗）转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话：中国对达成直接和解的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这是响亮的一拍！

虽然在当时来说是秘密的，但在白宫引起的震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敢表露出来罢了。

他们两个人关在房子里，“策划于密室”，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后来越来越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派谁去北京？

人选有三个。

尼克松先提出了美国在法国的越南问题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

基辛格先是点头，后又摇头。“中国人对越南问题是敏感的，用他难免……”

尼克松点头了。

他自然也想到了美国的国务卿罗杰斯。他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他到中国去顺理成章。但尼克松说：“他去，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笑说：“那只有你去了。”

基辛格耸耸肩膀，说：“我也太引人注意。”

尼克松也许胸有成竹，他笑着对基辛格说：“我相信一个出入巴黎不被人发现的人，也能够出入北京而不被觉察。”

基辛格打内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知道北京之行的份量。如果此行成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将会是辉煌的一页。

他深知此行必须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在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进行了秘密的商谈过后，他选择通过巴基斯坦的通道进入红色中国的方案。

基辛格在棕榈泉的休假地起草了给周恩来毛泽东的复信。

大意是：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

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它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

1971年5月10日，尼克松就批准发出了这封信。

信发走了，尼克松的心情反倒紧张了——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怎样决定呢！

基辛格演欢还很有几分天才

信发走了，基辛格应该定下心来了，谁知他更放心不下了。

他放下手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的书刊，闭上眼睛，努力使这两位中国人的形象活起来，谁知越想心里越没有底，他不知毛泽东收到他们的信后会作何反应。

有人对他说过，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特别是毛泽东。

毛泽东会不会突然变卦？会不会使中美关系横生枝节？

其实，也不止是基辛格这样想，基辛格的这种想法实在是受了尼克松的影响。几天前，尼克松还说过，中国人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往回退？

几天来，不管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有些寝食不安的味道。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北京的信息。

消息照旧是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送来。他似乎很懂得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心情，车子开得飞快，赶到白宫就直奔基辛格的办公室。

基辛格表面显现得很是冷静，他和希拉里寒暄两句，才接过两张信笺。

照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据说，基辛格接到这封信后，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赶忙到尼克松总统正在举行宴会的大厅去通知总统。

尼克松正和尼加拉瓜总统碰杯。基辛格不好冲进去，急得在宴会厅门前来回踱步。

总统终于走出来了。基辛格走上前去，告诉尼克松：

“总统，北京复信了。”

他们二人并肩走进林肯厅，待尼克松把中国的来信读完，基辛格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深夜了，号称世界最强大的金元帝国的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信所激动。他们举起了酒杯，为了初步的成功而祝贺。

尼克松端起酒杯，眯起眼睛，望着窗外，许久没有说话。

基辛格问：“总统在想什么？”

尼克松笑笑反问：“你在想什么？”

基辛格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曾经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想了想说：“那么，我们把你的这次中国之行取个代号，就叫‘波

罗行动’如何？”

基辛格点头称是。美国人总是要把他们大的行动取个代号的，就像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他们也要取个“沙漠风暴”的代号一样。

美国人毕竟是美国人，就是他们起的代号也要体现十足的美国精神。本来是他们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他们却要把去中国比为马可·波罗。

尼克松还说：如果基辛格此行顺利，就给他发一个电码回来，这个电码是：

“Eureka”

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发现！

给尼克松复信前后，周恩来开始了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

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异常忙碌起来。服务员在这些进进出出的人中认出了叶剑英元帅，不过他可没有穿军服，整洁的中山装配上一付琇琅眼镜，颇似一个学者。人们也认出了姬鹏飞、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等外交家。

他们来去匆匆，小车子进进出出。他们干什么，别人都不清楚。当周恩来的车子来过这里几次之后，人们才感到这些行色匆匆者正在进行事关重要的活动。

如果他们告诉大街上的行人，他们是在准备接待来自白宫的客人。谁都不相信。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印象中，美帝国主义是中国头号敌人，是侵略、战争、杀人、放火……等代名词。怎么能把美国头子当成客人接待。

美国方面告知中国，基辛格博士将从巴基斯坦进入中国。对此，周恩来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他派出了曾经多次给自己驾驶过飞机，执行过许多次重要飞行任务的徐柏龄为领队的专机机组人员。

临行前，这些同志并不知是怎样的任务。他们见到周恩来严肃的神情，心中就明白了不少。

周恩来说，你们执行的任务非同一般。首先，此行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次，你们去接的，不是国家元首，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这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几位机组人员都表示，坚决完成这项重要任务。

周恩来还叮嘱他们，要注意礼节，这毕竟是接待一位美国政界要人。

……

7月3日，中国的一架伊尔—18型客机飞行至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弟。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这架飞机很快又飞回了北京。而徐柏龄和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服务员王今亮却神秘地留在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之后，7月6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从拉瓦尔品弟的机场起飞，一直消失在东方的云雾中。几个小时以后，这架波音飞机在北京的上空绕了一圈之后，降落在了座落在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

——这是在为基辛格秘密访华试航。

在南苑机场，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中国外交部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四人上了飞机。他们将到拉瓦尔品弟接基辛格博士。

就在中国方面作如上安排时，基辛格已经飞到了越南的西贡。

早在6月30日的晚上，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曾经举行了记者会，宣布

了这样一条消息：

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将于7月1日到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基辛格博士将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有关官员会谈……

——说的难听一点，这就是新闻的“欺骗性”了。发言人言之凿凿，跟真的一样。然而基辛格此行的其他事情都是幌子，到中国才是真正的目的。

7月8日，基辛格到达了巴基斯坦的新建首都伊斯兰堡。由他和叶海亚·汗总统导演了一场很有趣的活剧。

他们先在一起研究了此次具有冒险性质行动的细节，然后出现在政府宾馆的宴会厅里。

尽管外面暑气蒸人，这里却凉爽如秋。基辛格面带倦容，走在叶海亚·汗总统的身边。先来到宴会厅的人鼓掌起立。叶海亚·汗总统招手致意。

待大家坐定，舒尔坦告诉大家：“美国来的尊贵的客人亨利·基辛格博士，偶有不适，肚子痛了，这使我们感到十分的遗憾。”

叶海亚·汗笔挺腰杆，站起身讲话：

“本来，我要在这里为美国的客人举行盛大的国宴，但基辛格博士身体不适，我也只好遗憾的改期了。”

来参加宴会的官员们不禁窃窃议论，基辛格到底得了什么病？会不会是肠胃型的感冒，会不会是恶性传染病？也有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名堂的，但没有人能猜到他会进行一次中国之行。

叶海亚·汗总统说：“伊斯兰堡的气候不好，太热。我已作了安排，请他到北部山区的我的别墅去休息几天，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说：“感谢总统的好意，这样太麻烦了，就不要去了吧。”

叶海亚·汗总统似乎很固执，他坚持说：“基辛格博士先生，在我们的国家里，是由主人的意愿决定的，而不是由客人的意愿决定的呀！”

……

戏演完了，基辛格回到旅馆的房间里，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再有四个小时，他就要上飞机前往北京了，他还要作许多的准备。

他感到演戏是很累的。

越是累，越是无法入睡。虽说他从各方面研究了中国，但那毕竟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不知道此行的结果会是什么。

成败在此一举。

毛泽东和尼克松几乎同时签署 同意发表了震动世界的“7·15”公报

经过化装的基辛格戴了一付墨镜，一顶宽边帽子。他从饭店走出来的时候，好几个人都没有认出他。他未免又有几分得意。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

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是端大事不糊涂”“此人有文化”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身后是很有外交家风度的黄华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来迎接基辛格的车子是中国最高级的轿车“红旗”。这 141 种车子最明显的标志是前面的一面有机玻璃制作的红旗了。基辛格瞥了一眼，面色冷峻，似乎是担心坐上了“红旗”车，被他吃掉了一样。

一路绿灯。

他们很快来到了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 6 号楼。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从里到外充满了东方情调。

叶剑英举行的欢迎宴会是相当丰盛的。基辛格曾经以“中国通”而著称于世，却不会使用中国筷子。他对那两根木制的或是象牙制作的棍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他不能不承认，中国菜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基辛格急于想见周恩来，因为，见到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的成果能有多大。

很快，他被告知，周总理要到他住的 6 号楼来和他们举行会谈。

站在楼门口的基辛格看到周恩来的车子停下，周恩来从车内走出来。这位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似乎他就没有疲劳的时候。

他快步走到了基辛格的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和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他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头。并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

第一次的会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双方都在摸对方的底。周恩来的坦诚使基辛格感到折服。

周恩来对他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互相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充分了解。”

同时，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博学、敏锐也很感兴趣。用一句西方的话说，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佩服你的人格，佩服您的才学。

基辛格也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用了多大的精力来研究美国。研究尼克松、基辛格。他们阅读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调看了尼克松很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就是在基辛格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的讲话，毛泽东、周恩来都注意到了。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尼克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5 年，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了。“今天世界有五大中心力量”——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中国。尼克松在这个讲话中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

谁知周恩来提到“五极中心”时，基辛格还不知道，以至于周恩来拿了一份尼克松讲话的稿子给他。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持续到了晚上 11 点多钟。何时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觉得有必要立即汇报，就叫王海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

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工作至次日凌晨，经常是四五点钟上床休息。王海

容打电话的时间是在午夜 12 时以前，所以，那边的秘书答复说，请示了主席，可以马上来。

周恩来的车子开进中南海，便直奔了游泳池。

毛泽东晚年一直居住在这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说来难以置信，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经常穿的是一件大睡衣。也就是他的故居开放时人们看到的那一件。除非有了外事活动，他才穿上那身“毛制服”。

周恩来带着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走进房子里的时候，他依然是穿了那件睡衣。很随便的请他们坐下。

周恩来说：“主席，基辛格一行到了，我和叶剑英同志和他们谈了一次……”

毛泽东挥挥手，说：“那个不忙。”他转身问起了熊向晖有关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问“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情况……

毛泽东的此举，颇似画家在作画时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更有深意。事后人们才知道，他询问熊向晖的一些话是很有名堂的。

当时，中国的政界正在“批陈”，起因是 1970 年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陈伯达等人跳了出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彪迫不及待地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很是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于是，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的运动。在庐山，没有点“林副主席”的名，但知情人都清楚，矛头是对着林彪的。

毛泽东之所以把基辛格来华的事撂下，问了一通总参情况，是政治敏锐使然。熊向晖并不知情。

等毛泽东问完情况，周恩来才开始汇报基辛格来华的情况。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上两句话。这种插话是简短而精辟的。比如，说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谈精神，同基辛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可不像上次那样轻松了，一谈到实质问题，就发生了矛盾和对立。

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是求同存异的大师。谈不来的可以先不谈。基辛格重要的任务是安排尼克松访华，那就谈这个问题吧。

中国方面建议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夏天来北京访问。

基辛格思忖了一下，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时间太近了，这在美国可能引起震动。我们美国大选情况你是知道的。”

周恩来想了想，说：“春天是可行的吧。”

基辛格接受了。却又提了很多条件。美国总统出行，特别是到中国来，要有安全人员，要有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要有全球转播的电视技术人员……

周恩来说：“这些事情都好商谈。目前主要的事情是研究联合公告的内容。”

中国方面的黄华和基辛格开始就公告的草稿进行了具体的磋商。

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审定公告的初稿。毛泽东同意将这个公告的草案和美国人进行谈判，并定下了大的原则。——几乎所有的谈判都是这样，不论是跟美国人还是与苏联人，毛泽东都不去具体谈判的。也因为他有一位周恩来这样的谈判高手，不用他操这份心。

后来的谈判是双方都作出了适当的让步：

美国方面大致同意了中方提出的联合公告的草案。

中国方面同意了美国方面提出的公告发表的时间为7月15日。

同时，他们定下了以后联系的渠道——法国巴黎。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是联系的接头人。

……

1971年7月15日晚上，尼克松面带笑容地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正如我在过去三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轻松地读完公告，便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

中国方面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首都的各大报发了重要新闻。

这一消息惊动了美国。

这一消息惊动了世界。

巴黎的秘密渠道

——两位将军的接触

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开车来到了中国大使馆附近。他下车，步行，来到使馆门前，推开了虚掩的大门。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年轻人迎上来问道：“先生，您找谁？”

“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了总统先生给贵国政府的信。”

对方也用法语自我介绍，说：“我是韦东，黄镇大使让我接你。”

他们一块进了楼房内。很有点富态的黄镇大使正在等他。

寒暄。

两个将军握手的时候，似乎感到了一种相通的东西。

沃尔特斯把信交到黄镇手上，黄镇接过信，并不看，只是说：“我一定转交。”

沃尔特斯说了一句：“我对你们中国人保密的本领深信不疑。”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的成功。”黄镇将军把沃尔特斯送出了客厅。

这就是秘密渠道的第一次正式接头。

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曾和周恩来约定，如有十分重要的事宜，基辛格将亲赴巴黎和黄镇大使会晤。就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接通后约一个星期，基辛格就“潜入”了巴黎。

说潜入，一点都不假。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座机，是以训练飞行为幌子离开美国而到达巴黎的。他戴一付黑色的墨镜，戴一顶法国人很流行的帽子，坐的车子也是沃尔特斯租来的一辆破旧的汽车。

车子直接开进中国大使官邸。基辛格和黄镇见了面。俩人一见如故，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茅台酒、美国的西餐之类的笑话。

基辛格此次来是为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他先期访华的问题。

黄镇说：“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基辛格博士访华最好是在 10 月的下旬。”

基辛格觉得时间还可以，但提出了一个问题：“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家。”

黄镇突然笑容可掬，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我们难以接受。”

基辛格也不让步，坚持说：“布鲁斯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充分信任。”

黄镇知道这一点。但他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前，是不会作出任何答复的。

此后，基辛格先后四次到了巴黎的中国大使官邸。就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与黄镇进行磋商。

在与基辛格的接触过程中，曾经有过稍微大一点的波折。一次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预报时间问题；再就是基辛格访华要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的要点问题。

由于是公开访问，美国方面提出要有先期预报，中国方面是同意的，但时间上有问题。美方提出 9 月 22 日、23 日或在 10 月初发预报。中方认为，9 月联大正在开会，美国在联大要提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提案，在此时公布基辛格访华，是很不合适的。

黄镇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间，特别是在 9 月 22 日或 23 日。”

美国方面作了让步，同意在 10 月 5 日发出此预报。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 与周恩来发生争论

经过巴黎渠道的详细商讨，基辛格二度访华的“勃罗二号”得以成行。他的飞行路线是严格按照尼克松将要飞行的路线走的。12 月 22 日抵达中国的上海，稍事停留之后就飞到了北京，住进了他已经熟悉的钓鱼台国宾馆 6 号楼。

他此行带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二是尼克松访华后要发表的一份公报。

日期问题没有费太大的周折。他提出两个日期，即 1972 年的 2 月 21 日或 3 月 16 日。

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意思。

基辛格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把他带来的“公报”草稿交给了周。并且说明，这个初稿是尼克松总统批准了的。

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对他们精心准备的初稿是那样的不买帐。他和周恩来面对面坐着，周恩来一脸严肃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告诉他：

“毛主席看了你们准备的公报草稿，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公报我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斩钉截铁的。

基辛格的态度也很明朗，坚持他们起草的公报，认为他们的公报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中美双方的目的”。

“和平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我们的意见是摆明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把分歧掩盖起来，在公报上看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基辛格说：“总理阁下，我们起草的公报是按国际惯例的，如果在公报上写明中美双方的分歧，那不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么！”

周恩来不这样看，他说：“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二十多年，分歧不是必然的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

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缓和了这种僵局，他说：“我们也拿出一个方案的初稿。你们先看看。”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想法，尼克松有尼克松的想法，双方的分歧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详细研究了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意图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上把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分歧全写了上去。

一个难眠的夜晚。北京秋夜是正好睡眠的时候，美国的代表团却没有一个人能入睡。还是基辛格突然转过弯来了：把分歧公开出来，西方盟国、东方的朋友不就放心了嘛！否则，是有周恩来提出的问题：谁相信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呢！

在接着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表了态，他说：你们的初稿的方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接受，但是你们的某些提法太僵硬，我们难以接受。你们报纸、电台常用的文字，好像是在凌辱美国总统，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美国人让步了。

周恩来和蔼地说：“有了大前提，事情慢慢谈，还可以修改。”

基辛格答 25 日拿出美国方面修改的方案来。

第二天的会谈又陷入了新的僵局。

周恩来申明的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 二、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 三、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的态度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的。

气氛紧张起来。人们的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译员的声调也生硬起来。

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你们中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的。”

周恩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很有点耐心地对谈判对手说：“什么叫背弃老朋友？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占着我们的领土台

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对的。你们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就应该撤走你们的军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我们则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博士不动声色，听周恩来总理把话讲完，他才说了一通他的道理：“总理阁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参议院、众议院会对总统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总理阁下提出的问题，总统如能连任，将在下一届解决的。”

周恩来是了解美国国情的，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讲话，也的确受到了美国一些势力的攻击。尼克松的日子确实是非常不好过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为此中国人要放弃原则。

周恩来说：“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略知一些的。你们为了所谓‘老朋友’，可以使自己陷得不可脱身吗？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不能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吧！”

以守为攻，使基辛格无话可说。

台湾问题一直拖到了基辛格离京的前一天。最后还是美国人想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周恩来听完翻译，笑了。他觉得基辛格确有一套。他说：“这个意思可以接受，但有的词句还需推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应用‘部分’”。

基辛格也笑了，但坚持说：“部分比省更通用一些。”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这个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汉语中却有一些差别。

最后周恩来说：“看来我们趋向一致了，有些问题尼克松总统来华时还可以再谈。

……

尼克松访华前奏曲

有人说，当国家元首最风光的时候不是在自己统治的国内，而是在国外。此话真有几分道理。

因为国外把你当贵宾接待，自然是要风光一些的。鲜花、仪仗、军乐、礼炮、国宴，以及高级的总统套房，这在国内是很难享受到的。

然而，风光归风光，难处恐怕也只有国家元首最清楚。

为了给尼克松的“风光”作安排，美国派出了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为首的先遣队来到北京。

他们要为总统的安全问题、接待问题、记者采访等问题同中国进行磋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出访，有关整个美国的形象。是一点闪失都不能出的。

首先在新闻转播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尼克松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要通过太平洋上的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等新闻。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和中国方面的熊向晖进行具体商谈。

熊向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希望美方帮助租用一颗卫星。

齐格勒说，你们不必租用卫星，只需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卫星地面

站就可以了，费用由美国方面负责。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租用卫星要花一百万美元。

熊向晖把齐格勒的说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含糊。”

周恩来向熊向晖口述了三项要求：

一、请齐格勒负责为中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为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

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当熊向晖再次与齐格勒会晤时，把如上的意见合盘托出后，齐格勒笑了。他觉得这样的谈判对手很有意思。

经请示，他同意了中国的意见。

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安全问题，就更加复杂也更加可笑了。

首先是有关的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说台湾方面有人策划用伪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袭击美国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又无法证实。中国方面通过巴黎的秘密渠道正式转告了美方，美方更加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中国负责总统座机在12海里以内领海上空的安全。美国方面自然要保证他的总统座机的全部航程中的安全了。

别人在为总统忙，总统自己也在忙。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到中国访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和毛泽东的握手意味着什么他是十分清楚的。因而，他的准备工作一点都不敢懈怠。他几乎研究了所有关于毛泽东的书。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以及安德烈·马尔罗。当然还有那位不久前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毛泽东访问记的斯诺。他本来想找斯诺谈谈的，偏偏听说这个人很不买他的帐，也就只好作罢了。后来又听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了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纪录片《中国》，他也派人找来细细看了一遍。

……

就在尼克松出访前几天，他还把当过法国部长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听他讲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马尔罗是个十分健谈的老人。他把当年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他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吗，毛见到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会想‘你比我年轻得多！’”

马尔罗还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的身边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而且几次和马尔罗说过，他没有继承人。

……

尼克松听了半天，还是不能设想他与毛泽东的见面会发生什么情况。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共产党大国的领袖呀！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握手

尼克松访华的描述，海内外有许多版本，细细研究会发现，所有这些材料，大都出自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文章。中国方面除了一些只鳞片爪的文字，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大块的文章。有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也是捕风捉影而

已。尼克松回忆说——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恨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

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他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是毛泽东正在病中。一个多月以前，这位历史的巨人突然休克，经抢救才醒过来，此后的日子，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时整夜咳嗽。

他虽然身体不好，却时刻关心着中美关系的进程。

1972年2月21日的上午，刚刚醒来的毛泽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到了没有？”

工作人员赶忙向他报告有关情况。到中午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见他吧。”

他的决定就是命令，机要秘书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工作人员一片忙碌。他们有的给他理发、刮脸；有的整理客厅。

随后的几天里，他在病榻上审定了乔冠华和基辛格绞尽脑汁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特别是有关台湾一段，毛泽东是逐字逐句推敲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他说：“可以了吧！”

“公报”就这样定下来了。

谁知，美国代表团内，有人又对此段文字提出异议，要求修改。此事汇报到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有影响明天公报发表的可能性！”

斩钉截铁。

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和基辛格的谈话， 也到了海阔天空的地步

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历史把他们拉到了一起。

他们在一起有话谈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美国高层人士中，见过毛泽东次数最多的人当是非基辛格莫属了。

尼克松和毛泽东只见过两面，他却最少见过三次。每次见面，他们都有许多话要谈，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也谈世界格局。

这里，我们辑录他们的一次谈话节录，便可见他们关系之一斑了。这段文字发表在今天的《发展导报》上。

“……

主席：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 FRIENDSHIP（友谊）

基辛格：我们方面的感情也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主席：咱们谁也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那些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不信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 EDGAR.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是这样的，只有相互信赖和诚实才能建立友谊。

主席：你比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强得多，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主席：对，我赞同你的观点。

基辛格：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席：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都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主席：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

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主席：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主席：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对，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总理（对主席）：应该帮助蓬皮杜，这一点他（指基）也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主席：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辛格：对，两家联合。

主席：对，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美国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基笑）

主席：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主席：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主席：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先生，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接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主席：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翻译：MODEOFACTION（行动方式）

基辛格：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主席：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主席：中国人排外的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 60 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 60 个美国人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

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很不幸运。

主席：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 100 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 13 年，占领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还有治外法权。

主席：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他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他也赔不起。

周总理：一赔就要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

对于这次会见，基辛格有过一个较为完整的回忆录。我们不妨也把他的回忆摘录一小部分，相信读者诸君是能从中读出点味道来的：

2 月 17 日这次召见我时，我正在国宾馆同周恩来会谈，已经是晚上 11 时，周宣布：“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我们坐上周那辆 1939 年型式的十分陈旧的座车，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往市中心。这时是深夜，街道上已经行人绝迹。车子快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时向左一拐，穿过与宽广的马路平行的长长的红色宫墙，进入一座由红漆圆柱支撑的传统中国式的大门。车行约一英里，两旁高墙后面有一些朴实的宅院；接着沿湖岸走，湖对面有几处苏联官府式的建筑。毛的住处很简朴，像一个中层官员的住宅似的。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门廊下面，那里看不到有何特别的警卫措施。进去后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便看到毛在摆成半圆形、蒙着褐色罩布的沙发前面伫立。屋里放满了书：毛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墙的书架上，到处都是。

毛说了几句风趣话，中国摄影师大照其相。我们后来才得知，次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往往是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的可靠晴雨计。1973 年 2 月这一回，《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报道了我们的会见，还在头版刊登了两张照片；这是友好的绿灯。

这次会见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美中友好关系要在毛还健在时确定下来。毛很快就表明这一点。当我们朝着沙发走去，摄影师还在屋里照相时，他说道：“我看来还不错吧，”（他猜透了我的心思，我当时的确觉得他的气色比一年前会见尼克松时好一些。）“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罗。”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法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但不知怎么倒不使人觉得突兀。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正如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接着谈笑风生地与我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他的言论看起来很方便，可是他的下属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指示。毛拐弯抹角地用一句话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了。他说，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开玩笑地向我挑战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他笑起来了。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我回答道。

毛对此犹不满足：“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他坚持说。

毛紧接着赋予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以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坚持说。“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考验我们一下。”他开玩笑说。但他却没有说明我们可以把这个考验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又何从知道中国人不会趁机占便宜。毛的意思是说，冒小风小险没有什么意思。他谈得来劲儿，索兴对大规模情报活动有没有用也表示怀疑起来。他确实认为情报部门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它们知道政治领导人需要的是何时，报告就“如同雪片似的”飞来了。但在真正关键的问题上，它们就不行了。他说，中国的情报部门事先不知道林彪搞阴谋，也不知道我想访华。他猜想我们的情报机关也给我们带来类似的问题吧。

一句话，大的目标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赞同地提到尼克松 1972 年时对他所讲的，中美两国互相接近是出于各自的需要。毛把这层意思发挥了一下，达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说，有时我们不妨互相骂几句，反而会增强国内对我们合作的支持——只要双方不要假戏真演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

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腾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地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之上。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预料各方将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各方都有义务不使那些原则妨碍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这简直可以说是现代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古典定义。“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原则，”我回答说，谈得投机起来了。“而且如果我们双方用同样语言说话，反而会造成混乱。”

我们就是用这种近乎诙谐的话语来谈论世界形势的，一直谈到清晨一点半钟。

尽管这位主席主要谈的是外交政策，然而他却摆脱不了在他晚年时北京内部问题对他的缠扰。在中国历史上，这类问题往往好像随着自己的势头发展。毛一再向我提示说他受到激进派的压力。但是他说得很隐晦，我这个不机灵的西方脑袋瓜未能立即体会他的意思。“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毛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毛不放心我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有所指的，但还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后来，温斯顿·洛德的妻子贝特给我作了注释：当时中国的局势远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稳定；女人——指毛的妻子、激进派的头子江青——在中国兴风作浪，对现行政策发出挑战。

然而，个别的人物倒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毛在其最后那些日

子里面临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这个几百年的难题。在历史上，中国更多地是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和优越的文化来确立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不像欧洲政治史的特有现象那样靠显示赤裸裸的武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毛的革命既革中国旧价值标准的命，又对它们加以肯定。毛主义力图克服中国的旧事物，但它又像传统的儒家一样把社会看作是一种伦理的和教育的工具，只是注入了这位湖南乡下农民的儿子所规定的、与儒家截然对立的学说。毛在 1966 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除了中国以外哪个国家能把一个流血的政大动乱冠以“文化”二字呢？——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铲除现代社会中不符合中国特性的东西，为了打击西方的影响和官僚主义化，以免中国堕落和被纳入世界普遍的文化之中。

到了 1973 年 2 月我们会晤时，这位年迈的主席已经意识到，他最近那次宏伟的设想虽然戏剧性地表示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却注定它从此陷于衰弱。他如今已懂得——那怕只是暂时地认为——中国如果继续与外部世界隔绝，就必然丧失影响，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他不无感伤地表示，中国还要派人去国外留学。他把文化大革命停了下来，悲哀地说，中国人民“非常顽固和保守。”他说，他们应该学学外语。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意义所在。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

毛泽东把轰动美国政坛的 “木门事件”称为“屁”

尼克松曾经说过，自己的政治寿命没有多长，如果连任的话，也只有 8 年。

他连任了，却又中途下了台。

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不光彩地下台的总统。

在大洋彼岸的毛泽东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在和基辛格的另一次谈话中，把自己的观点毫不保留地端了出来，叫基辛格惊讶不已。

事隔很久以后，基辛格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历历在目：

197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毛泽东看上去比我过去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两人年龄都要大。他已经 80 岁了。

这都是标准做法。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

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我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说。这清楚表明：遏制苏联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我，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而且周恩来也没有每天向他汇报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任何不适当的、可能使人倾向于迎合迁就苏联的危机感。他反驳说：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他说，美国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为基础的。当然，同样真实的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任何灵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辩论策略问题并无意义。我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他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发现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苏政策，而是我们的国内局势，具体地说，就是水门事件。如果我们由于国内分歧而削弱了执行遏制战略的能力，这个战略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客观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

失业人数似乎减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较稳定。因此，看来并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水门事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制度，甚至最高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他并不关心我们国内上演的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门事件使他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

关于我们长远的对苏政策，毛泽东认为，莫斯科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它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中国边境上。事实上，苏联的整个兵力中只有 1/4 是布置来反对中国的——这多少有些估计过低。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反过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是全球安全的关键。真正的危险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保持地缘政治均势的需要。如果一切遭受苏联侵略威胁的国家携手合作，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苏联人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它们不合作，每个国家都会陷入危险境地。换句话说，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然后，毛泽东按照这种观点评价了欧洲各国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迈的领导人对于遥远国度里的国内政治居然了如指掌，不用任何提纲就能

够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推演出结论。毛泽东的信念的核心是，虽然我们的欧洲盟邦由于各种原因而犹豫不决，它们最终绝不会受苏联人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从而抛弃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重要的是不能把暂时令人恼大的策略同长远趋势混为一谈。即使我们有些朋友似乎犹疑不决，我们必须保持坚定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从我们的领导中得到勇气。

毛泽东并不是一口气说出这些意见的，相反地，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话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来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一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而且使你无法得出其他结论——同时又使我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

毛泽东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国际形势进行基本分析，然后突然转到台湾问题；他并不是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间接暗示出一种解决办法。他说，他听说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在美国还有大使馆。我肯定了这一点。“但是苏联并没有要求你们首先取消这些大使馆才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吧！”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建立关系时苏联还承认这几个国家。但是，如果毛泽东是在暗示同台湾的关系不一定会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我没有理由要来指出这种微妙的历史区别；因此我表示同意他的见解。周恩来也帮忙插话说，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但进不了联合国。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默许台湾保持单独的法律地位，只要求把台湾从联合国开除出去就行了。

毛泽东的谈话又转到另一个方向，用更为绕弯的方式做了同样暗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信徒，他一开始就肯定矛盾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我们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他也不相信和平过渡；台湾领导人毕竟是“一群反革命”。

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并不急于实行他那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另一方面，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也无需按照中国国内争吵的锣鼓点慢条斯理地进行；没有必要等那么久：“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还是暗示可以把正常化同台湾问题分开对待？暗示关系正常化的速度将取决于我们？它至少是暗示：中国并不企图在以后很快就吞并台湾；台湾问题肯定不会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障碍；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受到压力。我倾向于相信，同周恩来前一天的做法一样，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些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我们无法知道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因为中国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不容许我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意进行探索。这件事对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已经清楚他说明，中国“一百年”也不会从他谈的一般原则中做出政治结论。为了避免我们不能领会他的含意——西方人的敏锐性从来都是很难说的——他把台湾的情况同香港和澳门进行了比较。中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并不着急（事实上还同“占领”这两个地方的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台湾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不仅没有施加压力的迹象，而且明确

地把它抛到一边去了。接着，毛泽东就转到中东问题上来，似乎是故意把台湾问题放在讨论如何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遏制苏联力量问题的过程中来谈的。他回顾了他对我在宣布警戒状态那天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一次谈话的反应，借以表明他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对不幸的黄镇来说，我的通报是突如其来；因此他还是按照老一套办法重申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支持。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把这次谈话放在正确的背景上来看。

然后，毛泽东几乎逐一分析了这个地区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强调指出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对阻碍苏联扩张的重要性。他对伊拉克和南也门感到不安。他敦促我们加强在印度洋的力量。毛泽东的谈话都没有提纲；他的同事也没有给他任何提示，只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

毛泽东在环顾世界形势的最后转到日本问题上来。他赞成我决定在回国途中到东京停留几天。一定不能让日本感觉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他保证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毛泽东以赞同的口吻说。“其次才是我们。”这位世界革命的鼓吹者将尽力使日本继续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办事；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拘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种情况会加强沙文主义情绪。我们的任务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指我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的设计师之一，我个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怕你。你应该努力减少他们的恐惧。”这些话出自他的口中显然是不协调的，中国对美日同盟的热烈支持同我第一次访华时他们表现的猜疑完全相反。建立联系不过两年，这位两鬓皤然的革命家就在教导美国的国务卿如何保持盟国团结了。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我们在保持全球均势方面却成了具有默契的伙伴。

谈了两个半小时以后，周恩来表示该到告别的时间了。但是主席对美国国内局势还放心不下，要谈下去。他的政治理论曾经预言美国国内会出现动乱，而且鼓吹这种动乱。但是现在他最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像一位交响乐的作曲家一样，最后又回到他开始的主题：他多少比较同意现在的总统的看法，但是水门事件会不会削弱这位总统的权威呢？这场混乱可能产生一位什么样的新总统？他“怀疑”如果民主党总统上台可能会使孤立主义死灰复燃；我怎么想呢？我深信：如果伪称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任期最多也不会超过1976年，而且可能提前结束——能够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我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主要政策方针都将取决于现实；但是，在得到这个教训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空隙是可能的。毛泽东抓住了这句话的微妙含意，他立刻反击说：“那么你似乎同我一样。我们双方多少都有点怀疑。”

他对美国军队可能像民主党参议员不断建议的那样撤出欧洲特别感到不安。我说，我们两党在“面临挑战时立刻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上也存在差别。毛若有所思地说，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词令；我实际上是指冒战争风险的意愿，他大笑着说，他希望发生战争时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我想制止这种猜测：“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他听到这种保证并不那么高兴，所以在分手时他警告说：“苏联欺软怕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对我们可能喜欢打仗的担心。

当我们正要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时，毛泽东突然重新提到我们2月间谈

话的主题：我们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阴谋诡计。将近 3 小时的会晤就此结束。主席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我们送到外间接待室——这是一种非凡的荣誉。当他同我们告别时，又照了一些相。他对我说：“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是折服了。 毛泽东怎样着尼克松呢？

有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朋友认真地告诉我，崇拜毛泽东的，不仅是中国人。有些“老外”比中国人还崇拜。有的人来中国访问，一定要见主席，如果没有见到就不肯走，就不高兴，认为他的访问不圆满。

毛泽东以他独具的魅力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他的对手。

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写了不少。我们这里有他下台以后来中国访问时，他和毛泽东最后见面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

1976 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的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 82 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止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

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尼克松就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

毛泽东怎样评价尼克松呢？

人们没有看到他亲手写的文字，也没听到过他的有关讲话。

是没有吗？不是。只是人们还没有看到而已。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的。

我们期待着……

中国军队的统帅和盟军元帅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握手

蒙哥马利(1887.11.17——1976.3.25)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之一。北爱尔兰人血统。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和皇家军事学院受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战后留任军官,以干练和坚强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任师长,在法国战场作战。从敦刻尔克撤退后,他在英格兰东南地区任司令官。1942年8月去北非任英国第八军军长。他遏止了德军的攻势,并在阿拉曼战役后把隆美尔赶出埃及。1943年5月迫使德军在突尼斯投降。盟军顺利地攻入西西里主要归功于他。1943年参加攻占西西里和登陆意大利。1944年统帅盟军进入法国,6月6日指挥盟军进入诺曼底。他晋升陆军元帅后,率领英国和加拿大军团横扫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1945年5月4日在吕纳堡荒原接受德国北方军的投降。1946年封子爵。1946~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1948~1951年任西欧联盟主席。1951~1958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蒙哥马利始终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坚持每次出击以前,在人力物力上做好充分准备,虽然对于战争来讲延缓了进程,但却稳妥可靠并保证了他在部下中的声威。

——摘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是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位在电影电视中总是戴顶紫红色贝蕾帽的元帅?是新中国的神秘感?还是他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研究重点?

我们不得而知。

他自己说过,1959年访问莫斯科时,漫步在红场,思索着红色苏维埃领导人同他的谈话,他意识到从长远的观点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因而产生了访问这个国家的念头。

此时,他已经退休。这位退休的元帅,有志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而且是战略性的研究。

中国的领导人没有拒绝这位无职无权的勋爵,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他向毛泽东提出友好访问的要求后,得到的答复是: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中国人是宽容的。

——这位英国元帅在他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攻击过中国。

他说:“……在远东,倘各国恐惧外来侵略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并据此推行健全而一贯的政策。”

从攻击中国,到愿意访问中国,仅仅两年的时间,这的确是不小的转变。中国人当然是欢迎的。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的时候。

1960年的5月,蒙哥马利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黄土地。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了面。“听”他们谈了许多这个国家的情况。

一年之后,他再度访问中国,想搞清这里的“庐山真面目”。

两次来中国,都只带两样东西——耳朵和眼睛。无论如何,他对这个文明古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写了一本书,纠正了以往他对中国的错误看法……

最令他兴奋的， 莫过于“听”毛泽东谈话

多年的军事生涯，使蒙哥马利养成了很耐心“听”人讲话的习惯。在“听”的过程中，他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材料，也能“听”出谈话者的潜台词，还能听出谈话者的隐衷……

他不仅有“听”的习惯，而且善于在听的过程中发问。

最令他兴奋的，莫过于“听”毛泽东谈话。

见到毛泽东之前，蒙哥马利的心中无底。西方世界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一个不近人情的统治者，甚至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为此，蒙哥马利曾询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听完后大笑，对他说：那些说法很不正确，毛泽东的样子像一位和蔼的老伯伯，他自己受过许多苦难。

毛泽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蒙哥马利研究了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毛泽东的材料，还是得不出一个明晰的印象。

此时，走进鲜花盛开的庭院，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伸出改变中国命运的手同他相握，他感到那手软绵绵的，像女人。他看到的是一张和蔼的脸，脸上没有青青的胡茬。下巴也很像女人。毛泽东的个头很高，他需仰视他的眼睛。这双黑眼睛是和善的，却透着深邃的目光。他意识到这双眼睛有一种凝聚力。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幽默的令他吃惊：

“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

蒙哥马利当然知道，联合国曾经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朝鲜。蒙哥马利前些年所写的回忆中也曾有过这样的观点。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毛泽东会用这样的口气，提出这样的问题。

幽默的谈吐，很快缩短了两人之间的“东西方距离”。及至第二次谈话，他们竟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

这正是蒙哥马利所盼望企求的。这可以满足他“听”的欲望。

这种距离的缩短，也许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蒙哥马利在回答别人指责毛泽东“冷酷无情”时曾经这样表述过：“我想，如果他在追求他的目标时不是冷酷无情的话，他将永远不可能取胜。我们只要研究一下1923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如果一个人要从事某种伟大的事业总会有许多人反对他。我在1926年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参加的一次青年士官举行的辩论会上，辩论的题目是：《冷酷无情是在战争中获得全胜所必要的》……”

当然，“冷酷无情”一词在西方世界的含义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做什么，决心去做它，无情地对待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现象和障碍物。蒙哥马利不否认，在他的军人生涯中，有时就是冷酷无情的。

他和毛泽东交谈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到中国人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几乎无所不包。

蒙哥马利请毛泽东告诉他，新中国建立以后，他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的主要担忧是什么？

毛泽东的回答很简单：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经验。

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

蒙哥马利感到，毛泽东是清醒的。

因此，他问毛泽东：在权力下放和集中控制的问题上，你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放松一下——把适当的权力下放给各省的省长和党委书记。

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然，他对这位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提出的问题表示新奇和钦佩。看来这位元帅对中国确有研究，并善于抓住敏感和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回答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控制必须很紧，那时食物、必须的商品都很缺乏，没有别的路可走。后来情况好转，曾决定放松一些控制。以后又发觉，下面缺少经验，出了问题，又遇上连续三年歉收，因此不得不重新采取集中控制的措施。

“主席先生，你是否认为已经找到集中控制和权力下放之间的正确分界线？”

“已经基本上找到了。”

毛泽东回答的比较肯定。——这可能是他深思熟虑的问题。

关于人口出生和死亡率的问题，他听到了毛泽东很有趣的谈话。毛泽东说，50年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0多岁，现在是50岁以上。现代医药的发展破坏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天然平衡。

关于“计划生育”问题，1949年刚取得政权时，曾经认为有必要采取节育措施，后来随着收获的增加，节育被放弃了。蒙哥马利不无幽默地说：中国“让人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蒙哥马利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的力量，他非常严肃地说：“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侵略了。”

“我并不愿这样设想。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后，便要攫取国外领土。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国家。”

“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很难预料。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我们只要求别人不干预中国的事情……”

蒙哥马利听得入神。等毛泽东讲完，他又说：很可惜，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闭门的社会。”这种政策，使西方人不能很了解中国，造成了许多曲解。

毛泽东自信地说：西方人到哪里，哪里就道德败坏。

显然，不愿冒道德败坏的危险并不是中国拒绝西方记者和游客的唯一理由。毛泽东说是一个理由，这不能不令蒙哥马利感到难过。因为他是西方人，他知道西方的道德水准。毛泽东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事实。

但中国也不应该是“闭门的社会”。蒙哥马利固执地认为，“闭门的社会”对中国、对世界都不利。

中国的“总统”

刘少奇给蒙哥马利的印象是：此人有高度的智慧，讲话缓慢，语调温和。是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好动和果断的行动家。他注意到了刘少奇一头灰白的头发，这使共和国“总统”显得更趋老成。

“听”刘少奇谈话时，他意识到：这位领导人是在幕后，而不是像周恩来那样在台前。但他起着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农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总统”不能不关心农业问题。

少奇穿布衣布鞋，坐在沙发上，慢言细语地谈到：中国在历史上大约每100年就要遭受一个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这是一个周期，是大自然的规律。前一次灾荒是在80多年前，那个时候，可谓饿殍遍野，人心惶惶……

刘少奇的话，使蒙哥马利联想到他在60年前来中国的情景。那时，码头上，街道上，到处充斥着讨饭的人群……

刘少奇说：中国革命改变了过去的一切，从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我们靠自己的资源养活了我们的人民，现在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不得不向外国购买一点粮食……

蒙哥马利很想听听刘主席对战争、对核武器的看法，此时，刘少奇却向蒙哥马利提问了：

“你对核武器、原子弹怎么看？”

蒙哥马利每时每刻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观点。他说：很多人想很快废除并销毁所有的核武器，这实际上不可能。

刘少奇听得极其认真，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谈话。

蒙哥马利说：在英国，不断有“禁止核弹”的示威游行。呼口号，挂横幅标语，反对原子弹这种东西。这些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由于拥有核武器才制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蒙哥马利的这种看法，刘少奇未置可否，依然认真听着。这回不是蒙哥马利听别人的，而是别人听他的谈话了。

蒙哥马利认为：核武器的销毁，要等到东西方的不信任和猜疑减少了，裁军协议达成了，所有国家的武装部队从别的国家撤回他们自己的领土以内之后。

对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国家元首表示赞许。同时觉得这位英国元帅有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英国在别国领土上是有武装力量的。

蒙哥马利强调说：“销毁核武器，是裁军计划中最后的项目，而不是第一项。”

刘少奇连连点头，灰白的头发令人肃然起敬。

谨慎的“内阁总理”

“周恩来和毛不同，他出身高贵，是一个官宦子弟。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很有才智和非常聪明的。的确，就脑力来说，他是杰出的。他的思想敏捷、清晰，说话明确，举止优雅，性格极其宜人……”

后来，蒙哥马利在回忆中这样评价周恩来。

他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兴致盎然的。通常是他提出一个问题，周恩来做回答，颇有点“答记者问”的味道。周恩来懂法语，也粗通英语，但他却讲中文，由浦寿昌译成英文。浦寿昌曾在哈佛大学获过学位，翻译水平极佳，蒙哥马利对此很是赞叹。

蒙哥马利问：中国当前的困难有哪些？准备怎样克服？

面对这个“巨大”的问题，周恩来却从很具体的方面做了回答。

他说：连续几年的歉收，产生了累积的影响，这是主要的困难。解放以来（他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解放”）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正在学会怎样对付“老天爷”带来的自然灾害，我们慢慢懂得了哪里发生错误，哪里需要改变，哪里需要下放权力，哪里需要进一步的集中控制……

周恩来谈到人民公社的问题。他说：某些公社是太大了。一个公社分为若干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队。公社规模大了，不容易控制。目前已调整为一个生产队 20 户到 30 户，100 多个劳动力。

蒙哥马利觉察出此时周恩来的谈话与一年前略有不同。一年前，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三面红旗”。

当然蒙哥马利不可能知道，中共中央在春天决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国的“高烧”开始降温。——但他凭直觉发现，周恩来的调子有所改变。

蒙哥马利问：面对中国目前的困难，是否将接受外国的援助？

周恩来的回答令蒙哥马利感到非常朦胧。他说：过去，我们接受过财政援助（指苏联），现在正设法偿还。因为我们不想对任何国家负有义务。

——他既没有说拒绝外援，也没有说接受外援。

他强调说，我们力求进出口贸易平衡，需要的是互惠或交换基础上的贸易，需要技术援助，只此而已。中国不向任何外国要求任何东西。

蒙哥马利感到，这个国家有点“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味道，“听”毛泽东谈话时，他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这种“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国家关门闭户已经有过许多年的历史了。

话题自然转到中国同苏联的关系。

当时，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事实是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关系相当紧张。

周恩来怀着良好的愿望，或者是出于一种策略，同蒙哥马利说：我们和苏联没有分裂，中国始终感谢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和指导。关于苏联召回技术人员拒绝再派来的“谣言”，“完全不确。”

蒙哥马利听话听音，“听”出了中苏关系的裂痕，他推断说，中苏关系处于冷淡阶段，中国不准备公开破裂，并将做出让步来避免这一情况。

他的推断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后来，并没有按照他的推断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作为一名军人，自然关心中国的军队武器装备。蒙哥马利问周恩来：你们反对核武器，你们是否发展核武器呢？

周恩来痛快地告诉他：当然。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进行核试验。我们靠自己的科学家来发展。

“你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吗？包括俄国？”

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们不依赖任何国家。毛主席说过，自力更生。说这话的时候，周恩来充满自信。

蒙哥马利感觉到，中国将在 1963 年或 1964 年突破核障碍。

元帅的感觉异常准确。1964 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宴会上的元帅和将军

蒙哥马利元帅见到的中国元帅是陈毅。

陈毅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退休，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

第一次见面，蒙哥马利就被陈毅的笑声打动了。那坦率、爽朗的笑声里，满带着一个军人的气质。当别人介绍这位外交部长也是元帅时，蒙哥马利说：“我们是一个量级的人！”

陈毅说：“哪里哪里，我这个元帅指挥的是中国士兵，你却指挥了好几个国家的士兵。”

军人身上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如果时间允许，他们很可能探讨一些军事指挥的问题。然而，他们都很匆忙。

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感。蒙哥马利说“不，只能说有的人缺少幽默。”

为欢迎蒙哥马利的来访，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邀请了一批军人坐陪。——共产党的军人和原国民党的军人。战胜者和战败者。这些人除了陈毅元帅、李达将军外，多是做“政协”职务。

“政协”这个名词，很令蒙哥马利费解。这和“统一战线”一样，是中国的专有名词。这个“政协”和“统一战线”，囊括了诸如末代皇帝傅仪，以及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宋希濂这样的人物。

蒙哥马利饶有兴致地同他们攀谈起来。

陈毅元帅指着杜聿明给蒙哥马利介绍：“这位是我的对手。”

蒙哥马利很惊诧，问：“政治上的对手？还是别的对手？”

“军事上的，我们在1948年打了一仗，打得很凶啰！”

翻译告诉蒙哥马利，在淮海决战的时候，杜聿明是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曾率领三个兵团同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对阵，杜幸明的部队被全歼，他本人也被俘。

杜聿明拱拱手，说：“那时国民党大势去矣，兵败如山倒。”

蒙哥马利问：“那次战役中，你共有多少士兵？”

“100万。”

蒙哥马利很不理解他说：“有100万人的军队，不应该打败仗。100万啊！”

杜聿明说：“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有200万！”

“哦？”蒙哥马利看看陈毅。陈毅哈哈大笑，蒙哥马利顿时也跟着笑了起来。

“突然袭击”式的访问

蒙哥马利的参观访问，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不仅善于用耳用口——听和问，而且善于用眼睛观察那些细致入微的东西。甚至有时搞点军事上常用的他很习惯的“突然袭击”。

他突然对浴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想看看赤身裸体的中国人。中国
官员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

延安的9月，天气依然很热。夜晚却很凉。主人为远方而来的客人准备了5斤重的棉被，怕他们适应不了黄土高原的气候。

蒙哥马利元帅倒是真的不适应。主人的热情过度了，热得他睡不着。他

说他从未盖过 5 斤重的棉被。

睡不着，他早早就起了床。天刚麻麻亮，袅袅炊烟和淡淡的晨雾交织在一起，把延安的标志——宝塔遮住了。

“元帅，我们出去走走吧。”陪同蒙哥马利来延安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用英语同他打招呼。

蒙哥马利感到正中下怀。他们一行人走出住所，来到街中心的自由市场。

当时，农村正试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日趋繁荣。天刚亮，赶早市的人们就肩挑手提。熙熙攘攘地来了。

蒙哥马利走到一个卖小吃的摊子前，指着用棍子串起来的油饼，问：“这东西多少钱一个？”

小贩通过翻译告诉他，5 毛钱一个。

他又仔细端详了一阵，问：“这有多重？”

小贩拿起秤称了称。告诉他有 3 两多——150 克。

他认真核算了一下，才说：“这价钱不贵。”

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叫卖声此起彼伏，蒙哥马利兴致勃勃地同卖镰刀卖蔬菜的广泛交谈。卖主对这位高鼻梁的外国人投以惊异的目光，不过没有一位向外国游客推销自己的土特产品。

在市场上转了一圈，蒙哥马利忽然在一栋房子前面停住了。他指着“公共浴池”的招牌问翻译：

“这里是干什么的？”

“浴室。公共浴室。”

“我可以进去吗？”他转身问熊向晖。

熊向晖幽默地笑笑，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

蒙哥马利听了哈哈大笑，径直走进浴室。

随行的中国人都惊愕了。这位元帅怎么突然对公共浴池产生了兴趣？他为什么要到浴池里去呢？

翻译告诉他，这里的浴池一般有两种功能，白天供人们洗浴，晚间还可以给临时找不到旅店的人留宿。

这时，浴池的门口已经有人进进出出了。有的拎着换洗衣服，有的干脆在肩膀上搭条毛巾。蒙哥马利朝人们微笑着，来到澡塘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透过乳白色的雾气，看到一个大浴池。

陪同者原以为这位元帅猎奇，看看中国小城镇的澡塘，谁知他竟来到池边，同泡在水里的人们打招呼。

正在水中洗澡的，多是中青年，也有那么一两个少年，猛然看到一个肤色与自己不同的洋人，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你瞅我，我看你，特别是那几个小孩，害羞地直往一边躲。

蒙哥马利沿着大池塘转了一圈，仔细审视了浴池内每一个人的裸体，然后走出了澡塘。

如果一位雕塑家或者画家这般步入浴室，也许还不难理解，而他——一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居然也对人的裸体产生了兴趣，实在不可思议。

今天看来类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已经属于过去。中国当时正在闹“灾害”。自然的灾害和人为的灾害。蒙哥马利第二次进入中国之前，就听到不少关于中国饥荒的消息。有的说，中国饿死了几十万人；有的说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

在北京，他没有看到饥荒的景象，只是听说人民币贬值。居民的粮食是按定量供给的。来到延安这样的小城，他要看看个究竟。

看过澡塘后，他说：“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都很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迹象。”

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他对此颇不以为然，自有一套蒙哥马利式的高论。

他乘坐的飞机正从太原飞往西安。他将目光洒向起伏的黄土高原，一时间心潮难平，这令他想起了难以忘怀的辉煌岁月——击败隆美尔的北非战场。

“太像了！从飞机上往下看，太像北非了。”

黄色，惊心动魄的黄色！“沙漠之狐”隆美尔不正是在这黄色之中被埋葬的吗？

他又搞突然袭击了。他要求在附近的机场降落。

附近只有一个榆林机场，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机场毫无准备。中国官员婉言劝阻，他仍执拗地要求：

“降低高度总可以吧？”

飞机降低了几百米，仿佛一伸手就能抓住一把一把的黄土，蒙哥马利这才罢休。

后来，他们从西安到了洛阳。他又在剧场搞了一次“突然闯入”，引出了一段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对话。

那天，他参观了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在厂领导和总工程师的陪同下，观看了“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的组装。他登上一台刚刚组装好的拖拉机，开起就走——因为这东西的机械系统和坦克差不多，他很熟悉，不开一开手痒……

按照当地的安排，晚上组织一场文艺晚会，由洛阳最优秀的文工团演出、——这是中原人接待外宾的礼仪。

蒙哥马利说，感谢你们的盛情，白天参观比较累，晚上不再参加文艺晚会了。于是安排好的演出随即取消。

吃过晚饭，他要到街上散步。他散步的速度也是军人式的，后面的人要紧走才能跟上。这使人怀疑他是否真的累了。来到一个剧院门口。他突然提出进去看看。

好客的主人赶忙同剧院联系。还好，剧场没有坐满，前排的空座位正好安排这几位地道的不速之客。

台上演出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穆桂英手执令箭，唱得字正腔圆。余太君看着孙媳挂帅出征不禁潜然泪下……

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因为是个带兵打仗的故事，没有过多翻译，蒙哥马利是看得懂的。

中间休息时，蒙哥马利退场了。他们一行人回到了下榻的宾馆。陪同他访问的上将李达问：“元帅，这出戏怎么样？”

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

大家怔了。都很想听其详。

他停了一下，说：“怎么让女人当元帅？”

熊向晖解释道：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站起来，很认真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蒙哥马利的见解，使在场的中国人顿时语塞。

熊向晖说：“中国的红军有女战士，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女少将。”

蒙哥马利停住脚步，说：“我对你们红军、人民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但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不好，这有损于解放军的声誉。”

熊向晖说：“你们英国的女工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蒙哥马利不吭声了。他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在这个国度里遇到了“挑战”。毛泽东曾经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得到。

毛泽东的话，是解放后讲的。其实在解放前，或者说在几百年前，中国人就有希望女人当元帅的愿望和女人当了元帅的现实。

作为英国子爵的蒙哥马利对此颇不以为然。

事后，周恩来对陪同蒙哥马利访问的熊向晖说：“你当时讲得过份了。告诉客人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他的看法，何必非要人家同意我们的看法，你搞了多年的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

熊向晖觉得总理的话很有道理，连连点头。周恩来又说：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叫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改一改，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恩来又问：“蒙哥马利喜欢什么节目？”

熊向晖说：“杂技、口技之类的东西。”

“他看过杂技《抢椅子》没有？”

“没有。”

周恩来转身从文件筐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一个一个看起来。看着看着，说：“又是一个女元帅。”

他指的是折子戏——《木兰从军》

“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

说完，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要求换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杂技等节目。

蒙哥马利对中国的杂技节目非常感兴趣。许多年后，他还向人提起在中国看口技时的情景。他说：两个人站在话筒前，可以学出几十种鸟的叫声。这种本领，若是用到军事上，是绝妙的伪装。

中国人和西方人确实不同，有时
甚至他哭笑不得。他对随从副官
说：中国不容许你遗失东西。

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即将发出。忽然，一个小伙子冲到蒙哥马利乘坐的车厢前，手里挥动着一个纸包，喊着：“外宾忘了东西！”

陪同人员接过纸包，急急忙忙送给蒙哥马利，并告诉他，是宾馆专门派

人送来的。

他接过用纸包着的盒子，拆开一看，哑然失笑了。他对同行者说：“这是一个装刮脸刀片的盒子，今天早晨，我刮完脸，顺手把它丢在纸篓里。”

翻译说：“肯定是宾馆的服务员不识英文，把它当成你遗失的宝贝，才送来的。”

他说：“太认真了，你们中国人太认真了。”

过了几日，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蒙哥马利有一本随手抓来浏览的书，看完后丢在了卧室的抽屉里。谁知在上飞机前，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到候机室，把这本书交给了他。

同行的人问他：“这回不是扔掉的吧？”

他摊开双手，说：“是我的箱子里没有地方放它了。”

……

事后，他曾幽默地对别人说：“如果你打算丢失一些东西，你就不要把它们带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永远不容许你遗失东西。”

他刚踏上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就听说过小费是被禁止的。而在西方，不付小费则被认为是不合逻辑的。别人力你付出了劳动，你就应当给以奖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对中国禁止收小费是不理解的。

他决心试一试。

那是在延安参观的时候，他忽然走进一个村庄，村里人见到“洋鬼子”到来，都呆呆地盯着他。他甚至发现了几分仇恨的目光——这也难怪，中国人受洋人的欺侮太多了。

蒙哥马利朝看他的人招招手，微笑着逗一个脸上有泥巴却又很健壮的男孩。当人们发现这个“洋人”并不可怕时，又表现了充分的好客之情。请他进屋、给他倒茶。通过翻译，他详细询问了这个家庭的情况，主人毫无保留地将家庭收入、生活状况一一告诉了他。他很满意。

主人送他出门时，他摸摸衣袋，刚好有一把中国硬币——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他掏出来，塞给这个窑洞的小孩。

孩子是个上小学的学生。他边摇头边往后退，手藏在背后，无论如何不肯接。

翻译对小孩讲：“收下吧，元帅送给你做纪念的。”

小孩连连说：“不要，我不要人家的东西！”

蒙哥马利执意要给，孩子和家长坚决不收。家长说：“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就把钱收起来吧！”

翻译告诉他，不要再送了。如果收了你的钱，他们会被人瞧不起的。

蒙哥马利很不以为然：“他收我的钱，不关别人的事，别人为什么看不起他？”

翻译一时也说不清了。

看到主人不快的神色，蒙哥马利元帅只好把硬币放回口袋里，并且自我解嘲地把硬币弄得直响。

中国，毕竟是中国

关于时间

蒙哥马利元帅认识中国，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时间。当他离开北京，准备到包头旅行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拨一下表？”

在场的人竟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再次发问：“难道中国只有一种时间？”

“是的，中国只有一种时间，就是北京时间。”

“哦？”蒙哥马利好生奇怪，这么大的国家，东西有45个纬度，居然只有一个时区？他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

到了包头，他看到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到武汉后，他看到的时间依然是北京时间。

他问：“难道你们不觉得别扭？”

同行的中国人笑了：“元帅，是您感到别扭吧？”

他对中国人的“统一”观念，有了一些认识。这个国家的高度集中统一，令他膛目结舌。

首先是服装。中国人的衣着打扮正好同西方相反。西方人穿着喜欢标新立异，绝大多数中国人则不喜欢太出格。当时，城里人全是青一色的中山装，农村人几乎全是对襟袄。从南到北看不出多大的差别。其次是发式。中国人的发式也像做了规定，学生留着“学生头”，中年人留分头、平头，老年人多剃光头……

这种“集中统一”是好还是不好呢？

从元帅的眼睛来看，当然是好的，军队就是需要集中统一。他率领过的第八军团本是一支杂牌部队，有英国人、印度人、澳洲人、南非人，为了这个军团的集中统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在中国，这种统一的东西是固有的！

蒙哥马利从时间联想到在广州观看女民兵表演的情景。那些本是天真浪漫、花枝招展的女子，穿了蓝色的工装戴着一个模样的军帽，听着指挥官的口令，动作是那样的一致。他不能不由衷地赞叹：这样一个民族的地面部队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同纳粹德国根本不同，纳粹的统一是用刀枪逼出来的，中国的统一是自觉自愿的。

所以，他无限感慨他说：“战争有两条规则，一条是不要“同中国的地面部队作战，另一条是不要进军莫斯科。”——拿破仑、希特勒曾尝试过，都惨败而归。

蒙哥马利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在9月7日他发表讲话时报以那么热烈的掌声，因为他讲到了“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一”字，中国人是由衷地赞成的。

关于婚姻

蒙哥马利是个晚婚的典型。38岁之前，他对异性从不感兴趣，所认识的女人寥寥无几。同事们开玩笑说：“军队就是他的妻子。”

他39岁恋爱、结婚。妻子贝蒂·卡弗是一位军人的遗孀。结婚后他们一直形影不离，直至贝蒂在他的怀里去世。

此后，蒙哥马利孤身一人，直至生命结束。他的婚姻是严肃的，也是美好的。

中国人的婚姻是怎样的呢？蒙哥马利也想做一番考察。西方关于中国的

婚姻关系也有许多的传闻。

他想搞清中国人是怎样结婚的？是不是有那种被称力“媒婆”的人物。中国人的婚姻是不是稳固？是不是有那种分配夫妻的事情？

当他向中国人提出如上问题的时候，中国人都笑了，并对他说：“你可以自己去看。”

他走访过一两个新婚不久的家庭，表面看来都是和睦、幸福的。他要看婚姻登记处。

他来到一个街道的结婚登记处，请主管结婚登记的官员介绍情况。这位穿蓝色中山装的干部说：“这很简单，一男一女来登记，我们问清情况，合乎《婚姻法》就给他们登。就是这样。”

正说着，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他们面带羞涩，请负责登记的官员给他们履行结婚手续。穿蓝色中山装的干部拿出一个大本子，写了两行字，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张印得并不精美的证书，分别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

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蒙哥马利问：“你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相爱？”

“他们自己说的嘛！”

“他们自己说的就是真的？”

“这还能有假？”

蒙哥马利又说：“你们的婚姻比英国人简单多了。英国人的结婚要搞好几个月，光是到教堂也得一天的时间。”

翻译告诉他：“中国农村的婚姻也要准备很长时间的。”

蒙哥马利又问：“离婚也这样方便吗？也是到这里来登记一下就完事吗？”

穿蓝色中山装的干部说：“我们这里没有离婚的。”

“你们的离婚率等于零？”

“不是不是。离婚的很少，一般只结一次婚。如果发生婚变，那就是很大的变故了。”

“只结一次婚？一次？”

“一般是这样。”

蒙哥马利元帅笑了，说：“这倒和我有点相像。”

关于领袖

经过几天的访问，蒙哥马利对陪同的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中国人有句口头语，你知道吗？”

“只能说哪一个中国人有口头语，不能说中国人有一句口头语。”

“不，中国人是有一句口头语。”

“什么口头语？”

“毛主席说……”

蒙哥马利的话有几分道理。他访问洛阳拖拉机厂时，一位负责人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他访问一个医院门诊部时，称赞这里的工作很出色，女医生说，我们是照毛主席说的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特别是他访问那个人民公社时，30岁的社长和29岁的副社长介绍公社

的情况时，他说他们的成就是靠毛主席的指示取得的。

蒙哥马利问：“如果你是毛泽东，你对你们公社有什么想法？你将采取什么样的变革和改进？”

他们一时窘住了。

年轻的公社社长随即说：“元帅先生，我不能设想我是毛主席，所以回答不了你提出的问题。”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蒙哥马利看到了东西方的差异。如果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那样的社会，谁都可能说：“如果我是总统……”在中国，是很难找出声称“如果我是毛主席”这种人来的。

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将，蒙哥马利深知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领袖人物的言和行必须产生有效的影响。至于他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的个性——感情“白热”的能力，也就是说，领袖人物的内心要燃烧着激情之焰，要有抓住人心的吸引力。

毛泽东的吸引力他已经略知一二，别的领袖呢？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

蒙哥马利决心在访问中做一个小小的试验，也算作一种战略观察或是民意调查。

在郑州的宾馆里，他向服务员提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每月工资多少，休息几天之类。几个女服务员觉得这个“洋老头”很和气，也乐于回答他的提问。

忽然，他提一个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

“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中间，你最拥护谁？最听谁指挥？”

一个梳小辫子的姑娘回答：“毛主席。”

“对，毛主席。”另几个紧跟着回答。

蒙哥马利看得出，她们的回答是由衷的，不是别人强迫，也不因为什么压力。

“除了毛主席之外，你还听谁指挥？”

“刘少奇。”

“周恩来。”

……

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某步兵师参观，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战士进行了简单交谈，问战士为什么来当兵，问战士的生活怎样。等到战士觉得这位英国元帅并不可怕以后，他又突然提出了问题：

“在中国的领袖中，你最听谁的命令？你最拥护谁？”

“毛主席！”

异口同声，不容置疑。

“除了毛主席之外，你们还最拥护谁？还最听谁指挥？”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迟疑了一阵子，有的说是朱德，有的说是刘少奇，还有的说是周恩来。

……

问者有意，答者也不能说无心。蒙哥马利跑了许多小城镇、乡村，不厌其烦地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

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一个——毛泽东。

这使得蒙哥马利不得不佩服他。在美国，总统绝没有这样的威望；在法

国，戴高乐能有 80% 的选票也就相当可观了；在中国，他的选票近乎百分之百。

毛泽东约他做横渡长江比赛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的名言。这句话和蒙哥马利的作战原则很相像。西方人称蒙哥马利是“谨慎的、彻底的战略家”，并把他和美国著名将领巴顿将军相比较，说“巴顿作战是真小心假大胆，蒙哥马利是真大胆假小心”。蒙哥马利的“大胆”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很有点“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意思。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再次来访十分重视，除了将所有的报告材料和资料读完，还专门把陪同蒙哥马利的一些同志叫到湖北武昌，听他们汇报蒙哥马利访问的有关情况。

陪同的人告诉毛泽东，蒙哥马利对我们现在的领袖和将来的领袖都很关注。他说：“中国的古代帝王很聪明，健在时就指定了继承人，多数是成功的。这能保持局势的稳定。我们英国经常为王位打仗，现在有了王位继承法，欧洲的领袖是无法指定的。”

在郑州，他还说过：“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很专注，烟灰缸里已经放了好几个烟蒂。

“英文里继承人怎么说？”毛泽东问。

“Successor”，熊向晖答道，并且将这个单词写在纸上，送到毛泽东手里。

“这个词我知道，有成功的意思。”毛泽东说。

在座的人都很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毛泽东学英语，很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

毛泽东又说：“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我什么？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班人是无产阶级的概念。接班人这个词英语怎么说？”

“没有很准确的对应词，还是 Successor。”

毛泽东谈起话来天南地北，既有高度又有深度。他说，这个元帅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在北京提出了和平三原则，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斯大林选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威望不高……

他站在 1961 年的高度，对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问题做了评价：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不在于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世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他又把话题扯到国内：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防风林带。元帅不理解，我们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七大”就有了。“八大”是大张旗鼓开的，从头到尾完全公开。外国人毫无注意。“八大”通过一部新党章，上面有“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名誉主席是谁？就是鄙人。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右手食指指指自己的鼻子。——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当年在延安时，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诗人？”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儿就有一个！”以后在许多场台，他都这样说过话。

他沉稳了一下，接着说：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他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医院时曾对医生说过的一段话：“你们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不禁大发感慨——

“什么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没有找到。我要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不论多么严肃的话题，
从毛泽东口里讲出，总是别有一种味道。
他对生命的看法，令蒙哥马利吃惊。

汽车缓缓驶入一座林木茂密的庭院式宾馆，蒙哥马利走下汽车，顿时被这里的美丽景色所吸引——碧绿的东湖，水波不兴；秀美的珞珈山，倒映在湖中；参天的树木招来了各种各样的鸟儿婉转歌唱，令人生出与尘世隔绝之感。

中国的好地方太多了！蒙哥马利感叹着，走进了毛泽东的客厅。

毛泽东走上前来，用英语说了一声：您好。他虽然没有访问过英语国家，对英语却有浓厚的兴趣。外出旅行，总要带上英语书。

蒙哥马利很兴奋。尽管他对毛泽东的英语发音不敢恭维。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要听听蒙哥马利访华的观感。蒙哥马利也很有兴致同他讨论问题。因而气氛是十分融洽和热烈的。不是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逗得大笑，就是蒙哥马利把毛泽东引笑了。

毛泽东问：“元帅今年多大岁数？”

“74岁。”

“哦，过了73岁。”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说：中国有句俗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100岁。

蒙哥马利很是新奇，“73、84”，为什么是这样两个数字？当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这两个数字的来历，和两个“圣人”联系在一起——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

“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就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

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说他只能活到73岁，这太悲观了。

蒙哥马利有点激动地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

毛泽东那改变中国命运的巨手一挥，说：“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四年已经足够了！”

蒙哥马利也用同样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得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在座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笑得最开心。

他们还谈到了共产主义的问题。蒙哥马利非常敏感地提出：“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之干脆，令蒙哥马利惊讶。毛泽东说，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与所能，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了人人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这叫蒙哥马利想起了1947年访问苏联时同斯大林的谈话。斯大林的解释同毛泽东的解释如出一辙。他把当时谈话的情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是吗？看来你已经了解了不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

蒙哥马利还是不理解，他问：“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

毛泽东的回答也很有趣味：“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

已经很晚了。海关钟声似乎已经敲了10下。他们的谈话该结束了。蒙哥马利拿了一盒英国的“555”牌香烟，对毛泽东说：“主席先生，送您一盒英国烟抽。”

毛泽东接过烟，看了看，用英语说声谢谢。他们又一同品尝了中国的名茶。

蒙哥马利站起来，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

毛泽东起身送客，并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的。

蒙哥马利不免有点遗憾。但他知道，这位将近七亿人口的领袖需要日理万机。

毛泽东又解释说，他将去北京参加建国的庆祝活动。

蒙哥马利这才想起，快要到“十·一”了。那将是中国普天同庆的节日。

**凌晨4时，毛泽东处突然通知，
他改变行期，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

凌晨4点钟，陪同蒙哥马利访问的中国官员被叫醒，他们接到通知，毛泽东改变行程，天亮后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

这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善于战略观察的陆军元帅产生了感情，还是这位元帅的谈话触动了他的某种情怀？人们不敢冒昧猜测。反正毛泽东是很少这样安排同外宾会见的。

蒙哥马利得到消息后，很是兴奋。他说：“他说了的，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们开始更为深入有趣的谈话。话题和上次谈论的有关。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人民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

毛泽东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蒙哥马利打断他的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毛泽东听他讲完，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这算是他对西方将领最好的夸奖了。

由于要和毛泽东见面，蒙哥马利研究过一些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了他根深的印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做为一个西方军人，对这句话的含义不会像中国军人那样清楚。

他问毛泽东：“这句话是不是您说的？如果是您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是我的话。是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里说过的，记不起说这话的确切时间了。”

蒙哥马利似乎觉得这话里有点军人专政的意味。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革命不能没有战斗，有战斗当然需要枪杆子。

“那么，”蒙哥马利紧追不舍，“在现在，在所谓和平的日子里，这句话是不是仍然还有效？”

“当然。”毛泽东点燃一支烟。

“当然，”这两个字令蒙哥马利琢磨了好久。

谈着谈着，他们又回到了领袖的继承人问题上。蒙哥马利谈到印度的尼赫鲁，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他们对指定他们的继承人是很有反感的。

“主席先生，中国的继承人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呢？”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已解决了，我们已经确定，是刘少奇。

“刘少奇以后将是谁呢？”

“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中国这条船不能离开你。”

“暂时不离开。”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目光凝视远方，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呢？第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人死了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蒙哥马利被毛泽东的话震动了。这是怎样一位清醒的伟人啊。

他们的谈话结束时，蒙哥马利说：“我希望我能活到100岁，我已经过了73岁这一关。”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认真：“我想你是能够的，我是不能够了。”

蒙哥马利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毛泽东为什么对自己的生命估计这么悲观？他不止一次他说到要见马克思了，是一种预感，抑或是一种烟幕？

这令战略家大惑不解。

他们的谈话结束时，是在涛声阵阵的长江边。蒙哥马利由于肠胃功能不好，没能同毛泽东一起享受“极目楚天舒”的乐趣，他站在游艇上，观看了毛泽东劈波斩浪的英姿。这样一位体魄雄健的伟人会死吗？

汽艇迎风破浪驶向码头，毛泽东望着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

蒙哥马利看到毛泽东眼里闪着挑战的目光，就说：“好，我们做横渡比

赛。”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1964年吧。”

“好，一言为定。”

“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电视公司的一个大好机会。”

他们开怀大笑。笑声洒进滔滔不绝的长江之中。

夜晚，蒙哥马利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为他准备行装。第二天，他将启程返回大不列颠王国。

这时，毛泽东来了。“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

蒙哥马利喜出望外，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毛泽东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幅由毛泽东创作并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

陪同蒙哥马利的中国人告诉他：“这是无价之宝，主席亲笔写下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客人是极罕见的事情。”

陪毛泽东前来的中国人告诉他：“这是主席早晨4点钟起床后写的，上面还飘着墨香呢！”

蒙哥马利端详着道劲有力的方块汉字，连声向毛泽东道谢。

毛泽东说：“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

蒙哥马利带着满脑子的收获回到了英国。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再来中国同毛泽东进行游泳比赛。但他对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好感，都记录在了他的回忆录——《三大洲》之中。毛泽东送他的《水调歌头——游泳》，也一直保留在他的身边。直至1976年3月24日他离开人世。

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去见马克思了。如果他们在那里相见，谈话一定更为幽默风趣。只是不知那里是否有风吹浪打的长江，供他们横渡比赛？如果比赛的话，谁会赢呢？很可能是毛泽东。

一个东方伟人和一个西方记者 毛泽东与斯诺

说来难以置信，毛泽东没有和他的妻子讲起自己的身世，却和这个外国人讲了好几个夜晚。

毛泽东没有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讲给他的战友听，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这个人。

毛泽东没有把中美关系解冻的信息告诉我们党内的一些官员，而是比较清楚的告诉了他。

这个外国人生了病，毛泽东派了专门的医生，去为他治疗疾病；他去世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很有感情的唁电，这在毛泽东一生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个外国人就是斯诺。

这个名字对年轻人来说是越来越陌生了，但在中年人的记忆里，他的名字可是很响亮的。他的名字连同他的著作，曾经鼓舞和教育了许多东方人、西方人。然而，他和毛泽东的交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并不知其详。

这里记述的就是一个东方伟人和一个西方记者几十年间交往的故事。

在保安他是唯一能使毛泽东
戴上帽子的人，毛泽东用一种
开玩笑的口气说，我们把你赤化了。

1936年7月16日的晚上，也就是斯诺和马海德（当时叫海德姆）到达保安的第二天，毛泽东要见这两位外国人。

斯诺曾详细描述过那个晚上的情景——

西北高原的夜晚虽说不是很热，但到了7月，还是有些暑气的。毛泽东喜欢晚上工作，所以也要在晚上见这两位洋人。

地地道道的窑洞灯光，地地道道的东方人的情调。

斯诺认真地观察着毛泽东的居室。他看到了一张比较大的军用地图，看到了两只铁皮公文箱，还看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的双人床——那是两个床板拼在一起的。他甚至看到了毛泽东床上的粗布被子。

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微笑，吸引了这两个“洋人”。

他开门见山，说：“你们是孙中山夫人介绍来的。国民党现在有几十万军队封锁我们，你们能到这里来，很不容易呀！”

他转身对斯诺说：“你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是一位公道的记者。国民党害怕国内外了解红军的情况，造谣说我们是土匪，不许新闻记者到我们苏区来。你们来访问，我们非常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任何地方去采访，我们尽可能地给你提供方便。”

当时，斯诺很高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需要的就是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就是能有一个自由采访的条件，别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

有了这样的开场白，谈话进行的自然也就是比较愉快的了。

此后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次数非常频繁。据斯诺写的《毛施会见记》记载：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谈外交问题。

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

7月18日，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

随着谈话的深入，斯诺对毛泽东本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越来越想了解这个人物的历史，这个人物的内心。因此在有一天的晚上，他给毛泽东开了一个有关他本人历史问题的清单，想请他作出回答。没有想到毛泽东看了以后，没有表示态度。翻译告诉他，主席对此不感兴趣。

斯诺急了，说：“如果你要想结束内战，并且和别的军队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共事。多年来国民党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们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见毛泽东还是不说话，斯诺又说：“外边还有许多关于你已经死去的传说——有人说你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人说你是一个病的要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坚持说你是一个狂热分子。”

毛泽东对此十分意外，他还是不准备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是说：“我不回答你提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把我的经历概括他说给你听，这样会使人更好理解，你看好吗？”

斯诺让步了，毛泽东又说：“我建议你去西面走走，我们的红二、四方面军就要在那里会师了。”

斯诺一开始没有去西部的想法，他有过那么一霎那的犹豫，还是吴亮平对他说，你到这里来而不去西部的话你会十分遗憾的。

他这才答应去了。

临行那天，有关人员给他送来了红军的新军服和八角形的新军帽，还给他发了一支手枪和一匹马。

斯诺和马海德穿上红军的服装，去向毛泽东告别，这时毛泽东正在院子里和人说话，在清晨的阳光下，毛泽东显得十分有精神，也很有风度。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镜头，他拿出相机，说：“主席，我给你照张相吧！”

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答应了。

于是毛泽东出现在斯诺的镜头里。斯诺又说，“请你戴上军帽，不然……”

毛泽东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很少戴帽子，参加革命以后也是这样。他对斯诺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斯诺却不肯让步，说为了画面的完整，必须戴上军帽。

毛泽东向周围的人惜帽子，可是谁的头都没有毛泽东的头大，帽子都戴不下去，斯诺赶快把自己头顶上的帽子摘下来扣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正了正，说：还好还好。于是斯诺就按动了快门，把毛泽东的这一瞬间留了下来。

于是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张毛泽东戴八角军帽的照片，这张照片，在中国和海外都很引人注目，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有人把这张照片做成了像章。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毛泽东把帽子还给了斯诺，并且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斯诺同志！”

斯诺也学着红军的样子，给毛泽东敬礼。人们看着一个洋鬼子给毛泽东敬礼，都鼓起掌来。

因此，有人说，在保安，斯诺是唯一能让毛泽东戴上帽子的人……

于是，斯诺有了一次中国西部之行，有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进一步认识。

1936年9月底，斯诺回到保安，他要继续和毛泽东交谈。

毛泽东很守诺言，他第一次向一个外国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谈了许多在别人看来很是珍贵的东西。

此后他们进行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交谈。

毛泽东把他的身世尽可能地都告诉了他。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自己小时在农村的情况以及自己和父亲的矛盾……

他谈到自己在长沙求学所碰到的一切，又谈到了有关参加革命前后的一些真实想法。

斯诺听得津津有味。

不仅是斯诺，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也对毛泽东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她听得也十分专注，那表情，好像在说：“这些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斯诺把毛泽东同他谈的这些内容，认真记录下来，和在陕北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一起写成了一本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书，也就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西行漫记》。

毛泽东为什么把他的身世讲给斯诺——一个外国记者，而不是一个中国记者？对此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毛泽东觉得这个西方人是可以信赖的。

毛泽东是个不肯轻信人的人，他和斯诺达成了一种默契，有了一种信任感。

他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斯诺不仅采访了毛泽东，而且还采访了周恩来、徐特立、贺龙、徐海东、林彪等一批著名的红军将领。

1939年10月12日，斯诺要离开陕北。临行前，他到毛泽东的住处辞行，毛泽东说：“你应该离开，要是等蒋介石把路都堵死了，你可就回下去了，你的夫人正在为你的安全着急呢！”

斯诺很有感情他说：“我要来你们这里的时候，真不知道这里是个什么样子，担心你们会把我当间谍抓起来杀掉。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还真有点不愿离开呢！”

毛泽东笑了，说：“看来我们这些杀人放火的‘土匪’真的把你这个洋鬼子给赤化了！”

斯诺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对毛泽东说：“在你们这里，没有人告诉我哪些是能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也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更没有人阻止我拍我要拍的镜头，你们给了我很好的合作，我向你和你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也很是激动，他对斯诺说：“你是第一个到我们苏区来的外国记者，你为中国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感谢你才是！”

“我一定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报道！”

……

毛泽东把他的一个公文包打开，取出一大叠照片，交给斯诺，说：“这是红军生活的真实写照，请你拿到北平去复制一部分。”

斯诺感到，这个中国红军领袖对自己是够信赖的了。毛泽东又说，“我

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常来。”

斯诺很是激动，说：“我一定会再来的。”

他走出了毛泽东住的小院子，毛泽东站在院门口向他挥手……

斯诺也没有食言，他在北平向国外发出了大量反映红军生活真实的报道。在燕京大学向青年学生做了多次有关红军情况的报告，还放映了他拍摄的红军日常生活的影片。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给斯诺写了一封信。全文是这样的：

施洛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你现在可好？我同史沫得列[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传，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斯诺接到信很激动，连夜把这份文字写成报道，发了出去……

1939年的秋天，斯诺又有机会到了延安，去见他的老朋友毛泽东。

他们进行了两次正式的谈话，又进行了许多次朋友式的聊天。他们谈话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对策，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情况，以及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他们还谈到了美国的黄石公园。毛泽东对那里的诚实泉很感兴趣。斯诺说，那个诚实泉平均65分钟喷发一次，每次持续5分钟。喷出的泉水高达40多米，由于它几十年如一日，故得名为“诚实泉”。

毛泽东把话引伸了一下，说：“这多好啊！我们共产党也要十分诚实，要讲真话，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到诚实泉去喝一口那里的水，去看看你们的黄石公园。”

……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欢迎斯诺的大会上讲了一段很有份量的话，他说：“民国二十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个大会给斯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以至他后来多次提起他在那里听到的《黄河大合唱》，他说：“那是中国最好的歌子。”

他们一别就是20多年，当他再次来到中国大地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毛泽东的想法好像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们一别就是20年。人生能有几个20年啊！20年能使一个毛头小子长

成一个男子汉，20年能使世界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斯诺的心中对中国感情没有变。

如果不是美国当局的阻挠，斯诺也许早就到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来了，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使他许久不能成行。愈是这样他就愈想来这里，也就愈关心这里发生的一切。

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一个长期报道中国情况的记者，斯诺对此表现出了莫大的关心。他曾经给中国的朋友写信，向他们询问有关情况。直到最后，他决定亲自来看一看。看一看红色中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

他来到北京以后，先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回答。

他还被邀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也到外地进行了参观访问……

很快，他又接到通知，毛泽东要见他。

这是他第几次和毛泽东谈话，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有许多问题要和毛泽东谈，他很珍视这次机会。

车子将他接进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

毛泽东的住所面前有一片菊花，斯诺走过这片菊花，来到了一所典型的中国式的平房院落。走进屋里又觉得有点像图书馆。

一见面，毛泽东就笑了，他说：“我们很久不见了，有多长时间了呢？”

“20多年了。”斯诺看着毛泽东的住处，“你的窑洞的面积比原来扩大了呢。”

“事情是比原来好了一点呢，”毛泽东笑容可掬，“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但是中国已经大变样了。”

“是变样了，这也有你的功劳嘛，20多年前，你就预言红星照耀中国嘛！”

两人落座以后，开始了无话不谈的谈话。

斯诺感到，毛泽东的谈话似乎比在延安的时候更加随意，更加有风趣，也更加海阔天空，自由自在。

比如说，他们谈到了游泳。

“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游泳的人数极为踊跃，以致于外界又传起了中国准备攻打台湾。”

毛泽东说：“那个报道夸大了嘛，我们也没有落后到用游泳的办法去解放台湾。外国的评论真不可信。”

……

说到游泳，斯诺自然想到他们在1939年的那次谈话。

“你在保安的时候，曾经说过，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想到黄石公园去一游，现在还想去吗？”

“我当然还想去，但是华盛顿方面不会同意我去。不过也许会同意我去密西西比河一游，只是在河口。”

——这被人们称为一个信号，但这个信号没能得到应有的响应。

如果说斯诺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还不够深入的话，那么，他们1965年的

谈话就是他们进一步的交心的谈话了。虽然斯诺已经感觉到他不能像在延安窑洞里那样和毛泽东打着扑克说东道西，不能随便开几句玩笑了。倒是毛泽东也能说几句英语，他也能说几句汉语。

这天是 1965 年的 1 月 9 日，天气十分寒冷，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斯诺还打了一个寒噤。

此时毛泽东正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等他。

老朋友相见，都很高兴，毛泽东破例地让一位摄影记者进来拍了一段电影。

“你是应你的要求拍的。”

别人告诉斯诺，这是特许，毛泽东反对拍片，也很不容易配合，这次是例外。

斯诺说：“好多年前，我曾经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们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厉害，把我们的会见在电影上放映出来，公之于世，来驳斥这种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斯诺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你的身体很好。”

毛泽东苦笑着说：“我准备很快要见上帝了，你相信吗？”

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问：“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否说，你要去弄清楚是否有个上帝，你相信有上帝吗？”

他们的谈论，被晚餐打断了，毛泽东要招待他吃晚饭。这也是朋友的礼遇了。

不知为什么，这天的谈话毛泽东多次说到了死的问题。吃饭的时候，他又说到了自己的家人——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弟弟还有他的大儿子都先后离开了他。他甚至不无诙谐地说：很奇怪的是，死神至今没有光临，而是从他身边过去，看来死神还是不肯要他。有几次看来他会死的——站在他身边的警卫员都被打死了，他自己却没有，还有一次，他身上溅满了另一个战士的鲜血，可是炮弹却没有炸到他。

斯诺马上问到：“是在延安吗？”

毛泽东说：在延安也是这样。他的警卫员是在长征途中被打死的，另外还有几次死里逃生，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一切斗争最后都必须得到解决，地球上人类的生存竞争也是这样。

……

他们谈到了中国的“神”的问题。

这个问题又是从西藏问题谈起的。

斯诺问：“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已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在 1960 年，你说有 90% 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有 10%。现在怎么样呢？”

毛泽东的回答是很有分寸的：“各地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是他们的总人数很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种人今后还有希望增加。至于这些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的。总之，现在可以说大约有 95% 的人甚至更多些，是团结一致拥护社会主义的。”

斯诺马上想起了达赖喇嘛的问题，毛泽东也很愿意和他谈这个问题，毛泽东甚至把达赖和他说过的话都告诉了斯诺。达赖曾经说过：“他不相信他

是一个活佛，虽然人们都这么说。”

斯诺问毛泽东，你信佛吗？

毛泽东说：“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不断地拜佛，小时候，我是站在她一边的。我父亲是不信佛的，我反对我的父亲。有一天我父亲经过一片树林，碰上了一只老虎，他吓坏了，跑回家，他就烧香供神。”

说到这里，毛泽东道出了很精彩的几句话：中国人碰到不顺利时就信神，生病时就信神，没有病了也就不信神了。

“你认为中国有一些神吗？”

毛泽东回答是肯定的，有，不仅有山神，门神，灶神，还有几百万人信伊斯兰教，有几百万人相信佛教，还有基督徒，还有人真的相信喇嘛教。

……

“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

他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探讨有关赫鲁晓夫问题。

斯诺问：“西方的评论家，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人，严厉批评苏联的领导人用搞阴谋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你对这个问题看法如何？”

毛泽东的回答很巧妙，他说：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他在中国就不是很得人心的。他的画像极少看到，但是在他下台前书店里有他的著作出售，现在仍然有他的著作出售。可是在苏联就不是这样，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他的阴魂还不会散，喜欢他的人肯定会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不会忘记他的。

斯诺问：“根据你的三七开的标准，你对现在苏联现任的领导又是怎样评定分数的呢？”

毛泽东一反平时的旗帜鲜明的态度，说，他不想评论现在的领导人。

斯诺又紧追一句，中苏关系会不会有所变化？

毛泽东认为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太多。

斯诺又提出一个很是尖锐的问题，他说：“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没有根据？”

毛泽东倒是很坦率，他说，也许有一些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斯大林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却完全没有，……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

“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者的命，现在出现毛派和北京学派的各种派别，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教授们在争论着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首创性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表明毛从未自己宣称有过创造性的贡献，那么这对他们的争论有没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说：没有，的确没有影响。那完全是题外的问题。

毛泽东听了大笑了起来，他说，2000多年以前，庄周写了一篇不朽的著作《庄子》，于是出现了100家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

“1960年我见到你的时候，曾问你是否写过自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你回答说，除了已对我讲过的有关你的生平的一些事情外，你没有写过。但是有一些教授说发现了你的自传。当前他们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你的有名的

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否如《毛泽东选集》里所说，真的是在 1937 年夏天写的，还是又过了几年写的。我自己好像记得。在 1938 年的夏天曾看到你的这两篇未出版的手抄的翻译稿，你可以告诉我这两篇文章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吗？”

毛泽东说：

是 1937 年夏天写的。在芦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来收集准备扩大用的基本哲学教学材料。夜里写，白天睡，花几个星期写成的。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为人们后来研究他的著作，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原子弹

说到原子弹，斯诺问：“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那段时间原子弹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定的恐慌。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毛泽东表示：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原子弹能杀人。但最后人将消灭原子弹，那个时候，原子弹就真成了纸老虎。

“有人引用你的话，说是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的人可能全部被消灭了，中国还会有两三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任何根据吗？”

毛泽东说他想不起他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斯诺说：“一个来源是在南斯拉夫的外交官，他说毛说过，即使欧洲人全部被消灭掉，中国还会有三亿人留下来。”

毛泽东说，我真记不起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但很可能说过。是不是同尼赫鲁说过？

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

斯诺是美国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相当关心，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自然而然的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然那时，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想让斯诺充当一个传递信息的人物。

“过去十五年，历史的一种力量把中美两国人民实际上的一切交往都隔断了，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似乎这个鸿沟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本人决不相信会最终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毛泽东坚信，历史的各种力量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拉到一起来的。他说：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也确实不会得到什么便宜。

他们谈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毛泽东强调说，中国在越南没有一兵一卒。他认为，美国在越南呆下去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战争可能会还打一二年。

斯诺说：“如果美国采取和平政策，把他的军队从南朝鲜、台湾、整个东南亚和国外所有的地区撤退，只要中国和其他国家同意，不但全面销毁核武器，而且在全世界进行全面裁军，中国将作出如何的反映？”

毛泽东笑了，他认为斯诺这个想法太不现实，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斯诺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有过比较好的关系，但和后来的美国首脑没有

多少联系。他说：“我没有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特别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

毛泽东的回答很干脆，说：不必。

斯诺问：“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是否看到中美关系有希望改善？”

毛泽东想了想，肯定地说，还是有希望的，不过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这一代恐怕是不行了，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后会笑我们吗？”

“天有不测风云”

毛泽东和斯诺告别时说了一些颇有意思的话，很值得人们玩味。

他们谈了很多，谈得似乎也有点劳累了，毛泽东闭上了眼睛，任自己的思想纵横驰骋，当斯诺说到“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他的环境来创造的。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不晓得，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将来作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说：他也不知道，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是青年人不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将来的事情要由他们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后代将比我们更有知识，他们的判断将占优势，而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用他们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毛泽东有些低沉地说：“从现在起到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也许显得很可笑吧。”

当时斯诺没有表示什么，但事后，他还是把这句话写在了他的作品之中。

毛泽东站起身，送斯诺出门，这时有几个女服务员走过来挽扶他的手，斯诺想，这是些什么人呢？是他的女儿吗？还是服务员？

分手了，斯诺用他的蓝眼睛看着毛泽东，说：“我们还会见面的。”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成语，叫作天有不测风云，你要多多保重，小心谨慎。”

“天有不测风云”这是对谁说的呢？是指当时的国际风云吗？还是指的中国政治风云？还是在叮嘱斯诺好自为之？

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也是他们之间最深入的一次谈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斯诺经过一段周折，又来到了北京。

接待他的自然还是周恩来总理。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周恩来告诉他，毛主席还要见他，他一直等着这一天。

1970年的10月1日，中国照例举行国庆活动。斯诺接到了邀请，他很高兴。这对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都是一件荣幸的事。

这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纪念日，城楼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斯诺正在看着广场上的大标语——那上面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忽然，有人拉了他的手一下，抬头一看，是周恩来总理。

他们客气几句，周恩来就领他去见毛泽东。

斯诺在国外听到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谣言——说他中风了，一只手都不能动了。他见到的毛泽东依然很健康，只是比过去消瘦了许多。但他的手是很有力的。

“我们又见面了。是老天的安排。”毛泽东开口就很幽默。

斯诺说：“我们又有机会谈天了。”

60年代他曾经上过一次天安门，那次他们在城楼上说了并不多的话，毛泽东只是说：“很久不见了，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呢？”

斯诺记得很清楚，再上次见面，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笑着对毛泽东说：“自那时起，你的窑洞的面积比原来大了呢。”

“事情稍好转了一点，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这一句话，使斯诺感到十分亲切。也使他感到记忆犹新。

1970年，正是毛泽东和林彪发生了一系列矛盾的时候。所以当毛泽东看到那些对他过分称颂的话的时候，他开始皱起了眉头。

斯诺感到，他老人家有话要说。

果然，在十几天以后，毛泽东和他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这次谈话被海外的报纸广为引用，我们党内也把这次谈话当作文件下发过。

这次谈话，斯诺有过比较详细的记录，我们也有一份记录，的确这是一份重要文件。

但在谈话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把斯诺当成记者而是当成老朋友的。

斯诺走进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时，一个没有军衔的中年人迎了上来，把他和夫人引到了毛泽东书房的门口，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

毛泽东的翻译是唐闻生，他告诉斯诺说：“刚才那一位是个将军。”

毛泽东见了老朋友，说话自然随便。他对斯诺说：我这几天有点轻微感冒，不晓得那些医生有什么用，连感冒这样的小毛病也不能预防，使很多的时间都失去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高，仿佛是斯诺的耳朵有问题。

斯诺告诉他，西方有个莱纳斯·波林的医生，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来治疗感冒。主席不妨一试。

毛泽东说，我一定试试，如果有效，你就有一大功劳。

他们很快谈到了当时很忌讳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

毛泽东还坚持他的观点，他认为，人是要有点个人崇拜的。他对斯诺说：“你不要个人崇拜吗？你写的书没有人看你就高兴了？”

他说：在过去几年，有心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个人崇拜了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

说到这里，他问斯诺：“如果没有人读你的文章和你的书，你会高兴吗？总要有个人崇拜嘛。”

……

他们谈到了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

斯诺说：“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很实在地告诉他：“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说：“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还是说：“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是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说：“还是不错的。同十年前或五年前比较。”

毛泽东十分清醒地坚持说：“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也坚持说：“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对此毛泽东说出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你这个人容易受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45了，只好算了。”

……

说着说着，毛泽东就把话题转到了政治上，他毕竟是大政治家。他说：“……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说到这里，点燃一支烟，接着说：“你说中国有很大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革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进步。35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了一点吧！35年啊！”

毛泽东的谈兴很浓，而且确实没有把斯诺当成外人，他说到了尼克松可能访华的时间，他问斯诺：尼克松选举是哪一年？

“1972年。”

“我看72年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那是那个时候。那个台湾他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

说到此处毛泽东很来气，说：“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里面也有他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

……。

斯诺说：“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他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出言奇特，他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他欺骗的一面。”

斯诺说：“尼克松在南亚陷得根深，就越是发动人民来反对他。”

毛泽东还是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好！尼克松好！我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他只说，好人啊！是世界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

……

斯诺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记者，他和毛泽东谈起了当时在中国老百姓看来是很机密的事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问题。

毛泽东向他讲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背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有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是不是那时你就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说，1965年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后来又写了一张大字报。

“就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

“就是那张。”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的过份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 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都去掉，只要一个 teacher 就是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说：“我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主席口号的人，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拥护。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他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伙骗子，一定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毛泽东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缺点，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你呀，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都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他们谈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谈着谈着，他们又说到了国际问题，斯诺问：“俄国人怕中国人吗？”

毛泽东说：“中国有啥好怕的？中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一个大拇指，“俄国人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一个大拇指，“美国的原子弹

有这么大。”他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他们加起来有这么大。”他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怕不怕呢？”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听说他们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来防你来的嘛，我钻洞嘛，又不是打出去嘛。”

毛泽东又谈起和苏联人的争论问题。他说，他们说中国人是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说他是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后来，他们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来，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毛泽东多次这样说过。

毛泽东的谈话，使斯诺很受感染，他也从他的角度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对他的这些想法，有的毛泽东是同意的，有的毛泽东是不同意的，比如，斯诺谈到这次斗争是不是有城乡人民的冲突问题，毛泽东插话说：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时，毛泽东又说：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当然是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的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至于富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不多，八亿人口只有八九十万基督徒，二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百万的回教徒，穆斯林……”

他们越谈越深入，说中国的南粮北调，谈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谈事物发展的S型和O型……

最后毛泽东说：“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斯诺点头称是——这也许正是他们几十年交往的一个基本点，“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他们手拉着手走出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在北京的那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跟你谈起了个人崇拜问题呢？”

“是谈了一些，但没有你这么坦率。”

毛泽东说：“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了话，我是无法无天，这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当翻译把这个歇后语告诉斯诺后，他愣了一下，后来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用这句话来形容毛泽东当时的心态，说他是“一个手执雨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这种说法，曾经在世界上广为传播，我们国内也有不少人引用。

对这一说法，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试想，如今毛泽东见到了斯诺，肯定会对他的这种译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愿毛泽东不会说这是“以讹传讹”吧！

相遇贵相知

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和毛泽东有关系的记者中，（特别是外国记者）有两个人物比较特殊。一个是埃德加·斯诺，另一个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者是男的，后者是一位女性。

斯特朗的名字，是和一个英明论断联系在一起。凡是知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人，恐怕都会记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她一生和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与她进行过三次长谈。每次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件，每次都有很奇特的意义。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后来的几次谈话都没有“纸老虎”那样大的影响。

毛泽东为什么把一些不便与他的同事谈的话向这位外国记者讲？

毛泽东为什么把十分重要的论断同他素昧平生的女记者谈？

一个领导着上亿人口的大国领袖，为什么能和一个性格奇特的女记者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

……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在飞机上，半睁半闭着眼睛，不时俯瞰一下脚下黄色的土地。她想闭目养神。但一闭上眼，就出现已经过去了的生活画面。

这是第六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了。

第一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1925年的金秋。那时她还不到40岁。好年轻哟！她不懂得什么叫作害怕。——192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她只身跑到了苏联，要亲身体验一下苏联是怎么一回事。时隔4年之后，她又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来“探险”来了。

那时的中国好穷困，好落后哟。她跑到北京以后，碰上了一个熟人——大名鼎鼎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

这位叫范妮·鲍罗廷的女士告诉斯特朗，她的丈夫正在广州给国民党的政府当顾问。“那里是另一番景象，你们当记者的，应该到那里去看看。”

采访过苏联革命的斯特朗，对一切新鲜事物有着好奇感，她很快到了广州，采访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在那里，她通过宋庆龄认识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以及廖梦醒、宋子文等人物。——广州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

第二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斯特朗的记忆中，第二次踏上中国大地的前后，正是她写作的“丰收季节”，她的有关中国和苏联的报道，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她的名字，连同她的中国报道，频繁出现在《亚细亚》、《环视》、《弹琴者》、《大西洋》、《纽约先驱论坛杂志》、《民族》、《基督世纪》等报刊上。

一个记者，看到自己的文章被纷纷发表，自然是件高兴的事。

到中国之后，她碰到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她在上海街头看到了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在扬子江畔，她看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他还和鲍罗廷

一道历尽艰险，跨越沙漠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

她不能不想起她第三次到中国的黄土高原上会见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将军的情景。也不能不想起她在汉口和周恩来、邓颖超长谈的情景。——他们都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正是第三次访问中国，她才写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这本名噪一时的书。她怎么能忘记那段时光哟。

当然，使斯特朗最引为自豪的，还是第五次访华。那一年，她过了花甲之年。经过多方努力，她到达了中国的延安。在这里，她获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绰号“纸老虎女士”。她也正是在此时结识了毛泽东。

斯特朗一想到和毛泽东的会见，神经就会兴奋起来。毛泽东深蓝色的制服、膝盖上的两块方方的大补丁，都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记忆中，还有毛泽东膝前的小女儿滴溜溜直转的黑眼睛……

毛泽东是很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吸引着这位西方的无冕之王。他们的谈话是轻松愉快的。毛泽东还不时崩出几个英语单词。在谈到很令一些人恐慌的原子弹时，毛泽东说：“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翻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翻成了 Strawman（稻草人）。安娜·路易斯很不理解，问：“Scarecrow？”在场的马海德说：“不是，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tiger。”

毛泽东对这个译法很赞赏。他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很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力量在人民一边。蒋介石——papertiger”。

毛泽东的湖南 English 使安娜·路易斯笑了起来。毛泽东自己也笑了。

……

想着想着，坐在飞机上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忍不住笑出声来。毛泽东的英语发音实在是憋脚了点。

一想这些可笑的经历来，她就不能不联想起延安的周末舞会。她甚至还能背诵当年写的有关舞会的诗：

星期六的晚会，
椅凳下落满花生皮，
地面上滴水成冰。
一切节目已排练好，
演员们欢腾跳跃。
小鬼同青年踢打摔跤，
那俄国医生像是个“哥萨克佬”；
周（恩来）具有完美无缺的风度，
刘（少奇）敏锐、精明，
具有辩证的说服力；
朱德恰似人类的长征，
轻快、有节奏、永不疲倦，
沿着历史长廊走向前。
一旦毛泽东发了言，
就恰似乐队表演，
曲调相同又不同，
因为我们的群星和谐地演奏，

征程上把乾坤当轮轴来扭转。

……

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又好了起来。还忍不住哼了几句苏联的民歌。哼着哼着，她的心情又不免暗淡。正是在她十分热爱的苏联，她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在她正要启程来中国的时候，她被驱逐出境，返回美国。

那段日子里，她更加怀念在中国的时光，在梦中，她常常与中国的领导人相聚。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一些松动。她的北京之梦，也就是第六次访问中国终于成行了。

飞机正在缓缓的降落，北京的屋顶、路上的行人都依稀可辨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心却又悬了起来——

中国革命已经成功，过去在延安窑洞里和她可以深谈的将领们，如今部已经是泱泱大国的首脑，他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和她无话不谈吗？她还能得到“独家新闻”吗？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降落在宽厚的中国大地上。

二

中国的领导人以东方人的热情，接待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把她请进宴会厅。彭德怀、陆定一等老朋友像以前一样给她介绍有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她被邀请到贵宾才能登上的天安门城楼，和中国的党政要人坐在一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先后和她握手，向她致意。

这是10月1日的夜晚，广场上正在放五彩缤纷的焰火。斯特朗的目光不时朝毛泽东那里看一看。方才，毛泽东握着她的手，问她：“你的身体好吗？”

她回答说：“很好。”她还想说几句话，无奈旁边人太多。

毛泽东又说：“要是知道你离开这么久才能返回中国，我们当初就不该让你离开延安了。是吧？”

斯特朗笑着点点头……

此刻，再过去和毛泽东讲话是不可能了。

斯特朗很想和毛泽东谈一谈，像当年在延安窑洞里那样深谈。给毛泽东写了信，却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又叫她心中好不平衡了一阵子。

莫非毛泽东变了？

这又是她自己过于敏感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终于在一天的晚上她被告知，毛泽东将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会见她。

只是说在南方见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她都不清楚。

她先是被车子接走，后来又上了飞机，后来又在她所熟悉的一个城市降落。

这里是中国南方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斯特朗当年就在这作过调查。当飞机在中国的最长的江边盘旋时，安娜·路易斯就喊出了这个城市的名字——武汉。

到达武汉的第三天，她又被车子接走，到了有名的东湖风景区。当时，安娜·路易斯很是惊奇，她前几天在这里游览过，并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一点都不显得老，他们毕竟是好多年没有时间深入交谈了。那天在天安门上，也没有顾上很好地看看这位老朋友。

刚见面，他就和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去的杜波依斯和夫人开起玩笑。他把自己的手伸出来，和杜波依斯比一比，说：“你们看，我们两个的皮肤谁的更黑一些？”

毛泽东坚持游泳，皮肤被太阳晒得像黑人一般。

他又伸出了手，和斯特朗相握，说了一句英语：“您好！”

斯特朗笑了，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英语发音依然不那么标准。她也开了一个玩笑，用中文发出“你好”的问候。

人们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请他们走进客厅，在路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的信收到后，本应回信，但又没有时间，你是能理解的吧。”

斯特朗还能说些什么呢？

他们走进毛泽东那很是宽敞的客厅。彬彬有礼的服务员送来中国的茶水。

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叫斯特朗心里热乎乎的。他说：“你是老朋友了，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今天，你就是女主人，他们——”毛泽东指指杜波依斯，“他们是客人，是新朋友。”

这次谈话像毛泽东的许多次谈话一样，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随意。他问安娜·路易斯：“你今年多大了？”

“73岁。”

他又问杜波依斯：“你有多大？”

“91岁。”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我多大？”

几个外国人自然是说不出的。

“我66岁。”

几个外国人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他说：“今天我们是三代人。”

斯特朗说：“不，只是两代半。”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说：“按照年龄，你可以算我的父辈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了年纪。不过我的身体还行，每年都能下长江游泳。这是我游水的伙伴。”

毛泽东指指陪同会见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王任重说：“我们的主席是游泳的好手。”

毛泽东没有表示谦虚，说：“我游过珠江，也游过我们的第二大河黄河。只是还没有游过黑龙江。”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你要是去游黑龙江，就可以直接游到苏联去了！”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说：“这个想法不错！”

也许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想法使毛泽东想起了另外的话题。他说：“要是你们都同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但是，我想另外三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

毛泽东的话很随便，但往往在这随便中有很深的含义。抑或有时是暗示或象征。

杜波依斯却不这样看，他说：“可能相反，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接过话茬，完全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说：“真的吗？要是那样，我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望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也是个很幽默的人，他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往下说：“如果你到医院去看杜勒斯，那一定给他一个打击。”

“不，不！”毛泽东说，“我很希望杜勒斯健康。他作为美国的国务卿，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

听毛泽东这样讲，三个美国人都觉得不可理解，毛泽东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吗？”

杜波依斯不这样认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不这样认为。

毛泽东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

“杜勒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

毛泽东又谈到了不久前发生的炮击金门的事情。“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三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战争的边缘’。”

毛泽东拿起烟灰缸，说：“美国舰艇在这里，”又拿起一个茶杯。说，“蒋舰在这里”，再拿起一个烟盒，说：“我们在这里。”

他侃侃而谈：“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星条旗。我们很容易区分。我们不打美国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杜波依斯说：“只要是战争，就会给人民带来危害。台湾人民受害，美国人民也受害。”杜波依斯忧心忡忡地说，“我真担心，美国的黑人会灭绝。”

“你不要为这个担心，”毛泽东说，“美国有一千八百万黑人，他们不可能灭绝。面临灭绝的将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已经滚出苏联了，很快也会从中国滚开。杜勒斯先生这类人也会灭绝，而杜勒斯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干着消灭他自己的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十分赞扬他。”

“你愿意投他一票？”

“这要从哪个意义上讲，就我个人来讲，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我的一家人中有许多被他杀害了。”杜波依斯可谓苦大仇深。

说到这个问题毛泽东感慨颇多，他的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他的一家有六个人先后被杀害了，毛泽东很是悲愤地说：“他们不可能杀掉所有的共产党人。我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减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会增加。”

说到这些问题，他们很快提到了在美国眼皮底下的那个小小的古巴，毛

泽东说：“古巴人就在美国跟前，而他们并不担心原子弹和氢弹。这不仅是国家大小的问题，而是人民的政治觉醒的问题。过去我国人民恐惧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心病，就是钦羨美帝。有了这种病就会害第三种病，钦羨转化为崇拜。在中国即使是劳动人民也受了这种感染。过去八九年来，我们已经有成效地改变了这种心理”。

杜波依斯说：“不光是中国人，就是美国黑人也有这种心理”。

说着，他们就争论起来，杜波依斯认为，这是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毛泽东认为这里有一种迷信的力量。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是阶级的人，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他的思想一定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果不站在他的阶级地位上说话的时候，那一定是受一种什么迷信的影响。

毛泽东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你吃过狗肉吗？没有，对了，如果现在有人给你狗肉吃，你还没吃，你就有一种反感。你能给我讲出这是什么道理吗？你从来没尝过它，你没经验，没有实践，你拒绝它，只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游击战争年代曾给我提供狗肉，我迫不得已吃下了它，我没有呕吐，但也有一阵子难受，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影响力。”

……

他们越谈越深入，毛泽东看看手表，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于是他们走出了那栋房子，来到了外面的草地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走在他的身边。这使她有机会更多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这种气氛使她想起了延安的会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主席，你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京的一部分人想出了政策，强加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工厂生产不可能没有原料，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也不可能制定计划。我们中央就像一个加工厂，下面提供了原料才能加工嘛。”

斯特朗又问：“你们正在搞人民公社运动，这种事物的前景怎样？”这是斯特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那时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的回答是：“它的发展前景无非是两种可能，它可能很快增长，进一步完善，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它完全瓦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群众是需要它的，它也可能很快的发展起来，并且克服它自身的一些问题。”

斯特朗紧追不舍，她问：“你认为人民公社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它的发展很快，每个社应该有多大，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工业？我们当时作出决定的时候都有些匆忙，现在看来有的政策是对头的，有的则需要改变，我们已经派出了工作组去进行整顿这些问题。”

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钢材，1958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如果1959年的目标能够达到，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年能够拿出600万吨钢铁来造农机具，我们就能在三到四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

斯特朗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问题的，她有意问毛泽东：“你们搞人民公社是为了分散权力吗？”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也很有分寸，他先是说，上面要想把很多的事情统起来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我们这么搞也有反对官僚主义的意思。

……

一上餐桌，斯特朗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餐桌上有一盘海参，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吃这种东西的。她一看到就恶心。

毛泽东笑了，说：“这位老朋友，你不吃海参，是因为经验还是因为迷信呢？”

斯特朗说：她以前吃过。实际上她并没有吃过，事后她也承认，她对毛泽东撒了谎。

餐桌上气氛是很热烈的。他们不光谈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谈到了自己的生死。

斯特朗告诉毛泽东，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很害怕战争，都因为原子弹的出现而感到恐慌，特别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呢？

毛泽东笑了，就像当年在延安的笑容。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原子弹可以消灭全人类。即使人类全部毁灭了，也还会有新的人类出现。”

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很不在乎的。在谈到他自己的生死问题上，他更是显得无所谓。他说：“将来我怎么死呢？可能被敌人的特务杀死，也可能被病毒杀死，还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或是游泳淹死……”

在60年代，毛泽东经常谈到死，而且表示不乐观，人们对此有许多猜测，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解释，我们也不得而知。

据斯特朗回忆，毛泽东在谈到自己将来怎样死之后，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他说，我希望我能够看到帝国主义的灭亡之后再死。

三

毛泽东和斯特朗的又一次见面是在三年之后。

此时的斯特朗已经是长期在中国居住了。因而他们的接触也就更加深入了。

斯特朗记得那是在一个很有特点的水榭进行的这次交谈。

还是从叙旧开始的。

“你当时不该离开我们。”

毛泽东是很有感触他说这句话的。

“你离开我们以后，也就是我们离开延安以后，很多朋友以为我们彻底完蛋了，而你知道，不论他们多么强大，我们也没有必要害怕任何反动派，因为他们必然会分化瓦解。……”毛泽东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那样自信。

斯特朗这时像一个很好的听众听毛泽东讲他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说，他们总是用十个指头去捉十个虱子，结果是十个虱子都没有捉住，我们的方针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少数敌人。

那个时候，毛泽东是很清醒的，他对斯特朗说：“你们可不要以为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人反对我们了，还有很多人首先是不肯接受社会主义，……也还有些人是想让社会主义按照他的办法去搞，而他们的心里想的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他问斯特朗：“进入了共产主义还会有政治斗争？还有没有反对派？还要不要进行继续革命？”

斯特朗没有回答，

毛泽东说：“我认为，人们不论什么时候都会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先进分子来作政治工作。”

“是啊，不然生活不就很单调乏味了吗？”

毛泽东也笑了，说：“是啊！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些人就无所事事了。”他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

斯特朗很有些想不明白，中国革命就那么不可思议地成功了，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奥妙？

毛泽东对她说：我们这些所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很多人是被反动派逼上革命道路的。

“就说我自己吧，”毛泽东来了个现身说法，“我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一开始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战士，并且带领这么多的人。我就是被迫这么做的。反动派杀了我家六口人。”

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起了中国的一部小说《水浒》，这部小说多次被他提起过，而且后来还因为这部小说引发了一场运动。

“中国有句话叫作逼上梁山，我们很多人就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历数了中国革命的许多次起义，讲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讲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讲延安的整风运动。

……

他们也谈国际关系，谈美国和苏联，谈巴拿马问题等等。可说是无话不谈。毛泽东的幽默谈吐，叫斯特朗不时发出笑声。

他们又说起了有关赫鲁晓夫的事情。

那段日子，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正是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谈这个问题。

斯特朗发问：“你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正面冲突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毛泽东说，“是1958年吧。”他向在座的人讲了赫鲁晓夫来华时，他们发生的争论。他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不无挖苦地说，“你把我们的海岸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说：“要真是那样的话，中国该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好，我再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回顾说：“赫鲁晓夫当然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寸步不让，告诉他，你要坚持这样，不让我们呼吸，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还讲到，赫鲁晓夫要他放掉几个美国飞行员，要他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妥协，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弄得赫鲁晓夫无法下台。

在座的弗兰克问毛泽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你本人充当了什么角色？

毛泽东笑了，他说，我个人的作用很小，我只是写了一些诗，没有任何别的武器，我的诗就是我的武器。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确写了不少的诗，正中他自己说过的话“没有气，他写诗？”正是他有气，他才写出了那些很有气势的诗篇。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他已经把那种气氛写出来了。他要“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高天滚滚寒流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他是这样看修正主义者的，对这些人怎么办呢？他的态度是：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说着说着，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请他们一起共进午餐。一边走，毛泽东一边说，1963年，他们在莫斯科出版了攻击我们的公开信，使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从此以后，我们就好比大闹天空的孙悟空，我们扔掉了统治天堂的天条。”

他看看这些外国朋友，很是严肃地告诉他们，“请你们记住，绝不要把统治天堂的天条看得太认真了，一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革命统治法则行事。”

他们边吃边谈，毛泽东饶有兴致，不时用诗人的语气和他们交谈。说到不久以前有一位苏联朋友到中国来访问，带来了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对中苏论战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毛泽东对这位苏联朋友说：请不要担心，笔墨交战不会伤害人的肌体，至少有四样东西我还能保证。不论你们怎样批判和攻击我们，天不会塌下来，中国的妈妈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儿照样在河里游。毛泽东的这些话使斯特朗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史沫特莱说的一句话：“谁说中国没有浪漫派诗人，鄙人就是一个。”

四

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过80岁生日。

斯特朗的80岁生日前夕，他几乎是同时收到了两张请柬，一张是毛泽东的，另一张是周恩来的。

斯特朗当然很高兴，他对中国领导人对他的这种盛情表示深深的感激。

第二天，她和许多外国人一道，坐飞机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这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江青在门口迎接她们。

这叫斯特朗吃了一惊。江青平时是不在这种场合出现的。

斯特朗当然也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毛泽东正在酝酿着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在斯特朗眼里，毛泽东仍然是那样风趣。他坐下来准备吸烟时，对周围的人说：“斯特朗同志不吸烟，她是反对派。”

在座的马海德接过话茬说：“您要按照吸烟来划分派别吗？”

人们以为毛泽东不会再说什么，谁知他的玩笑还在继续，“当然，大夫们要我别吸烟，我坚持要吸。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可以举手，手中有烟以示吸烟。”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座的外宾没多少反映，他笑说，“好吧，看来我是少数派了。”

他又看看在座的中国官员，说：“不过，我还是要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斯特朗见大家都已经坐定，就对毛泽东说：“请主席谈谈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吧。”

毛泽东说：“你们不能总让我谈世界形势，今天你们谈，我来听。”

在座的各位先后发言，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好的听众，他听了而且还在纸上记了些他认为有用的东西。

大家谈了一会儿，又一致要求毛泽东谈，他说：“既然你们要我说，我就说。但我看你们是有预谋并且想办法对付我。那我就谈吧。”

他先从印尼共产党人被屠杀说起，纵横全世界，谈到中国和苏联的论战，也谈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

谈着谈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对在座的马海德说：“你们卫生部的人一点也不关心人民的健康，看看，现在已经多晚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我的夫人已经请我们去吃饭了。”

这时江青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说：“请各位朋友往这边走。”

宴会丰富的，毛泽东一再给斯特朗让菜，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了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天，中国的各大报上都发表了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谈话的照片。

……

患难之中见真情 ——毛泽东与胡志明

一位漫画家讲过，画政治家的肖像，毛泽东和胡志明放在一起画最好把握——一个有很长的胡子，一个没有胡子；一个天堂饱满，地阁方圆，另一个清瘦干练，线条分明……

这是两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

他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良好关系，被人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楷模。

在有关大的政治决策上，他们互相通气，开诚布公，互谅互让。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相互关心——毛泽东曾经劝说胡志明不要搞“独身主义”，曾经安排胡志明到中国的黄山、西湖去休养度假；胡志明睡不好觉，长期失眠，毛泽东又派医生去教他学习中国的太极拳；甚至连胡志明喜欢抽的“大中华”牌香烟，毛泽东也要求有关部门给他长期提供……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和越南两国、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两党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但又不仅仅是一种同志关系，他们之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相互吸引，才使他们的关系是那样牢不可破。

中国有句俗话，“患难之中见真情”，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友谊正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

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先从
他们的身世说起，似乎更
有说服力……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

胡志明是一位越南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亚热带的山区。

毛泽东没有正式上过大学，胡志明也没有正式上过科班的大学。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是一个教师，他确实当过教师，教出了不少的学生。

胡志明也当过小学的教师，后来还当了小学的校长。据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校长。

只是后来，胡志明出国了，到过许多的国家，而毛泽东没有出国，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奋斗了好几十年。

在一定的程度上说，胡志明的经历比毛泽东的经历更为复杂和曲折，他当过厨子，做过海员。在英国和法国当过最下层的清洁工、炉子工。

胡志明的政治生涯应该从一九一九年算起，那时他在法国向凡尔赛和会提送八点申请——要求越南人享有和法国一样的权力。这次申请虽然没有成功，却使胡志明在越南侨民中有了很高的声誉。

说来很有意思，胡志明加入的共产党是法国共产党。他还在法国办过《流浪者》杂志。后来他抗击的也是法国侵略者。

胡志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因为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一个很是激烈的讲话，抨击法国共产党反殖民主义不力。此后，他就到了中国，在广州成立一个越南革命者联盟。

那个时期的胡志明正是风华正茂，他们的组织也很有活力，要不是蒋介石清共，他们的活动说不定就能成为气候。

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了他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探索，他们走的都是武

装斗争的道路。

胡志明在苏联呆了一些时候，成为共产国际在东南亚的代表，出现在暹罗。1930年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并且发动了武装起义。在鲜血和烈火中，他们的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他被反动派判处了“死刑”。

他逃到中国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毛泽东也在艰难地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没有机会见面，更没有机会切磋一下关于革命，关于人生等问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毛泽东经过长征以后，到达陕北，在延安站住了脚。关于这次见面，我们没有看到有关的权威材料。会谈的内容，肯定涉及到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涉及到反对法西斯……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惊天地动鬼神的活剧的时候，胡志明也和他的战友们在越南的丛林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2年8月的一个清晨，胡志明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出发（越南高平的一个镇子），来到了中国广西的靖西县，他想从这里到重庆去找周恩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一名警卫向中国的警察告了密，胡志明被逮捕了。这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耳朵里，为了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是想了不少办法。他找到了后来成为中国有名的历史学家的翦伯赞，要他通过有关的渠道，把胡志明救出来。翦伯赞找到了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又找到了李宗仁，通过他们去和蒋介石说。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才答应给张发奎发电报，要他把胡志明放出来。胡志明带着他的《狱中日记》走出了铁窗。日本投降以后，他和范文同、武元甲等人领导越南人民占领了河内，并抓住时机宣布越南独立。胡志明是在越南革命中造就的一代革命者，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中造就出来的革命者。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不同的经历。这些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惊人的一致意见，而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他们又是那样的不同。

这些相同和不同：构成了毛泽东和胡志明几十年间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在援越拉法的斗争中，毛泽东 和胡志明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中国大地上响起来不久；胡志明就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谨代表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祝贺。

越南和中国两个民族具有的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从今以后，这一关系将为发展我们两个民族的自由幸福、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更加密切。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据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有关人士说，胡志明紧接着又来了一封信，这后一封信的重要内容，就是请求中国给越南提供援助，并希望中国派人去越南。

随后，胡志明亲自来到中国。当时毛泽东已经出访苏联，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和他研究援助越南的问题。

几天以后，他和周恩来一块到了苏联。周恩来是为了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去苏联的。胡志明到当时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是和斯大林一起磋商有关抗法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和胡志明在苏联就进行了几次交谈。在对待苏联的一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致的想法。

胡志明感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性格是那样的不同。斯大林比毛泽东难接近，而且他很多疑。胡志明拿了一份画报，请斯大林签名，斯大林签了，后来又叫人把这份画报偷走了，说是怕胡志明拿了这份画报去当上方宝剑。

而毛泽东是有什么说什么，不转弯子，也不搞小动作……

胡志明先于毛泽东离开了莫斯科，经中国回国，并在中国逗留了一些时候。

这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到了国内的电报，称越南政府要求中国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知道，现在越南正是需要支持的时候，斯大林由于种种关系，没有立即表态。我们中国就是要支持弱国。

他提起笔，给在北京的刘少奇写了一份电报。

少奇同志：

（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一个复文，请于明日（十八）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民主国家。

毛泽东

1月17日下午十时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还觉得意犹未尽。又随手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给越南外交部长的复电。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又觉得这两份电报上还有可修改之处，马上又给刘少奇补发了一份电报。

过了几日，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联名给刘少奇发了电报，请他代向胡志明表达问候，并且告诉胡志明，苏联已承认越南，我国驻苏联使馆已将越南请求各国承认的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转交给各民主国家驻苏使馆。

——毛泽东对待越南和胡志明的态度，从几封电报上也有很清楚的反映。

尽管中国人民刚刚解放，还有许多许多的困难，但毛泽东还是热情地伸出了友谊之手，给了越南无私的援助。用中国农民的活说，这叫“宁肯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朋友”，用后来报纸上的话说，就是：“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中国给越南的援助，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

毛泽东先后派出罗贵波、陈赓、韦国清等人为首的顾问团。帮助越南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财政经济问题等等……

黄文欢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

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枪支11.6万多支，火炮420门，以及大批的通信工兵等器材。

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胡志明于1951年的严冬再一次来中国，当面向毛泽东请求给以帮助。他清楚地知道，这种时候，毛泽东是靠得住的。

关于胡志明这次秘密访问，罗贵波是当事人，他有一段很详细的回忆，我们摘录如下：

1951年冬季，胡志明又一次秘密访华来到北京。

一天我陪他来到丰泽园的颐年堂。我们进去时，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都迎出来。他们相互亲切地拥抱。胡志明主席早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分别相识，他那带有广东味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可以不用翻译。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一点外交形式，胡志明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而热情。

他见到毛主席，像久别的兄弟，相互问候，说了一阵亲切的话语、很快话锋转入正题。

胡志明把越南抗法战争的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周总理，朱总司令把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我国国内的有关情况，也向胡志明作了简要介绍。

在交谈中胡志明问毛主席：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们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主席说：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提的意见和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的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毛主席和胡志明交谈时，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观点和意向都融化在家常话中，看似聊天，但细想想含义深刻而又耐回味。胡志明是个极富感情的人，看得出他被毛主席的诚挚感染了，他站起来说：“我和越南同志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到吃饭的时间了，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我一起走进餐厅用餐。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提前告退。餐厅跟会客室只用一屏风隔开，只七八步一挑帘就进去了。餐厅仅有摆两张餐桌的地方，这时只摆一张餐桌。吃饭时，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边吃饭边继续谈话。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插话，互相补充，谈得非常热烈。

席间，胡主席看到端上来的辣椒，就对毛主席说：“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没法下饭？”毛主席笑笑。胡志明又接着说，“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长得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大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完越北森林里的朝天椒以后，毛主席说：“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

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他（指我）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接下去的话题就是各自介绍各自家乡辣椒的烹制方法。然而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越南吃辣椒的方法。胡志明说，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这时，毛主席说：“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盐，我们不少同志化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呢！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次谈辣椒的事。

罗贵波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时毛泽东和胡志明亲密关系。

由于毛泽东在和苏联的交往中，对那种不平等的东西特别反感，因而在和比自己弱小的越南交往时，特别注意。这种交往，正如胡志明自己所讲，是一种完全的国际主义的。

就在那天，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以后，他又把罗贵波留下，专门对他进行了交代。

毛泽东说：“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的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不论是提意见还是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罗贵波说：“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也叮嘱说，你的工作是好的，更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范围，重要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毛主席和中央。

毛泽东接过话茬，回忆起中国革命的历史，他问罗贵波：“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知道李德此人吧？”

罗贵波当然知道，就是那个所谓共产国际的代表，人们叫他“独立房子”。

毛泽东那天很是健谈，他说：“李德这个人，参加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的赏识，他把派驻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央苏区作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说的很是缓慢，“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罗贵波明白，毛泽东是在给自己提醒，不要犯李德那样的错误，他连连点头。

毛泽东又说：贵波同志，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忌李德在中国的教训，

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

这一点，罗贵波同志是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后来的工作中他正是这么做的。

毛泽东还是要他叮嘱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的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那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

走出中南海，罗贵波还在想：毛主席对那种“钦差大臣”可真是深恶痛绝呀！

越南的抗法战争，在中国人民大力帮助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毛泽东对胡志明，对越南劳动党中央表现得更加尊重。我们翻阅当年的电报，几乎每一份电报上都有“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由你们决定，你们比我们熟悉，了解情况。”

在中共中央联络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毛泽东又作了如下的指示：

“热爱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

正是大批中国同志和越南同志一起并肩战斗，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才进一步取得了胜利。这里有中国同志的鲜血，有的同志就永远地留在了越南的土地上。当时有的同志也有些想法，毛泽东知道以后，就要求罗贵波做这些同志的工作，他还举了白求恩的例子，要这些同志向白求恩学习，毛泽东还吟了两句古诗：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友谊才进一步得到发展，毛泽东和胡志明之间的友谊也才能越来越巩固。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都承认这一点。

越南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刚刚赶走了法国人，又来了
美国兵，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支持胡志明。

1954年5月至7月，有8国代表参加的越南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结束了。这次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划分南北两个政权，到1956年举行全国大选。

这对越南人民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不是按人民的意愿而发展的。

到了1956年，美国和南越又变了卦，他们阻挠这次大选，使刚刚走向和平的越南又重燃战火。

从此越南这块土地上枪声不断，流血不停。

到了60年代中期，战争进一步升级了。

1965年2月7日，是个正常的节假日——星期天。

许多不祥的事情就发生在星期天，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突袭贝鲁

特.....

1965年的2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全面攻击.....于是印度支那又起战火。

2月10日，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人的大示威，愤怒声讨美国帝国主义的暴行，十里长街吼声震天：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

从印度支那滚出去！

从亚洲滚出去！

从非洲滚出去！

从拉丁美洲滚出去！

从它占领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此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正站在天安门上，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办一起向游行的群众致意。

这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做给越南同志看的。

毛泽东就是要告诉美国人，我们当越南的后方，当定了！我们就是要支持越南人和你美国人打下去！你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不是见过面了吗？中国人就敢和你较量较量。

毛泽东同时也告诉了越南，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有我们作你们的后盾，你们可以放心地打下去！

然而越南人并不放心。4月，那个后来和中国人民为敌的黎笋来到了北京，下飞机后，迫不及待地将一封胡志明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中方的接待人员中的负责人。

当他得知中国方面为他安排的礼节性的晚宴和有关的文艺演出时，他说，这就不必了吧，我想尽快和中国的领导人见面。

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了，他决定刘少奇和这位越南领导人会谈，并且给了刘少奇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无条件地满足越南同志的要求。

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原则啊！

事后人们说，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一个原则。

刘少奇和黎笋的会谈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

关于这次会谈，《秘密出兵亚热丛林》一书有过如下的描绘：

会谈正式开始，中越双方各坐一边。少奇微笑地望着黎笋，眼光慈祥，带着关切的同情。他说：“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

黎笋往前欠一下身子，连连称道：“我们一直认为伟大的中国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最充分。”

少奇吸了一口烟，没有对黎笋的话作出直接的评价。他只是以坚定的口气，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

“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黎笋是斗胆说出这话的，而且说得有点动情。像是出于内心，又像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立场，同时也为下面的会谈作铺垫。停了一下，他把话锋一转，果然以恳切的口吻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的飞行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必要人员都在内的中国部队。”

少奇知道，这是今天会谈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一条：有求必应。于是，他既热情果断又策略地说：“好嘛，大敌当前，我们岂能坐视不救？！但是，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这是黎笋渴望好久的结果。因此，听了少奇的话，他的脸色瞬间由阴变晴，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急忙代表胡志明和越共中央，向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指着坐在他身旁的武元甲对少奇说：“至于中国派出援越抗美部队的任务、人员、着装、给养、入境时间与路线等一系列具体事宜，请两国军界去谈吧？”

少奇点点头：“好的。我们今天只定大原则。也不发表公报。至于去什么兵种，要多少兵力，怎么个去法，都由两国军方负责人再具体磋商，草签协定吧！”

很快中国援越抗美的部队就出发了。

不久，胡志明又秘密来到中国。

这些年，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胡志明来过许多次中国了，毛泽东也和他谈过好多次。

这次，毛泽东不在北京，而是在他的老家湖南。

胡志明是在长沙和毛泽东见面的。

毛泽东在长沙的住所非常普通，绿荫掩映着一栋平房，院里有一些平常的花草。

他习惯夜晚办公，常常是睡到中午。今天他起的比较早，他记着，今天上午，胡志明要来访。

胡志明准时来到了这里。

毛泽东会见国内的同志，一般都不出来迎接的，对来自越南的同志，他是一定要到房门口迎接的。

胡志明依然穿了他的那身米黄色的中山装，脚穿一双“长征鞋”老远就伸出手来：

“毛主席，你好哇！”

两只大手握在了一起，并且还有一个非中国的礼节——拥抱。

坐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天南海北的谈了起来。

美国在越南的暴行，是他们谈论重要话题，世界局势。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还有中国国内的一些问题，也有所涉及。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要人，要物，你说。”

毛泽东十分坦诚。

胡志明摸一下已经雪白了胡须，对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需要客气的吗？

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图，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毛泽东眯了一下眼睛，看清了，这是一张河内以北急需抢修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

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谈话，不用翻译，自然使他们的谈话更加自如。

走出那所房子以后，胡志明还在回味着毛泽东的一些话。

此后的日子里，中国先后派出了30多万人部队，到越南的丛林中，担负

起了防空、修路、后勤保障等任务，为越南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尽了最大的努力。

毛泽东没有去出席胡志明的葬礼，但他内心是不平静的……

1969年的9月3日，胡志明离开了哺育他的土地，去见他的老师马克思了。

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有他未竟的事业。

胡志明的葬礼，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再去河内参加葬礼。

毛泽东60年代以来，没有再出过国，这是因为多方面的考虑。如果是在50年代，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的。现在这种安排，应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些和平时写的不同了。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他站在桌前，狠狠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思绪飞了很远很远……

他按响了叫秘书的铃。秘书走了进来。

他指指桌上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只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的脸上淌着泪水……

不打不成交

毛泽东与田中角荣在北京握手

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更深重的了。

中国人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是烧杀，是抢掠，是奸淫，是南京大屠杀，是内蒙的万人坑……

假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人握手言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汉奸。

而毛泽东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握手却被人称道——正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使得日本首相亲自跑到中国来，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和田中角荣握手。结束了一个时代，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虽然已经是 20 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天我们重新说起这段历史，依然饶有兴味。

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中日友好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

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没有结束，中日两国没有签定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日本本应同中国人民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然而，那时的日本政府紧跟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使日中关系处于冷战状态。

1952 年 4 月 28 日，日本政府和台湾签订《日华和平条约》。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义愤。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此后日本首脑又先后访问台湾，使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交往友好没有间断过，无论是文化体育领域还是商界。

中国和日本毕竟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1952 年 6 月，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署。

1962 年 11 月 9 日中日签署贸易备忘录。

1964 年 9 月 25 日，中日双方互派新闻记者。

1970 年 4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提出中日贸易四原则。

……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求友好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越来越深入人心。

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中国友好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法国、英国等国家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1 年 7 月 16 日，已是上午 11 时，日本首相佐藤开完内阁会议，正走出会议室，他的秘书送来了一份备忘录。

佐藤一看，脸色顿时变了——

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 5 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上午 10 时半。

佐藤看看手表，10 时 27 分，离发表时间只剩三分钟了。

佐藤一句话也没有说，他除了对美国人气愤还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正是从那一天起，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舆论在日本国内占了上风，佐藤这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不热心的首相也越来越陷入了困境。

在日中关系上持消极态度的佐藤政府，面临着内外的压力，也不得不作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想真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这在后来的表现中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据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那一天，佐藤气得嘴都歪了。

当美国总统的专机在中国北京国际机场徐徐降落时，佐藤正和他的助手们看电视，他们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 am very happy。”

（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

佐藤已经站起了身子，他不愿再看下去了。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追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中日关系也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田中角荣首相上台执政 公开宣布将中国和日本 关系作为内政问题来考虑……

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上任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角荣就公开宣布：

“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这一届内阁的外相大平正芳说得更为明确：

“我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到时候是要访华的。究竟什么时候现在还很难说。”

对田中和大平的这些说法，中国方面很快作出了反应：

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借欢迎也门外宾的机会，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双方的政治家都明确表示，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了。

然而，要实现正常化，又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这要跨越多少障碍，才能走到彼岸？

同年的7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好几次会谈。

据当时的《朝日新闻》报道，竹入在和周恩来、廖承志会谈时，拿到了

中国的一份原始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如下的内容：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之日起结束。

二. 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来的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

三. 双方同意，中日两国邦交的建立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四. 双方同意，按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两国的关系。

中日两国间的纠纷应按照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不应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五. 双方声明中日两国各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

六. 双方同意，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七.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扩大人员交往，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将根据需要和双方商定，分别缔结航海、气象、渔业、邮电、科学技术等协定。

……

周恩来对竹入说：有些东西可以不写进联合声明，但必须是“默契”。

《竹入笔记》记载的有如下三点：

一.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二. 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应从台湾撤离其使、领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促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撤离日本。

三. 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企业，台湾解放时将受到适当照顾。

周恩来还对竹入说：我们提了三点，田中首相如要增加其他内容可以商量。现在这个声明的表述，日美安保条约，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的台湾条款，日台条约都没有写，避开了嘛。你既然来了，总要让你有所收获。当然这是从政治上讲的，不具法律效力。日中恢复邦交，政治上符合人民的愿望。

竹人回国以后，很快把中国的原始方案交给了田中政府。

田中看到中国方面的意见后，说了两句话：“我去，没有问题。我去，没有问题。”

很快田中又作出了一项决定，即不通过别的等级的谈判，直接访华。当然，他们要作许多的工作，比如台湾的工作，美国的工作……

中国方面有了和美国谈判的经验，对这次和日本邦交正常化好像更是胸有成竹。

周恩来这位世界公认的外交巨擘，利用中国上海舞剧团到日本进行访问的机会，安排孙平化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谈，由孙平化等向日本外相正式转达对日本政府首脑访华的邀请。

大平正芳和田中角荣的反应是神速的。当大平再次见到孙平化和肖向前

时，大平说，田中角荣首相感谢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访问中国，他将愉快地访华。

次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通过新闻媒介正式宣布，中国总理欢迎和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三天以后，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了孙平化等中国客人。他明确表示，他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

决定了访华日程，田中角荣 就开始了认真的准备……

要到中国访问，对田中角荣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据曾经任中国驻日本的记者王泰平，亲自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采访。他所著的《田中角荣》一书有相当的权威性，据这本书记载，田中除了在自民党内作各种工作以外，对中国的有关情况也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他的秘书给他准备了大批的有关中国的书籍。

《2001 年的中国》	韩素音著
《周恩来——中国幕后的杰出人物》	许芥昱著
《中国经济入门通俗本——八亿人口的市场和经济结构》	尾上悦三著
《毛泽东，他的诗和人生》	武田泰淳竹内实著
《周恩来谈日本》	米谷健一郎编
《日中问题》	菅荣一等著
《开展中的革命外交》	朝日新闻社编
讲座《中国》	野原四郎等著
《中国之旅》	本多胜一著
《在华日军》	本多胜一著
《你好，中国话》	香坂顺一新井宝雄著
讲座《美中接近》	R·斯拉比诺等著
《中国手册》	岩村三千夫斋藤秋男编
《中国要览》	时事通讯社编
《中国指南》	编者不详

据田中的秘书透露，那些日子，田中晚 8 时半就寝，凌晨一二点钟就起床，趁家人熟睡的时刻看书，一直读到四五点钟，和考大学的学生一样用功。

田中角荣不仅研究中国，研究毛泽东，研究周恩来，就是当时外交部长姬鹏飞也是他研究的对象。不光研究他们的政治思想，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个性特征也不放过……

田中还不知道，中国方面对田中的来访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有过明确的指示。周恩来对谈判的一些细节都作了安排。

比如，在欢迎宴会上，要演奏什么乐曲，也是颇费心思，特意选了田中的家乡的民谣——《佐渡小调》。

还比如，田中角荣爱出汗，要在他就餐的桌上多放几块小毛巾……

中日两国的谈判虽说不像中美

会谈时那么复杂，但也有不少的问题叫外交官们很有些头痛。

身穿灰色西服的田中角荣出现在中国首都机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在这里完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握手。

中国人又看到那面太阳旗，听到了《君之代》。

虽然有些抗日老战士对这些东西很是反感，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一事实还是接受了。中国人民早就希望中日不再战，早就希望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会谈很快就开始了。

为了争取主动，田中在会谈一开始就提出了他们认为很是要命的问题——美日安保条约问题。

田中说：“这个条约是在中苏友好条约之后签订的，这一点请务必谅解……我们希望中国不要把它看成是威胁。尼克松总统已经访问了北京，这也充分说明美中双方是会取得谅解的。”

周恩来表现的很是大度，他说：“这不成问题。”接下去的话是很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的，也是让日本人感到欣慰的。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的好坏，是日美之间的事情。我们不干涉。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你们坚持这个条约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表现的很是大度，但在另外的字眼上，他却是一点都不肯让步。

在欢迎日本首相的宴会上，中国主人表现出了应有的热情，宴会准备的十分丰盛，主人的讲话也很是热情，使得日本人更加彬彬有礼。

当田中首相面对话筒时，声音都有那么一点发抖，他在回顾了中国和日本多年的交往的历史以后，说出如下的一些话：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多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本来日本首相的讲话是应该受到热烈掌声欢迎的，但此时在场的中国人都听着这几句话很不顺耳，因而掌声也变得稀疏了。宴会上的气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对此发表了意见，说：“昨天在宴会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

田中见周恩来一脸严肃，忙解释说：从我们日文讲，添了麻烦就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的意思，这里还有不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周恩来说，中国的语言可不是这么表述的，这么表述我们的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田中说，如果这么表达不合适，可以按照汉语的习惯改。

……

日本国政府的条约局长有个论调，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上，当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次签订的条约就不用再提这个问题了。

对此，周恩来一点都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他说，你们的条约局长的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你们签订那个条约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了台湾，他

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众所周知，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田中角荣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的不对，并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

……

毛泽来对田中角荣说不打不成交啊！

9月27日晚，周恩来的专车来到了钓鱼台国宾馆。

他和田中角荣已经是熟人了。所以一见面，就对田中说：“我是来接首相的，我们的毛主席要和您见面。”

田中早就等着这一天。

插有日本国旗的车队，开出钓鱼台，一直向东，很快进入了中南海。

汽车在海边的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就是人们常说的游泳池。

毛泽东要在这里会见战后来访的日本首相。

此时的田中角荣不免有点儿紧张，他毕竟没有见过毛泽东，听别人讲，总不是自己直接接触。

“第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呢？”

田中这样想着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

——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书本。看来毛泽东了解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靠了书本。

刚刚落坐，毛泽东就说话了：

“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他看看田中，又看看周恩来。

田中显然不习惯毛泽东这种谈话方式，回答说：“不，不，我们谈得很融洽。”

毛泽东笑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作不打不成交。”

由此开始，他们谈起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交往史，说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说着说着，毛泽东又来了几句叫田中很难接受的幽默：

他指指廖承志，说：“他是日本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不能和毛泽东开这样的玩笑，他很是认真地说：“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他如果参加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

毛泽东说：“听说田中先生不喜欢吃西餐，在夏威夷吃的是日本饭菜，北京的饭菜怎么样啊？”

田中说：“吃得太好了，喝了很多的茅台酒。”

“喝多了可不好哇！”

田中说：“听说有六十五度？”

“我记得是七十五度哟，不是谁告诉错了吧？”

……

他们的话题说到日本的竞选。

毛泽东说：“在日本搞竞选，不容易呀。”

田中告诉毛泽东，25年里，搞了11次竞选，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

毛泽东说：“可要当心啊。”

田中说：“不和选民握手，很难取胜的。”

毛泽东问：国会怎么样？

田中回答的很是认真：“很费神，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大选。”

“日本不容易呀！”

毛泽东感慨着。

他们谈到了天皇，毛泽东告诉田中角荣，中国也有天皇——中国那个女皇帝的丈夫高宗。

他们还谈到了人的生死，毛泽东对田中说，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邀请。

田中不解，说哪能呢……

最后他们谈到了读书。毛泽东指着一套《楚辞集注》说：这是我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田中接过书，连连道谢。

毛泽东又说，我有读不完的书，一天不读书，就好像少了什么。

送田中出了门，毛泽东又开始读他的书了。

两天以后，中日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中日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参考书目

《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3集，第4集，第5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外交舞台的中共领袖》 李越然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9年出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出版。

《毛泽东与斯大林》 刘杰诚著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出版。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出版。

《伍修权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93年出版。

《党的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合办。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毛泽东尼克松在一九七二》 陈敦德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 第三十四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

《斯诺在中国》 三联书店

《走近毛泽东》 蒋建农 志为著 团结出版社 1994年7月出版。

《敬礼.三》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西行漫记》 斯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漫长的革命》 斯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出版。

《报春燕纪事》 武际良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2年出版。

《风云七十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年7月出版。

《将军不辱使命》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2年出版。

《将军·外交家·艺术家》 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出版。

《毛泽东自述》 斯诺著 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

《毛泽东轶事》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出版。

《我眼中的毛泽东》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乒乓外交始末》 钱江著东方出版社。

《三大洲》 蒙哥马利著

- 《尼克松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 1978年12月出版。
- 《真正的和平》 尼克松著，新华出版社 1985年10月出版。
-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11月出版。
- 《基辛格》 [美]卡尔布兄弟著，三联书店 1975年3月出版。
- 《毛泽东交往录》 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
- 《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1988年2月出版。
- 《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 《中国共产党大事年表》 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
- 《缅怀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 《沧海一粟——黄文欢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版。
- 《现代中越关系》 郭明 罗方明 李白茵编 时事出版社 1986年4月版。
- 《秘密出兵亚热丛林》 施盈富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0年8月版。
- 《援越抗美实录》 王贤根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年6月版。
- 《新中国编年史》 廖盖隆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9年7月版。
- 《田中角荣》 王泰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7月版。
- 《日中建交谈判纪实》 时事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